君山望海
董志甄绘

枣庄市中区文史

第一辑

政协枣庄市中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枣庄市中区文史
第一辑

枣庄市中区文史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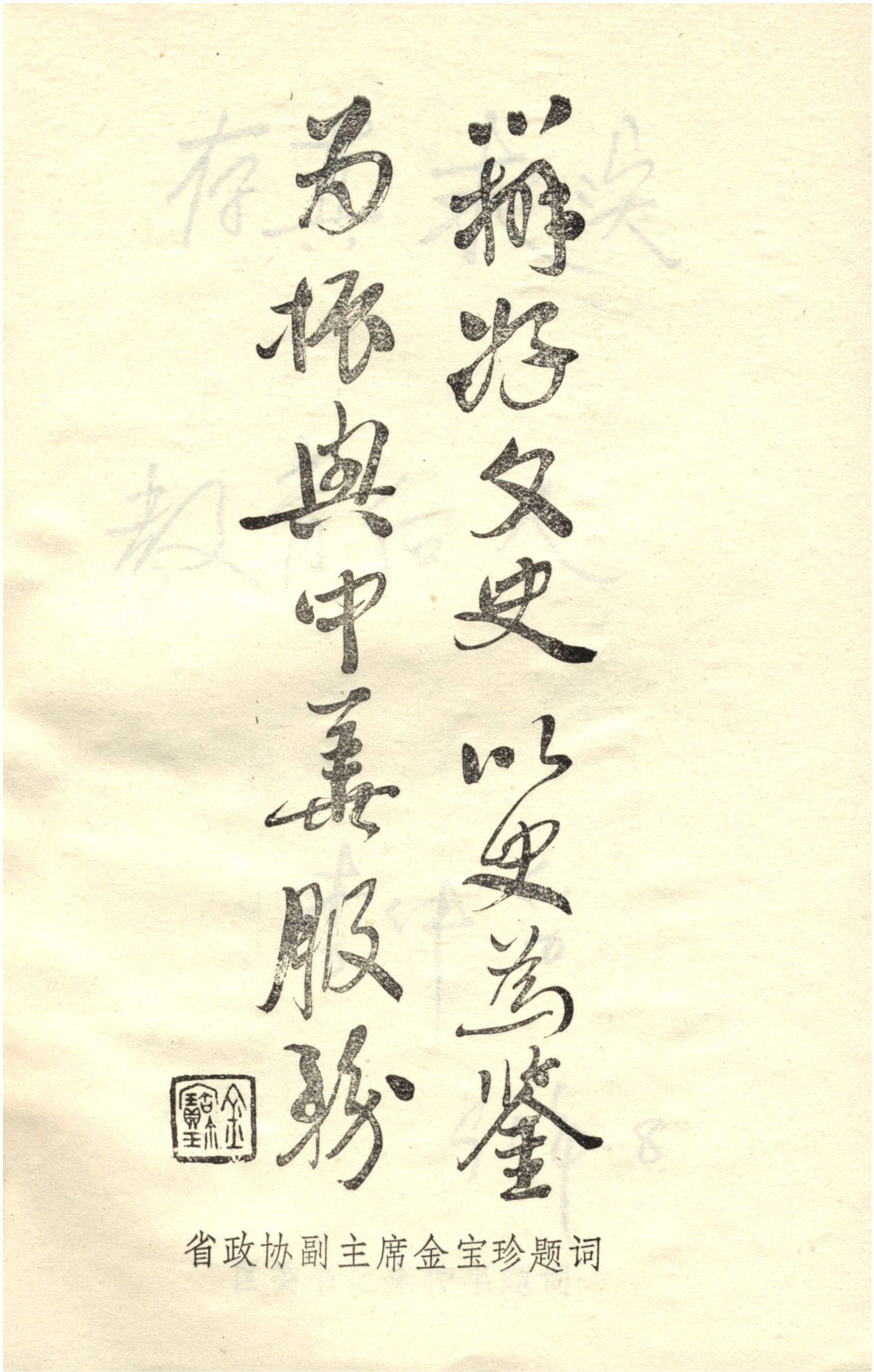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枣庄市市中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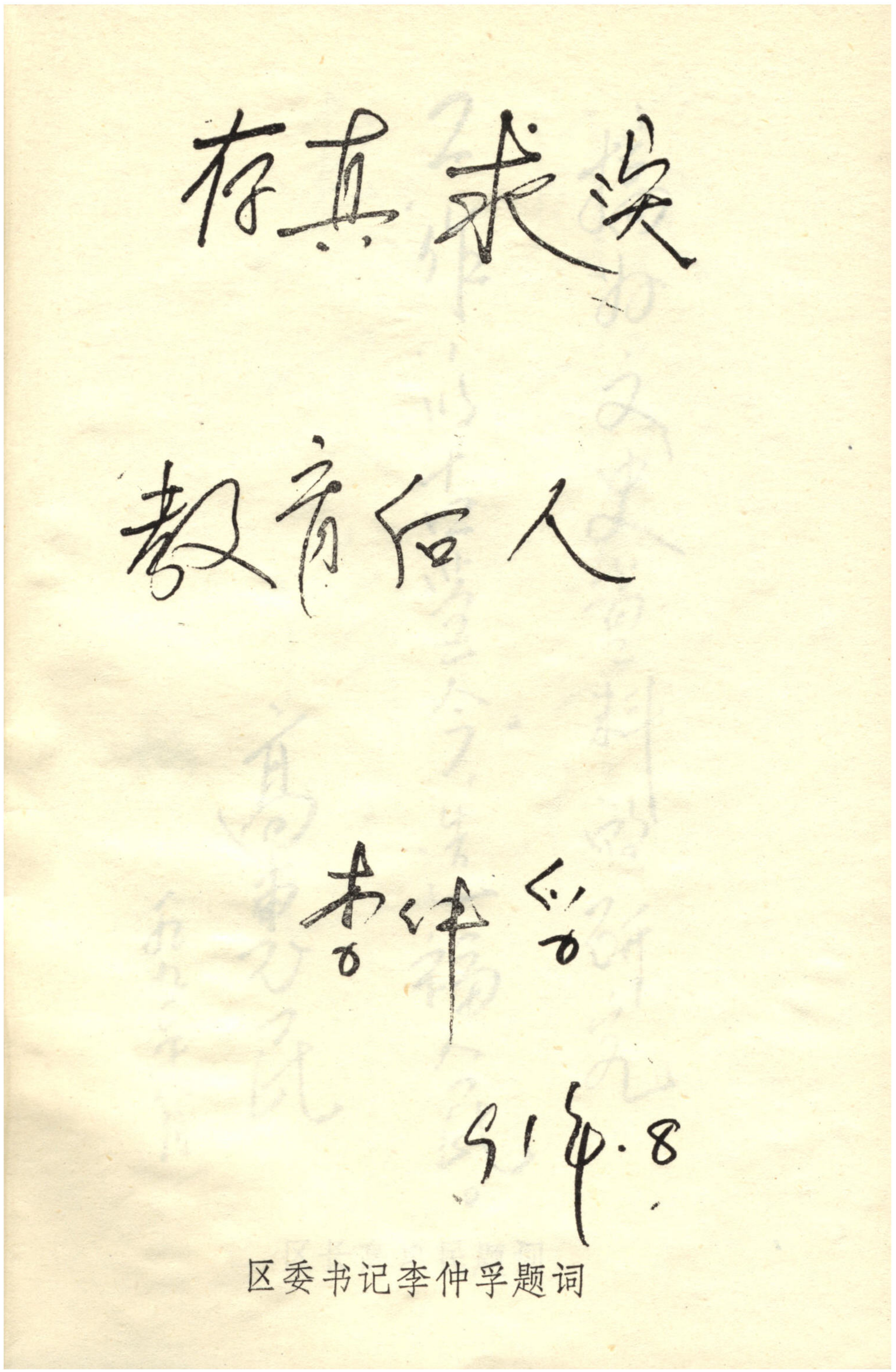
枣庄市中区文史

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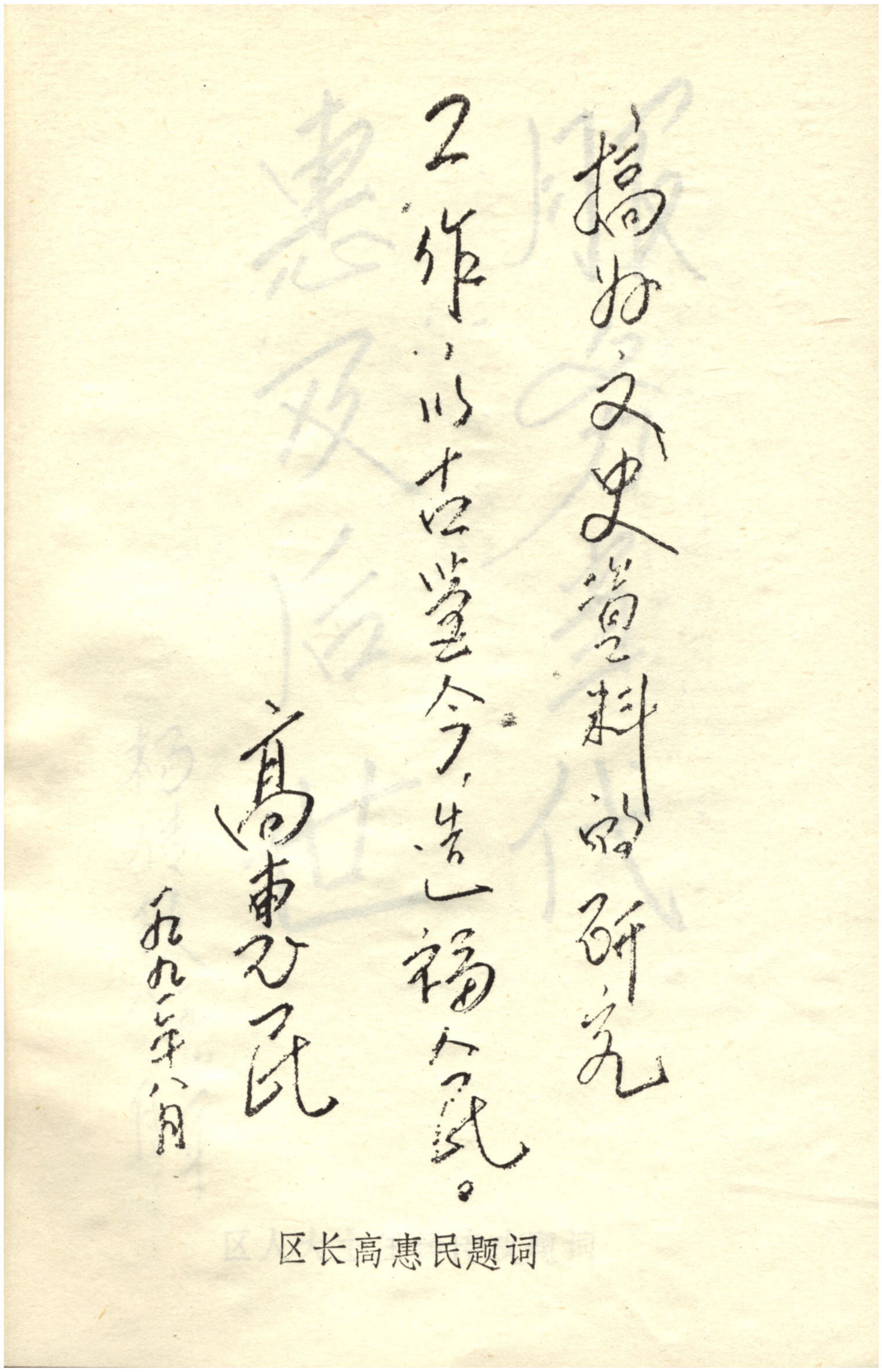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枣庄市市中区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枣庄市印刷厂印刷
800×1168毫米　大32开
3.375印张　127千字
印数1—2000　1991年9月印刷
枣庄市出版办公室准印证　〔1991〕第30号
工本费　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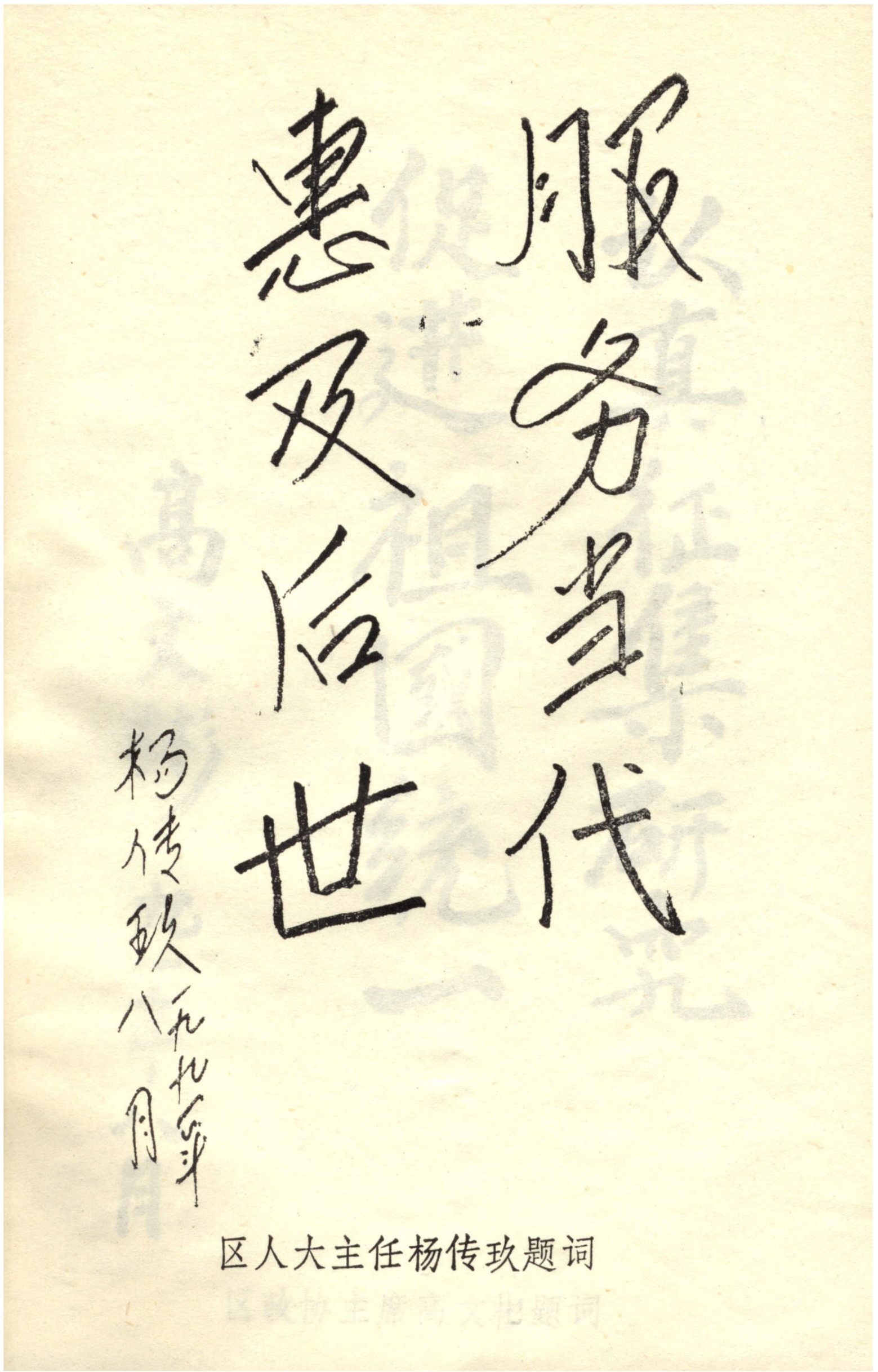
省政协副主席金宝珍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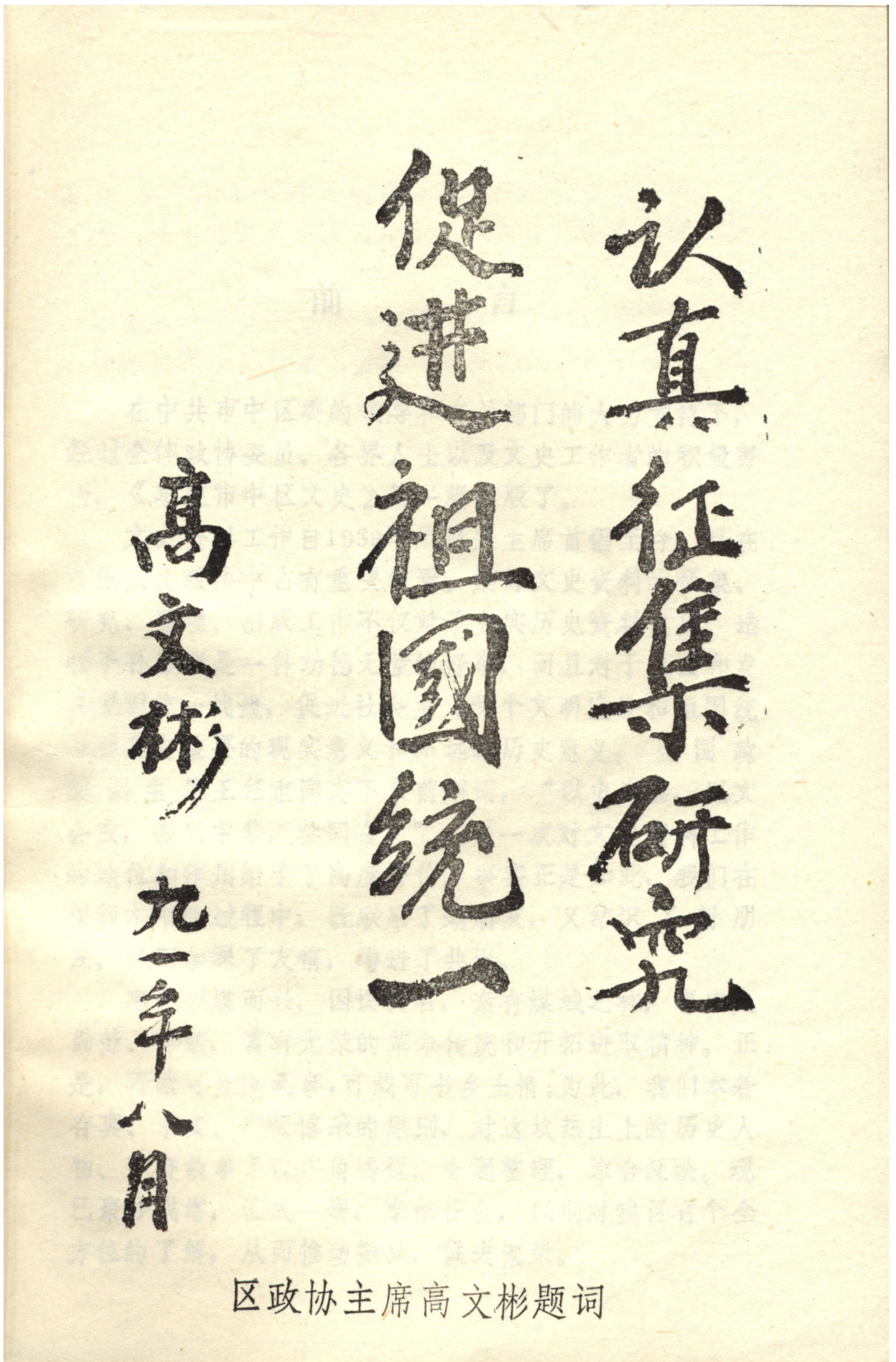
区委书记李仲孚题词



区长高惠民题词



区人大主任杨传玖题词



区政协主席高文彬题词

前　言

在中共市中区委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体政协委员、各界人士以及文史工作者的积极努力，《枣庄市中区文史》第一辑出版了。

文史资料工作自1959年周恩来主席首倡至今，已在各级人民政协中占有重要位置。搞好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整理、出版工作不仅对于充实历史资料宝库、造福子孙后代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而且对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祖国统一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不久前题词："以史为鉴，以文会友，振兴中华，共同奋斗"，再一次对文史资料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既联系了老朋友，又结识了新朋友，从而加深了友情，增进了共识。

枣庄以煤而兴，因煤而名，素有煤城之称；枣庄人勤劳、勇敢，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开拓进取精神。正是：可歌可泣沧桑事，可载可书乡土情。为此，我们本着存真、求实、广征博采的原则，对这块热土上的历史人物、陈迹故事予以广角透视，专题整理，综合反映。现已聚沙成塔，汇成一册，奉献社会，以期对我区有个全方位的了解，从而推动振兴，促进繁荣。

我们恳请各界朋友继续提供合作和帮助，发掘史料，秉笔直书，使《枣庄市中区文史》源源出版，永不止息。

由于我们的工作起步较晚，缺乏经验，加之组稿仓促，资料编辑中必有疏漏、讹错，敬请读者肝胆相照，不吝赐教。

政协市中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九月

目　　录

枣庄……（清）傅尔德（1）
甘泉的传说……（2）
市中区建置概况……刘文耀（3）

初创鲁南铁道队……王志胜口述、张广太整理（8）
滕峄边斗争生活回忆……王鼎新（25）
和平岁月忆当年……张　协（36）
鲁南和谈二三事……韩去非（48）
王明增烈士传略……丛永新整理（56）
我的侄儿鹿广连……鹿传本口述（61）

回忆刘安琪总队长……蒋树柏（65）

清末鲁南画家董志颉……刘学林　董鼎清（69）
　附：岁贡生谥侯董公传
塾师高鸿才先生……庄子云（73）
回忆杨赓昌医师……张　镛（77）

中兴煤矿经营始末……张叔诚　谈在唐（82）
中兴公司包工柜……傅宝森（96）

大辛庄人走过的一段路……文史委 （107）

建国前齐村的普通教育
……蒋树柏(执笔) 傅宝森 吴本生 （123）

武璋创办峄阳中学始末……吴庆华 （131）

漫话“洋街”……吕之文 （138）
枣庄第一家回民餐馆万福楼…… 马金兰（150）

孙美瑶函牍辑录……吴庆华批注 （157）
诱杀孙美瑶……万伯龙 （171）

枣庄回族……文光 （176）
拾遗补阙（七篇） 说书人张文汉（24）
赵文亮侦察（72） 郭子化诗一首（76）
枣庄《抗敌报》（81） 火烧渴口村（95）
枣庄旧时浴池（106） 三班六房（156）
征稿启事…… （190）
后记

枣　庄

其地有煤窑

（清）傅尔德

兰陵城北二十里，　　帝遣六丁发溟涬。
荦确盘郁元雾生，　　虚空迸散直烟紫。
巨垣拖拽轻轮开，　　石根吼动烧劫灰。
陶铸山容走风日，　　增嵘剑气飞云雷。
官棚歌呼振地动，　　北客牵车万牛送。
只闻龙海堆珠盎，　　未容山魈窥银瓮。
混茫开凿地底空，　　老屋绵亘悬当中。
倒掣鲸腹百尺水，　　碎踏鲸腹千丈风。
争睹原隰启幽伏，　　讵信乾坤变陵谷。
买得歌舞成喧颠，　　割宰牲畜轻麦粟。
君不见丁卯年，　　空林饿鬼何联骈。
行人促眉枣庄路，　　冻袋骭髀腊月暮。

（选自《峄县志》）

甘泉的传说

枣庄北有座卓山，卓山后龙山脚下有眼泉。离泉不远住着一户人家：王小开山娘织布，娘俩相依为命。

一天，王小上山砍柴。出门不远听到几声“呱，呱，呱”凄惨的叫声。寻声一望，见是一只绿皮蛤蟆被一条花老鞭长虫盘住了，那长虫正吐着须子往蛤蟆身上凑。王小怒从心起，抡起扁担一下子把长虫抽死了。绿蛤蟆泪汪汪地朝王小“呱呱”叫了两声，纵身跳进了清泉。

这天夜里，王小梦见一个绿衣女子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最后问他：“你要金？你要银？你要聚宝盆？”王小忧愁地说：“不要金银聚宝盆，只要无病无灾的老娘亲。”原来，王小他娘老病缠身，久已卧床不起了。绿衣女再问，王小都是这一句话。及等王小想起来问人家的来历，公鸡打鸣了，绿衣女不见了。

第天清起，王小去挑水，清格凌凌的泉水中水花咕吐咕吐直往上冒。说也怪，水变甜了！娘自打喝了这水，刀刻无肉的脸胖了起来，七七四十九天就下了铺沿儿。

从此，周围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这泉能延年益寿。后来，有人在这里修了座庙，原名是什么没记住，大家都称呼“甘泉寺”，就为甘泉造福一方。

（据李国营、马敬东稿删节整理）

市中区建置概况

刘文耀

展开枣庄市地图，市中区居中偏东，状如麒麟昂首东向。全区地形似西张口之簸箕：北部山岭多有崮顶；东与南部山势平缓。古承水(峄城沙河)上游三大支流由北向南汇聚。俯察四至：东与临沂地区苍山县毗邻，北、西、南和本市山亭区、薛城区、峄城区接壤。东西长28公里，南北宽21公里，总面积39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6.23万亩，人口39.6万人。博(山)徐(州)、枣(园)徐(州)、郯(城)微(山)、济(宁)枣(庄)等公路在这里交会伸延。向南，枣徐公路通连大运河水路；向西，薛(城)枣(庄)支线衔接全国铁路网。城区枣庄，是枣庄市、市市中区党政机关驻地，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枣庄因是铁道游击队的诞生地，蜚声全国；枣庄又因煤质优良而闻名遐迩。

“枣庄”地名见诸文字，目前已见清乾隆十年县教谕傅尔德诗题，题下特意注明：“其地有煤窑”。光绪年间，枣庄成为县北大集市之一，隶属峄县鄫城乡郭南社。1918年改社为区。1928年首建枣庄镇，直属峄县。1930年10月，枣庄镇划为峄县第二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枣庄镇直属峄县。

1926年春，中国共产党在枣庄点燃了革命之火。7月，第一个党支部在枣庄矿区支部成立。1943年7月，在枣庄之北山区组建了枣庄办事处，这是第一个人民政权。1945年5月，枣庄办事处改称为枣庄市抗日民主政府。虽无固定办公地点，但人民政权与统治枣庄镇的日伪、国民党机构同期存在。

1946年6月10日至10月7日，枣庄第一次解放期间，称枣庄特区，隶属鲁南第三专区，辖中心镇、枣庄镇、车站镇、齐村镇、陶庄镇。1948年11月枣庄最后解放，称枣庄行政区，隶属鲁中南第五专区，辖中心镇、枣庄镇、齐村镇、陶庄镇。

建国后，1949年12月枣庄行政区辖枣庄区、庄头区、陶庄区。1950年初设立乡镇。枣庄区辖侯宅子乡、田庄乡、佟楼乡、马宅子乡、车站乡、枣庄镇；庄头区辖齐村乡、尖山子乡、墓山乡、邹坞乡、防备乡、尚庄乡、陈郝乡、院山乡、甘霖乡、杨岭乡、庄头乡；陶庄区辖上马庄乡、西防备乡、齐湖乡、小武穴乡、陶庄镇。是年5月撤销枣庄行政区，设枣庄矿区。12月调整区划，将原枣庄区辖5乡1镇，改称峄县第十区，县直辖。现舆境内之渴口乡、周村乡、税郭镇在建国前后曾一度分别隶属于白彦县、双山县、麓水县、赵镈县等。其余各乡一直为峄县辖区。

1958年9月，枣庄镇、郭村乡、永安乡、齐村乡合并成立曙光人民公社，12月改称枣庄人民公社。现区境东部地区成立了红旗人民公社(郭里集人民公社)和税郭人民公社。此三个公社均直属峄县。

1960年1月7日枣庄市建立，枣庄人民公社隶属枣庄市。次年9月枣庄市升格为省直辖市，枣庄人民公社改属齐村区。

1962年6月，建立枣庄镇(县级)，直属枣庄市，辖23个居民委员会(后合为15个居民委员会)和环围街区的田庄、篦子、田屯、周庄、马宅子、孔庄、邵庄、陈庄、车站、辛庄、利民、振兴12个农业生产大队。1966年初，增立新(窑神庙)为13个大队。1971年12月枣庄镇下设大寨、大庆、东方红三个街道办事处。

1972年1月撤销市辖枣庄镇，建立枣庄镇人民公社，隶属齐村区。

1976年7月，经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建立枣庄市市中区。辖枣庄街道办事处和郊区公社。郊区公社由原垮塔埠公社和枣庄镇13个农业生产大队及渴口公社的佟楼、雷村、小王庄；黄庄公社的沙河子、前石碑；郭里集公社的柳峪、官地；西王庄公社的丁庄；峄城区城关公社的苗庄、秦楼等村组成，合计35个生产大队，47个自然村。

1982年3月，枣庄街道办事处分为大寨路(后更名为中心街)、文化路、东方红路(后更名为龙山路)、垮塔埠、矿区5个街道办事处。

1983年11月，原属齐村区的黄庄、永安、渴口、孟庄、周村、郭里集、安城、西王庄、税郭、齐村10处人民公社划归市中区管辖。1984年4月，税郭、齐村两处公社改称为镇，其余9处公社皆称为乡。

市中区现辖5个街道办事处、11处乡(镇)。全区共有211个行政村，317个自然村。

城区枣庄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至唐、宋年间已形成村落，因多枣树而得其名。今枣庄煤矿东大井以南，大洼以东，清真寺所在地一带，解放前一直名为“枣庄街”。民生街和南马路之间的居民区，现在老人仍习称“枣行”。

城区枣庄是随着采煤业的发展而逐渐扩大的。1308年枣庄附近即有采煤活动。明朝末年，已有“县北窑场”之说。到清乾隆、嘉庆年间“炭窑时有增置”，“漕运数千艘连樯北上，载煤动数百万石”（引文见光绪三十年《峄县志》）。1908年枣庄成立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兴公司)。1913——1934年枣庄煤矿南大井、北大井、东大井先后建成投产。采煤规模扩大，地区经济随之发展。清末民初，在采煤井场周围逐渐形成了一片蓬苇街区，俗称“窑市”。除饮食服务业，有店铺10数家，还有乡土戏园、杂货摊、宝棚(赌场)等。1919、1920年中兴公司将自然窑市改造扩建成十字型中新街(建国后习惯写成“中心街”)。中新街南北路长150米，东西路长90米。东、西、南街首建有圩门。南圩门嵌有“中新街”石刻匾额。这座十字型商业街，逐渐成为枣庄的中心商埠。市民称“洋街”。二十至四十年代，小“洋街”、鱼市街、民生街、北马道、南马道、西马道渐次形成，与金庄、三合庄连袂成片。南马道东西两头还建有城门，夜闭昼开。

1948年枣庄解放时，城区面积0.8平方公里，房屋建筑面积6.3万平方米，人口1.2万人。商业字号75家，工业企业9家。1958年，城区面积扩展到1.4平方

公里，人口猛增到8万人，街道21条总长5.5公里。

1962年枣庄成为省辖市驻地后，城市建设速度加快。至1978年，城区面积扩大到7平方公里，开通、拓宽6条主要道路，构成环形道路骨架。

1982年5月，辛庄、车站、立新(窑神庙)、官庄4个村庄；1985年7月，马宅子、北龙头、南龙头、孔庄、邵庄、杨河6个村庄转为城市居委会，分别归中心、龙山、文化、垮塔埠4个街道办事处管辖。是年，城区面积扩大到15.7平方公里，房屋建筑面积460万平方米，道路总长47.8公里。形成纵有解放路、煤城路、振兴路、青檀路，横有北马路、胜利路、君山路、文化路、光明路为主要干道的城市交通网络。在穿过城区的铁路线上架设了4座立交桥，增强了城市的活力。老城区、新商业街、矿区、工业区、行政事业区、文化区、风景区和9处楼房林立、设施齐全的居民小区，构成了枣庄城区的新格局。

现在城区北与卓山结缘，南与垮塔埠工厂区串连，东逾东河，西逾西河，房屋建筑面积520万平方米，道路总长70公里，人口16万人。

近年来，由于区委、区政府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全区呈现一片欣欣向荣景象：农村经济转向综合经营；工业初步形成了以煤炭、建材、建筑、运输、冶化、轻纺为主导行业的发展体系；第三产业蓬勃兴起；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真是：城乡经济，比翼双飞；文化风尚，万象更新。市中区在前进！

初创鲁南铁道队

王志胜口述　张广太整理

鲁南铁道队自1940年2月宣告成立以后，我们以临枣铁路为阵地的抗日活动进入了有领导、有组织、有目的的斗争新阶段。

铁道队由于游动迅速，出击灵活，歼敌于不意，所以我们在敌人眼里是神出鬼没，在人民群众眼里是来无影、去无踪。慢慢地，人们给我们送了个“飞虎队”的美名。

全国解放后，当时的战地记者刘知侠同志根据采访、掌握的材料加工整理，写了一部小说《铁道游击队》，一下子轰动了全国，人们都知道枣庄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而不知道这支队伍的真实番号。

当年我在鲁南铁道队一直任副队长，现在时隔40多年，加之年已古稀，又没有文化，只能回忆一些印象最深的片段，恐怕还差三略四，不足的就靠其他老同志补充了。

奉命出山

1938年3月，我与洪振海同志在枣庄西边的墓山参

加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3大队。我们随义勇队在峄滕边战斗了近半年的时间，后跟部队转移到临沂县的埠阳。这时，我在第3大队3连3排任排长，洪振海在这个连当1排的排长。一天晚饭后，3大队钟教导员把俺俩叫到队部，说："张(光中)司令和李(乐平)政委指示，让你们俩执行一个特殊任务，现在马上回去交待排里的工作，明天随我到山里集训。"俺俩询问："到底执行什么任务？"钟教导员说："待您学习完就知道啦！"就这样，我与洪振海当晚分头交待完工作，第二天吃过早饭，随钟教导员一起调离部队集训去了。参加集训的只有我们两个人，住在一个破茅草房里。房的主人是一位非常和善的老大娘，对我们特别亲热。钟教导员白天带我们学习，晚上还得回大队照顾部队。我与洪振海同志共集训了两周的时间结业了。回到义勇队总部，张光中司令又关切地与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语重心长地讲到了枣庄如何开展工作，着重强调了保密、纪律和联系群众问题。要求我们处理问题要机智、果断，情报要及时送出，要有敢于为革命牺牲的精神等等。分别时，张司令把随身用的一支20响驳壳枪交给我们说："你们要利用它多从敌人那里缴获武器，装备自己，支援部队。"

一 打洋行

1938年10月5日下午，我与洪振海同志离开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3大队(已改称直辖4团3营)驻地埠

阳，第三天晚上回到我的老家——枣庄火车站西旁的陈庄，设立了枣庄情报站。俺俩在我家隐蔽了几天后，为迷惑敌人，便造舆论说："我们已不干义勇队了，在那里太苦，还是在家好。"从此，洪振海还是以扒火车上的炭为掩护，过流浪生活。为弄到敌人的情报，我便托关系进入了枣庄国际公司(群众称洋行)干搬运工。这个洋行由3名日本军官操办，经营五金、布匹、日用百货及油盐酱醋等，全部都是日本货。3名日本人表面上是洋行的3个掌柜的(经理)，实际都是搞我们情报的特务。我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把从洋行里得到的情报和从枣庄火车站上侦察到的日寇兵力、运输、后勤供应情况，都及时地告诉洪振海，洪振海再将情报送给住在小屯的峄县二区区委书记兼交通员刘景松同志，由刘景松送往山里的抗日义勇队总部。我在洋行秘密地工作了半年以后，日本人不仅对我毫无怀疑，还有时赞扬我："王的，大大的好人！"这时，我与洪振海商量，决定利用鬼子麻痹之际，立即将其铲除。我俩只有一只手枪，武器不够。于是，我们便找到跟国民党50支队司令梁继璐当警卫员的宋世九说："洋行里有很多钱，我已看好了，咱们一块搞去吧！弄来咱们对半分。"宋世九当场答应一块干，并负责借两支短枪。1939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们3人摸进洋行，将正在熟睡的3个日本特务当场打死，随即安全撤出。第2天早上，我为侦察情况，象往常一样到洋行上班，谁知三掌柜的金山没被打死。我一进门，见他捂着伤口喊："王的，快快地电话的有！"我装作挺认真地到车站打了电话。警卫车站的

日本兵来了1个中队，将洋行全部包围了，金山被马上送到医院抢救。这次打洋行，我们共缴长短枪各1支。事后，我们给宋世九1支长枪，我们要了那支短枪。

从此，我和洪振海每人都有1支短枪了，实现了张司令的“从敌人那里缴获武器武装自己”的第一步计划。

事后，枣庄日军费了很大劲进行调查，断定是山里八路军游击队干的，对我和洪振海仍无察觉。为了挡敌人的耳目，我在洋行继续干搬运工。三掌柜的金山出医院后升为大掌柜的。他感到我有救命之恩，对我仍是信任的。可是，洋行防范更加严密了。于是，我与洪振海商量，再搞点武器后，退出洋行，以开炭场子为掩护，发展武装，开展抗日工作。

飞车搞枪支

1939年10月，我在枣庄车站上发现有部分武器弹药准备用火车运往临城。这天下午装车时，我专门在车皮上做了记号，并把准备搞下来的机枪、步枪和子弹放在离门口近，而且便于搬运的地方。车厢门按日本人要求，必须用四股粗铁丝拧紧。我却把铁丝只拧在1个车门鼻子上，然后向另一边一弯。外表上看，车门好象拧死，实际上很好开。装完车，为推迟开车时间，我又让在铁路上干事的李金山将车搞坏，晚上8点才修好。于是我马上通知了洪振海开车的时间，爬车的方位，开车厢门的方法及武器弹药放置情况等。洪振海又约定刚

参加我们情报站工作的曹得源同志。计划妥当以后，我提前到达预定地点。夜晚9点左右，火车徐徐开出，刚出站，洪振海与曹得泉同志跃上火车，迅速地进入放武器的车厢。待火车向西行走5华里，进入我们预定地点——王沟西侧时，他们将包扎好的两挺机枪，12支马大盖步枪，两箱子弹掀下火车。我马上将这些东西收集在一起。待洪振海他们关好车门，跳下火车后，3人齐动手，将这些武器弹药运往蔡庄赵永源家的地瓜窖里暂时隐藏。第2天由刘景松同志将这件事报告给义勇队总部。当夜，张司令派了一个连队来将武器弹药取走了。

义合炭场

1939年11月，苏鲁支队（抗日义勇队改称）首长指示要迅速发展抗日武装。我借故辞去了洋行搬运工的差使，开始与洪振海筹备开炭场子，以炭场子为掩护开展抗日工作。时隔不久，我们又发展了曹万青、李云生、徐广田、梁传德、王志增等同志参加情报站工作。经过几天的筹备，炭场子在陈庄正式开业。洪振海任经理，我当副经理，人们称我们炭场为“八大股”。炭场子开业以后，买卖还算兴隆，每天往里进炭的和买炭的络绎不绝。

我们8名同志靠根生土长、人熟地熟的便利条件，白天表面上忙忙碌碌地买卖，实际上都能侦察到敌人的情报。到了夜晚，多数人扒煤车搞日本即将掠夺走的煤炭。所得的情报也利用这个时间送出去。我们的炭场子

利润是挺大的，因为货源几乎不用本钱，或者用钱很少，卖的炭钱80%是赚的。我们将这些钱除上交支队和自己消费外，还买了两支短枪。日本特务对我们的行动毫无察觉，后来金山见了我还竖起大拇指说："王的，发财大大的！"

正式任命

1940年1月，我们炭场子越办越兴旺了，又发展了赵永泉、王志友、曹德清入了"股"，这时全场11个人。这些同志多数是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从小靠吃"两条线"长大。因此，都没有文化。他们的家庭和亲友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日寇的欺压和残害，对日寇都有刻骨的民族仇恨。他们对我和洪振海都非常信任，我与洪振海同志对他们也抓得很紧，规定的纪律，他们都能遵守。俺俩认为，正式创建铁道游击队的时机已到，于是，向苏鲁支队首长写了报告，说我们可以马上拉起武装，要求派领导来，并给予正式委任。苏鲁支队首长很快就给予了正式答复，同意我们的报告。

1940年2月的一天晚饭后，刘景松来炭场子找到我与洪振海说："上级派人来啦！请你们二位明天下午到齐村去领。"俺俩听到后喜出望外，感到这下子有靠山了。当天，我们又秘密地对炭场子的骨干做了些工作，让他们也做些准备。第二天正赶上齐村逢集，又遇日本军队"清乡"。到了下午，待日军"清乡"完了，集散人稀的时候，我与洪振海到了离陈庄只有3里路的齐村

西门里，见刘景松领着一个象山里农民打扮的人。只见他中等身材，瘦长的脸上长着两腮帮子胡须，身穿不合体的青色而且露着棉絮的破棉裤、棉袄，头戴一顶一把撸的旧黑线帽。他身体健壮，举止稳重，讲话非常有礼貌。仔细看去，上级派来的这位领导也不过30岁。刘景松介绍："这位同志叫杜季伟，原是苏鲁支队4营副教导员，奉张司令、李政委指示，来这里担任你们的领导。"我与洪振海当场表示欢迎。随即我们4人到附近的一个饭馆里，以商谈生意的样子买了1斤白酒，4个菜，两斤烧饼，以示欢迎。老杜当时不会喝酒，经过再三劝，只沾了一点。我们边吃边啦，老杜说："我以前是教书的，现在公开身份是您炭场子的管账先生，你们以后称我杜先生好了。"接着，我与洪振海同志向他汇报了枣庄一带的敌人的活动及分布情况；我们炭场子人员思想情况和每个人的出身历史以及他们的特点。老杜听得很认真。当汇报到大家要求拉起武装来打日本鬼子时，杜先生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此比较安全，便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了苏鲁支队张司令、李政委的任命书说："首长指示让我们马上拉起队伍，名子叫鲁南铁道队，这是任命书。"我与洪振海接过任命书，但是谁都不认识。刘景松接过去帮我们念道：

枣庄情报站洪振海、王志胜同志：

报告收悉。一年来，你们在对日寇斗争中做出可喜的成绩。

经研究，你们可立即成立铁道队，隶属苏鲁支队建制。

特命如下：杜季伟为政治委员，洪振海为队长，王志胜为副队长。此令。

苏鲁支队司令员张光中

政治委员李乐平

参谋长胡云生

政治部主任李荆山

1940年1月25日

我们听完任命，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一年多秘密活动快要结束了，从此可在政委的直接领导下拉起队伍，与日军大干一场。担心的是，支队首长对我们这么重视，我们才11个人，给我们派来了营级干部，又任命我们两个小排长当队长、副队长，我们不干出名堂来，可对不起上级党和首长的关怀。于是，我与洪振海对新来的政委表示："老杜同志，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们保证听你的。"杜季伟认真地说："不能那么说，咱们应听上级党委、首长的。再说，你们已秘密搞了一年多了。有经验，又都是当地人，情况熟悉，咱们应该研究着干。"接着他又传达了上级首长对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立即扩大武装及怎样做队员的思想工作的指示，还强调了组织纪律、保密等注意事项。我们听了，感到老杜讲的很有道理，很有水平。经过短暂的接触，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黄昏时分，我与洪振海带杜季伟来到炭场子。晚饭后，召集炭场子11名同志开了秘密的欢迎会。会上，由杜季伟宣读支队首长的命令并讲了话，洪振海和我也都讲了话。从此，苏鲁支队所属鲁南铁道队在日本军队的眼皮底下的小陈庄正式诞

生了。我们对外的合法身份，洪振海仍任炭场子经理，我任副经理，杜季伟同志为炭场子管账先生。

教育整顿

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以后，人员不断增加，在杜政委的教育下，队员们的组织纪律、生活作风逐步走向正规，生意也更加兴旺了。但是，这支武装要成为一支机智勇敢、行动敏捷、纪律严格的游击队还相差很远。队员中的不良作风，如吃喝玩乐、歪戴帽子、斜着眼、说话带骂的流氓习气时有发生，甚至还有其他不规矩的作风。时隔不久，由杜季伟任书记，我任委员的党支部诞生了。根据杜季伟的建议，报请苏鲁支队首长批准，于1940年4月，在枣庄西南约10华里的小屯，办了一个训练班。炭场子这时已发展到15人，抽出了7人，由洪振海带队，杜季伟主讲，计划办7天时间。办训练班期间，我仍带着其余8名同志开炭场子。后来听说由于队员们散慢性大，不愿蹲下来学习，加之训练内容脱离实际，不适合队员的口味。如讲人类进化由猿猴变人时，有的就说："日本鬼子称我们为'毛猴子'，您为什么也唱鬼子的调？"这样，训练班仅办了5天就结业了。尽管时间短，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打架骂人的现象少了，集体观念、保密观念以及组织纪律性都有所增强。在学习军事技术时，由洪振海队长等介绍了侦察、爬火车、破铁路、杀汉奸及搞情报的经验，大家收获很大，初步懂得了铁道队是干什么的，怎么干法，应注意些什

么等等。以后，我们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对队员中的缺点毛病能及时教育，个别谈心，帮助纠正。对极个别错误严重的同志，也采取了组织或行政纪律的手段，逐渐培养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我们铁道队由于人员不断增加，炭场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由原来的一个炭场很快发展成两个和十几个焦池。在组织上，开始必要的分工，队员都有公开的身份和秘密职务。铁道队除基本队员外，还有外围军，象铁路工人、矿警队、铁路警察及各行各业的工人都有，敌人的军事活动及经济情报一般我们都能及时掌握。我们搞日军物资的技术手段越来越高明，分工也越来越细、越严密。我们按照八路军的纪律要求，把搞来的钱50%分给队员做生活供应，10%作为办公费，40%的上缴或者购买武器、弹药。3个月以后，我们又增加了10多支短枪。武器增加了，队员的胆子也大了。

炭场被抄

鲁南铁道队成立半年来，由于我们领导上的单纯军事观点以及急于和日军大干一场的指导思想，在敌人的眼皮下过于刺激了敌人，终于引起了日军和汉奸的注意和监视。1940年5月的一天，队员李玉芝无意中将铁道队的情况泄露给一个干伪军的亲戚，后来他们因借钱闹翻，李玉芝被告是铁道队员。第二天拂晓前，两个中队的日本兵包围了陈庄。队员多数是本村人，在乡亲们的掩护下绝大部分安全突围。政委杜季伟当夜住在炭场

子，突围时，他急中生智，迅速换了一身破衣裳，越墙到隔壁瘸老头那里借了一副货郎挑子，装作瘸子，一瘸一点地向火车站走去，鬼子以为是那位货郎瘸老头，毫无戒意。他逃出陈庄后，丢掉货郎担，飞快地朝我们约定的集合地点蔡庄奔去。这次日军包围炭场，捕去了李玉芝、李云生等3名队员。我们的炭场子和焦池也被没收了。在陈庄不能存在了，只好把活动基地迁移至枣庄西面的齐村。由于我们的外围关系多数没有破坏，枣庄的情报还是能及时得到。弄鬼子的煤炭不方便了，便公开以八路军铁道队的旗号与铁路线的日伪军展开了激烈地斗争。

打 票 车

1940年7月，抗日战争行入残酷阶段，日军“扫荡”频繁，部队缺乏活动经费。这时鲁南军区刚刚成立，苏鲁支队司令张光中同志调鲁南军区任司令。从此，我们铁道队隶属鲁南军区领导。一天，鲁南军区来函，要我们弄一部分资金，以解决部队暂时的困难。我们将开炭场结余的8千元钱大部上缴。但是，这些资金对鲁南军区所属部队的困难来说，还远远不能解决问题。我和洪振海、杜季伟等同志商量，决定搞一次鬼子的票车。根据以往所了解，微山湖大队的张新华队长认识临城跑连云港的车队长张秀盈。我们派人找到张新华，又通过他从张秀盈那里得知，每周的星期六，沿途各站都通过这趟车向济南交钱。目前已到月底，交的钱

一定会更多。我们又派了刘炳南、周庆仁化装跟车到临城侦察，摸清了押车鬼子、伪军的数量以及他们的生活特点、军事技术状况等。

按照打票车的行动计划，我们挑选了12名作战勇敢、处理情况机智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潜入列车上侦察日军的情况，选好目标，稳住敌人。我带12名精干的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埋伏好。洪振海和曹得清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星期六的这天，赵永泉、刘炳南等人分别带领队员化装从泥沟、峄县城、枣庄上车。可是他们到了车上一看，发现日军比原侦察的人数增加了10多个。经他们了解，这部分日军是由枣庄到王沟换防的1个小队，装备齐全。面临这一新的情况，队员们都信心十足，毫不畏惧，各自盯着自己的目标。有的同志还拿出事先备好的烟、酒、点心和烧鸡来“慰劳太君”。日本兵见这些工人、农民、商人打扮的“乘客”这么“实在”，并没有在意，也就与队员大吃大喝起来。列车过了枣庄站，洪振海和队员曹得清熟练地跃上火车头，打死了1名身穿日本服的司机，另1名司机喊求饶，洪振海一听是枣庄人没杀他，迅速将他捆住，又用毛巾塞住嘴推到机车内的一个角落。曹得清驾驶着火车向前行驶，按计划拉响警笛信号，队员们闻声后，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列车一出王沟，猛一刹闸，车速放慢，我带领12名短枪队员敏捷地爬上火车，与早已在车上的队员互相配合，20余名日本兵全部被杀死。我们又到最后一节车厢，将装钱帆布袋子抱下车，立即撤出战斗。参加战斗的32名队员无一伤亡。这次打票车共得到

8万多块钱。并缴获短枪8支，长枪12支，手炮1门，机枪1挺。这些战利品，经上级批准，除留3支短枪外，其余全部上交了鲁南军区。

二 打洋行

打完日本票车后，我们鲁南铁道队又吸收了部分队员，经过简单地整顿教育，队员们的精神更加振奋，抗日必胜的信心更足了，个个摩拳擦掌，要求趁热打铁，再给枣庄的鬼子点颜色看，以打击敌人的气焰。我们看到队员的情绪这么高涨，心里特别高兴。于是，经充分研究，决定再打一次枣庄国际公司，来一个第二次血染洋行。

1940年8月下旬，我奉命化装回枣庄侦察。因第一次打洋行以后，鬼子对洋行的戒备严得多了，院墙的四周都架上了电网，门口放了岗，不准老百姓去买东西。洋行里鬼子增加到13名，全部是日军从战场退下来的军官。这时，洋行里没被我们杀掉的三掌柜金山已失宠，日本特务机关又派来了特务老手、矛山郎中将任大掌柜的，金山被排挤到洋行外面住。经过一番努力，我没能够混进去。回到铁道队以后，经过一番研究，也未找出个好办法来。正在这时，鲁南军区来通知，让杜政委去汇报情况。杜政委说："我到军区顺便请示一下，听听军区首长有好办法吗？你们可继续想办法弄清洋行的情况。"

杜政委走后，我与洪振海商量，时间紧迫，咱们想

法再试一次。他把队员安排好，俺俩又进入枣庄侦察。到了洋行附近，洪振海到了一个茶摊上喝茶，侦察外面的情况。我拿着一个大酱油瓶子，装作买酱油向洋行门口走去，正巧碰到了金山。我虽知道他已受排挤，与新上任的洋行特务头子矛山郎有矛盾，但对金山目前的详情了解得不太清楚，我怀着疑惑的心情朝金山走去。金山笑嘻嘻地先开了腔："王的，什么的干活？"我说："买酱油的咪西。"他又问："怎么不进去？"我答："进不去。"他说："我的带你进。"

我跟着金山顺利地进了洋行的大门，先到了卖洋布柜台，接着又看了卖五金的。金山边走边介绍，并推荐我买。我说："没钱。"他说："你的发财的有，怎么没钱？"我象以往一样，亮出大拇指说："三掌柜的现在这个的有，你才是发财大大的！"金山沉下脸气愤地说："哼！哼！我的已经不在洋行的。"他边说边指着矛山郎的住处说："他的大大的坏的！"听到这里，我心里完全明白了，原来的情报还是准确的。我随金山又看了几间屋，其中有一间屋我想进去，金山说里面有大掌柜的家属，不让我进。我把日军的住处都弄清以后，便向卖酱油的柜台走去。我打了3斤酱油，正想交钱，一掏没零钱，金山上来替我交了。我也没客气，借找钱的工夫，提着酱油瓶就出了洋行。金山等找完钱，回头见没人，马上出门追上我，并比划着手势对我说："你的铁炮的拿来，他们统统死啦死啦的好！"我装作没听懂，他又比划着用枪的样子。我说："咱不玩那家伙，我的酱油等着咪西的！"我立即离开了金山，找到洪振

海，我们飞也似地回到了齐村。

当天，我把侦察来的情况介绍给铁道队的同志，大家经过认真地分析研究，认为马上行动比较好，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即是金山靠不住，敌人也来不及布防。于是，确定去32名队员，分成5个组，队员们分别带短枪和大刀片。一计算，大刀片不够，我们通过齐村自卫团地下党员王磊同志借了好几把大刀片。武器备好后，又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当晚10点钟我们到了枣庄洋行附近。洪振海先干掉了在门口的日本警卫。大家迅速绕到洋行的院墙的南面，因墙高，并架有电网，不便越墙，我们便手持铁钎和大锤在院墙上打起洞来。为了防止出声音，曹得清同志找了一条破麻袋包上，声音稍小了些。因为墙壁很厚，铁钎上又包着东西，挖洞的进度很慢，直到第二天清晨4点钟才挖通。我们进去4个组，每组4个人，配备1支手枪和3把大刀片。洪振海带一短枪组在外面掩护。我在院子里任总指挥。战斗组按预定的方案，各奔自己的目标，三下五除二，分住在4间屋子的日军全被干掉，三四分钟解决战斗。我们正准备集合撤出，发现梁传德那个组还未到。我过去向那屋里一看，1名日本兵手持白腊杆正在与梁传德搏斗。我用手枪一点射，将那日兵击毙。待我们准备撤出时，火车站上的日军已发现洋行出事，探照灯不时地朝这里扫射，日军队伍很快地包扑过来。我一看情况很危机，再从洞口出去已来不及，命令一名队员砸锁。那队员很机灵，将随身带的大斧头取出，只听“咔喳”两声，大锁砸开了。队员们在我和洪队长的指挥下，迅速冲出洋

行，朝预定地点奔去。这次夜袭洋行，杀死13名日兵和1名日本翻译，缴获长、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块。

我们第二次血染洋行胜利地返回驻地齐村后，天已大亮，杜季伟政委也从军区回来了。他听了我们的汇报，特别高兴，并表扬了战斗中完成任务出色的同志。接着，杜政委传达军区指示：为配合山里反扫荡，铁道队要立即破袭临枣路，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我们奉命于1940年9月的一天晚上，出动30余人，并发动沿路的上百名群众，将临城至枣庄的铁路支线扒掉铁轨3里多，砍断电线杆100余根。我们搞下来的这些铁轨、枕木、电线和电线杆，能运走的全部运走，不能运走的就地破坏或埋掉，再不然就扔进水坑里去。反正叫敌人一时修不好。

铁道队拉起来才几个月就袭击日军十几次，沉重地打击了临枣台铁路线的敌人。敌人恼羞成怒，在车站上不时地搞戒严，加强防务，在火车上也增加了武装押运人员；凡是我们截过火车的地点，他们都增设了据点，还不断地对这些地方派出人马搞“清乡”，安插特务搞监视。他有关门计，咱有跳墙法。咱有党的领导，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人熟地熟；他在明处，咱在暗处，能合得拢，散得开，打得准，截得住。敌人对咱是捕不着，抓不住，所以干发急。

我们在临枣台线上的活动，也鼓舞了人民群众。兄弟爷们儿在公众场合虽然不能高声大嗓谈论，可一伸手比划个“八”字，谁的眼里都透出一种亮光。我们的行

动也启发、教育了一些靠“吃条两线”（在铁路上搞物资谋生）的青年，他们有时也学着我们的样干两下，搔扰日军运输。后来，他们在当地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也成立了铁道队。1940年7月，鲁南军区将三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杜季伟任大队政治委员，洪振海任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

没用半年，我们原先12个人的铁道队发展成了有4个中队的鲁南铁道大队，人多了，枪多了，仗也越打越大了，铁道队也更响名了。

说书人张文汉

三十年代初期，枣庄街头有一个说书的，微山湖西一带人，名叫张文汉，身材中等微胖，外号“张胖子”。据说，他是清末廪生，因词讼受挫而辗转枣庄街头，以说评词（评书，枣庄人称“啦大呱儿”）维持生计。除了白天赶四集，傍晚还在白骨塔之西，火车道以东的空地上设场。主要说《两汉》、《粉妆楼》。他文学功底厚，才思敏捷，善于制造悬念。有时还将历史与时事掺杂起来，今古同烩，使听众兴味盎然。他在枣庄说书两年多，病重返乡，不久故去。听众在无聊时编出了一个颇含遗憾的歇后语：“死了张胖子——没呱啦了”，隐指“无话可说”。

（周景宏讲述）

滕峄边斗争生活回忆

王鼎新

一

1938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枣庄、峄县。“死也不当亡国奴！”这是国民共同的声音。于是各地纷纷组织抗日武装，情绪慷慨激昂。

当时我36岁，正身强力壮。在家再也蹲不住了，我就约合几个伙伴，到北庄黄龙洞买了3支大枪，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不久，战地服务团改为人民抗日义勇队，张光中任总队长兼一大队队长。我编在朱玉相、朱道南、刘景镇领导的三大队，驻在邹坞北八里墓山。

我们的第一次战斗，就是在甘霖山伏击由枣庄开往徐州的敌人。没料到敌人有两万多，寡不敌众。队员沈兆安牺牲了。但是，我们也抓获了一个德国人，叫马克理，他名义上是神父，实际是间谍。为了给死难的战友报仇，在庄头东南磨石塘把他枪毙了。

这一仗后，接着消灭了与我们为敌的顽固武装头子马卫民。7月和申从周打了一仗。不久，又去攻打东江大地主刘广田的圩寨。圩寨还未打开，上级命令我们北撤山亭，东去徐庄。不料，从山亭向徐庄转移的路上，

我部突然受到土顽栗凤翔、张殿琛、刘广田等反动武装截击，造成很大损失。当我们由徐庄东去大炉时，天降毛毛细雨，道路泥泞，在大安一带又遭到费县土司令李以锦的阻击。七绕八转，整整走了一夜，直到天明才到达高桥。稍事休息，大家又忍着饥饿奔向大炉。到大炉后，受到开明士绅万春圃的热情接待：供给肥猪3头，煎饼、馍馍各半。大家饱餐之后，转移车辋，又转移至兴明、华严寺、沙埠。

当时我们的处境极端困难，一切供给全靠地方。每人每天只有2分钱的菜金，油、盐、豆腐等还得向地方要。我担任大队军需兼书记长，工作十分艰难。以后，部队改编为张里元的直辖四团，我被任命为团军械官兼被服主任。后来首长让我带人去雾家后村找梁继箴要子弹钱，钱到手后我让随从先期带回，我顺便回家看望，当时正值春节。

1939年9月，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来到鲁南，打开了孔庄、文王峪，地方抗日工作复加活跃。我被邱焕文同志约定参加峄县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前，先在东庄成立县动员委员会，主任朱道南、邱焕文，组织部长田瑶峰，武装部长刘树一（后当了汉奸），我当选为总务部长。不久，峄县政府成立，潘振武任县长，朱道南任民政科长，张杰三任财政科长，房兆义任武装科长，岳聘农任秘书（后两次叛变）。县机关游动于抱犊崮、青石岭、南泉一带。随着形势的恶化，地方敌顽势力猖獗，县府曾两次遭敌伪袭击。民运部派到各区担任指导员的主要干部均难以支持。

1940年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上派我到老三区任政治指导员，领导区政府、区团部和区动委会工作。区政府驻在龙门观。

日军野旅的碉堡设在东岛山。左右村庄皆受威胁。地方上，各村推举官庄村村长蒋文政出面与日军接头、送礼，承认伪化。在这件事上，我们同区委工作团考虑不周，作出了过左的行动，在蛤蟆洞召开天喜庄乡上层人士代表大会，当场捆绑了3人，将蒋文政公审后由曹杰主任视身执行枪决。幸而天黑，执行时3枪均未中要害，蒋才得以脱身逃走。接着敌伪势力不断向县区疯狂进攻。区长姜××，区团长张××，财政助理员张××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均先后妥协逃跑。只剩下我和建设助理员隽茂淮带领区队20多人，在高庄、东西阳泉一带坚持斗争。

11月，全县伪化，专员于化琪在白山召开了三天县、区长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各区长全部去滨海抗日建国大学受训，这是上级为了培养、保存干部所采取的措施。去滨海学习的区长有：田培荃（一区），崔玉柳（二区），王鼎新（三区），孙景杰（四区）。五区和六区的两个区长故意躲藏未去。

我们从鲁南专署同省府民政处处长陈明同时转道费北，经青驼河、汤北大山至滨海抗日建国大学，都是夜间行走，渡过多道河流，11月的天气，赤足蹚水十分寒凉。

二

抗日建国大学分为普通队和高级队。我同孙景杰、

邱焕文分到高级队。

学校生活十分紧张。课程设有政治和军事两部分。政治部分占十分之七，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论党》等。军事部分重点为《游击战争》等。给养是小米、大饼、面条。菜金比地方略高。纪律很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课余帮助驻地群众进行农业生产劳动，大家的热情十分高涨。我们在莒县大店学习了五个多月，麦收后毕业。

在学校学习期间，陈明同志对我们高级队十分关心，曾几次来信询问情况。毕业后，按指示我们去省府驻地果庄报到，在那里学习了3个月的司法工作。学习刚结束就接到立刻回鲁南的命令。我们赶紧收拾行装起程。由于日军正向我沂蒙地区大举进攻，我们只好连夜爬龟蒙顶，转泰宁办事处，经邹县东绕行，18日到达滕峄边区。这时我们才知道陈明同志和团副牺牲了，一部分抗大教员以及学员在残酷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田培荃被俘。

三

1941年11月底，我由抗日大学回到区委驻地涧村，参加区委召开的干部扩大会议。会后被分配到滕峄三区，合建滕峄边办事处，任徐庄区（二区）副区长。区长是陈正寅，系统战人士，他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其父与先父系至交，又是乡邻，我们感情比较融洽。加上他的社会经验丰富，因此工作较为顺利。但是，当时的形势和环境是很艰险、残

酷的，敌、我、顽三角斗争，此伏彼起。鲁南最严重的时刻只剩下由抱犊崮到天宝山一线的活动范围。我方的辖区很小，被挤在各派势力的夹缝中：东北有顽固派李以锦；西面有申从周、刘宇华、张殿琛；南面有伪军巩玉勤；国民党的正规军盘踞在九女山、天井、汪驼衣一带。他们不时专向我党、政、军偷袭、夹攻。为此，区政府工作多偏重于武装护送干部过境。

1942年11月，敌伪对我紧缩封锁圈，因此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十分尖锐。我们发动群众每天夜里到磨泉、横岭、田庄、文王峪、涝坡北山拆除敌伪修筑的封锁墙晚上集合民伕三、五百人，从9点半钟开始，到田庄南山破袭，连续搞了两个星期。与此同时，我们还率区队30多人，配合独立团的一个连和一个机枪排，打掉了孙家庄北山顶（即罗圈顶）的碉堡。击伤伪军龚五，打死了汉奸乡长兼伪中队长巩玉勤的堂弟巩玉阶。伪军为了报复，将我妻和五岁的小儿子如才（即用钊）捕去，关押了一个多星期。后乘机逃脱。家中财物被抢劫一空；牛、驴、粮食、衣服、被褥等席卷净尽；家具、炊具全部捣毁；连我老母的寿木也被抢走。我母亲带着两个孙子及两个孙女为避难在田庄、徐庄、北孙庄一带转来转去，十分艰难困苦。一个冬天全靠我政府救济的500元（合现在50元）北海币支撑着流亡生活。

四

1943年3月，国民党92军的李仙洲所带的一军人马

在津浦铁路的界河一带被日军打垮。他们开进鲁南时，只剩下一师人。当时的中共山东分局和鲁南区党委片面强调统一战线，指示各级党、政、军禁止抗拒中央军（92军）。我们有些地方的群众遭到92军的攻击、破寨、抢掠、杀戮，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不能去救援；群众自卫反抗，我们也不能支援。不仅如此，我们自身在一个月之内也几次遭到92军的猛烈进攻。

92军的反共劣迹和我们的无原则忍让，助长了地方顽固势力的反共气焰，他们将我党、政、军挤出了滕峄边区。我同主任孙毅然带县大队一个排，由横岭突围到河口、千佛崖一带，乘夜东进到达抱犊崮山区。以后又出山插到运北县、峄城、韩庄、临城（今薛城）之间。这时棠阴、阴平一带碉堡林立，我们在敌后穿插活动，经常与敌人打遭遇战，而且常受敌军清剿袭击，生活十分困难。这样过了50多天，地里的庄稼起来了，我们靠着青纱帐又进入了山区。我担任了费县高山区区长，在高桥以南、抱犊崮山北活动。

为了打开局面，我们集中了11个连的兵力在费县郑城一战，打垮了92军的一个师部，打死师长刘春岭，副师长牛荣伍（绰号黑头）负伤。然后，我们又回到二区，我仍担任二区区长。

12月双山县成立，我被调到县府任司法科长。不久，鲁南区党委部署检查群众观念，继而又开展了反右斗争。

五

1945年2月，我调回峄县任八区区长。一天，天已

大亮，我只身进入崖头村。这时一位妇女见我进村大惊失色，又是摆手，又是摇头暗示我不要前进。我知道有情况，为了弄清楚，我仍然勇往直前，没走几步就发现有伪军三、四百人集结在对面村口休整。在相距约50米时，他们发现了我，我急发3枪拔腿北撤。敌人喊叫着涌进村子，随我身后猛追。追至苗庄，他们受到来接应我的区队和民兵的阻击，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我退到龙山头与区队和周村的民兵会合，对进攻苗庄的伪军予以坚决还击。当时我与民兵宋思荣同志并肩作战，忽见敌弹稠密，急呼散开时，不料宋已中弹倒地，我赶紧安排人把他抬回周村抢救。至中午12点，伪军大肆抢掠、并焚烧民房。苗庄的村团长张家信、李文正等几个人看到伪军焚烧村庄，气炸了，指挥猛烈强攻。他们带头冲锋，竟将几百名敌人追散。一直追到崖头以南，伪军终于被我区队和民兵打垮。

自此，我们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还多次支援了邻区。因为敌伪军经常由税郭、郭里集出动向赵镇县（今苍山县）境内的四、六两个区骚扰。为此，我们多次增援他们打退了敌人。无形中，我们八区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也高了。

1945年9月，日军无条件投降后，我们一些同志产生了享乐思想。凭经验我和这些同志的想法不同，作好了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八区区政府在郭里集，当时新四军七纵队也驻扎在这一带。12月下旬，七纵打掉了小窑（今陶庄），我们动员了千余名民工到韩庄至临城（今薛城）铁路段破路平沟，往返半个月，任务特别艰

巨。攻打枣庄时，我们派出民工抬担架，运送给养，大力支援前线，终于迎来了枣庄第一次解放。

六

1946年10月，蒋介石向我们发起了全面进攻。齐头并进的战略遭到惨败后，改为重点进攻我西北和山东老革命根据地的方针。进攻山东的蒋军共72个师。

峄县是鲁南的门户，是蒋军由江苏进入山东的必经之路。蒋介石把冯治安的三个师放在韩庄、万年闸、台儿庄。从此，峄县地区出现了国共双方“拉锯”战局面。峄县城自从日军占领到淮海战役前，先后被攻打5次之多，把个县城打得稀糊烂。枣庄先是王继美盘踞，王被我们消灭后，蒋介石又派51师驻守枣庄，77师和59师也是进进出出。

1946年冬季，峄县全境除八区外全部顽化。当时峄县按地区划分为峄东、峄西两大片。峄东以哨里为后方，大部分地区可供我们公开或半公开活动；峄西则为敌人严密控制。地委指示县委：要挑选精干人员插入敌后，隐蔽斗争，在敌人心脏伺机袭扰和出击。为此，县委成员作了分工：书记汪星掌握全面工作；副书记雷文和组织部长王磊去峄西，以二区的南、北圩作为去峄西的跳板，领导三、五区坚持斗争；孙文成同志担负以临城地区和马头、陈郝为依托向二区和峄西插入、跳出及挤进去的任务；我在峄东活动。

县委的同志们在接受和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上十分

坚决和勇敢。雷文同志表示，一定同峄西人民共存亡，坚决与顽敌拚到底。汪星书记经常在峄西、峄东之间插入跳出。当时形势十分严峻，由峄西到二区再跳到八区，中间要经过枣庄、郭里集，敌人重重分割、封锁，必须绕弯子、兜圈子，躲避敌人的警戒，往往一整夜的奔走都插不入、跳不出。

1949年初，鲁南战役之后，冯治安指挥的77师、59师国民党军曾两进枣庄。6月，峄县全境基本伪化。敌军势力直达抱犊崮山区的高桥、吴家沟、马山等我老根据地。我党政机关连同家属向滨海转移。我们前脚走，“还乡团”立即在我们曾活动的地区反攻倒算。1947年夏季，我们和汪星书记只联系上两次。还都是按大致的活动区域以机警、灵活的方式在山沟、山顶、树林里寻找到的。后来，在郭里集附近的大岭建立了秘密落脚点，才算能和县委取得经常联系。

地委指示我们：在峄西基本采取隐蔽活动方式，力争合法，坚持武装斗争；峄东（主要是八区），搞武装土改，即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县大队在全县范围内大游大击，插入跳出。

八区的武装土改，先从大郭庄展开。土改工作队发动农民与贾家地主面对面斗争，十分尖锐。地方暗地里勾结驻枣庄的蒋军，施行报复。一天夜里蒋军出动两个连的兵力突然包围了荆山口，驻村的武工队员高贵元、陈继忠发现被敌包围后，英勇反击，与敌人搏斗约三小时，最后被敌人用火烧死在屋内。不久，敌人又偷袭峨山口村，区武工队副队长李金鸣同志战斗中牺牲。这三

个青年同志都是纯洁而勇敢的优秀党员，他们既是武工队员，又是土改工作队员，也是政治工作宣传员，对于他们的牺牲我感到十分悲痛。

1947年11月，汪星书记调走，魏玉华同志接任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王磊（后提为副书记），我是县委委员之一。公安局长是侯季武。县委委员分工，王磊、侯季武去峄西领导各区斗争。我兼任（当时我是县长）县大队队长，县大队副队长是孙景山，政委魏玉华（兼），副政委孙耀南。后方机关只有秘书科长王秀恒带着财经、会计人员在赵镇县的云涧峪、双河，后到峄县的红山峪、马头一带活动，做供给工作。

1948年春夏期间，粮食紧缺。为了对付敌人征粮、抢粮，我带县大队在底阁一带配合赵镇县大队端了一个伪乡公所，抓了伪乡长、财经干事和乡丁。天明打埋伏截获敌运输汽车5辆，送交给我临沂后方。

驻枣庄的蒋军和“还乡团”除了在街道挨家挨户勒索马草马料钱款外，还向四外乡搜刮粮草。他们不敢向东部进犯。于是改变方向，每天从枣庄出动若干股“还乡团”，窜到永安、张范一带抢粮。我们掌握情况后，就配合二区武工队夜间深入到永安庄埋伏，天昧明枣庄来抢粮的敌人一出现，我们伏兵尽出，杀声震天。“还乡团”本来就是由地痞、二流子乌合的“烂煎饼队”，一见我们出现，抱头鼠窜，当即被我们俘虏了5名。

县大队在峄西的战斗比较多，有的战斗十分激烈。一次战斗中，县邮局局长孙成慎同志和部队参谋倪志广同志牺牲了；区长郭振举，财政科员王建刚被俘，还死

伤了十几名战士。尤其是在陈郝的突围战，打得十分艰苦。我县大队同各区武工队不满200人，夜间受到敌人一个团的包围，天明打响，在突围中我方伤亡三、四十人，区委书记郭强同志牺牲。艰苦的斗争环境使我们失去了很多好同志，我们要永远记着他们。

在坚持鲁南游击战中，我曾率30人之区中队，独立作战47次，因作战勇敢，战绩卓著，荣立大功，《大众日报》五次鼓励表扬，山东省府颁发一等奖章，鲁南专署颁发一等奖状，县委召开庆功大会，党内、行政均提升一级（随之升任为县委委员、副县长、县长）。

1949年2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当时峄县的灾情和人民的饥荒很严重。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作为县长带头积极要求南下。经上级批准后，集中于临城整军学习了半个月，接着随军（22军）征粮南下。4月22日由襄安渡江，5月13日到达了杭州。

（王用钊供稿　胡永海等整理）

和平岁月忆当年

张　协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激烈、残酷的斗争阶段。日军推行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敌、伪、顽合流夹击我鲁南山区根据地。我们的活动区域越来越狭窄："南征北战十余里，东西一线牵"，一枪就能打到头。军民生活异常艰苦，少衣缺食，吃糠咽菜。

奉命进枣庄

1942年元旦后不久，地委城工部长冯起同志通知费县县委找我谈话，调我到山东分局学习。一起参加学习的共23位同志，有张福林、刘金鼎、聂桂田、鹿广连、栗志诚和王文学等人。学习三个月后，点线科科长王见新同志向我交待任务：到枣庄矿区做地下工作。

我到了鲁南区党委，城工部王少庸同志指示我：在劳苦大众中广交朋友，扎下根；组织矿工怠工；敌特统治严密，我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叛徒到处活动，进矿区后暂时不要发展组织。王少庸同志又介绍给我和刘金山同志认识。

一天夜里，我在刘金山同志的带领下，从费南县郯

城区邵庄军区机关所在地出发，昼停、夜行。第一天晚上赶到峄县东的薄村，第二天晚上赶到枣庄西南的蔡庄。刘金山同志又把我送到了横山口堡垒户孙大娘家。当夜又碰上日伪清乡查户口，在孙大娘的掩护下脱了险。

我到横山口后，孟昭玉同志向我介绍了枣庄的有关情况和在枣庄活动应注意的事项。第二天一早，交通员就把我领进了枣庄。

虎口里的斗争

按照安排，我在老车站一位拉洋车(黄包车)的杨学升大爷家落了户，改名叫杨君瑞，认杨大爷夫妇为干爷、干娘。长了，我就称呼“俺爷”“俺娘”了。为了安全，杨大爷常请保长彭士修吃饭，年节送点东西。

老车站离枣庄西门不到半里地，是个贫民杂居的地方。杨大爷周围邻居大都是下煤窑的矿工、矿工家属和没有固定职业的人。由于住户复杂，敌人也安下不少特务，不但有日特，也有汪精卫的忠义救国军和国民党的特务。

开始，我做点零工、挑水卖，后来杨大爷为我租了一辆黄包车，我很高兴，因为拉洋车进出城门可以不查“良民证”，再是什么样身份的人都有可能接触，便于了解情况。当时，我的坎肩号衣是300号。我在洋车夫里结识了好多朋友，这些人特别看重江湖义气，讲究一人有难众人帮。逐渐地杨学升、鹿传本、鹿老四、丁配仁

等十来个人都成了我的帮手和保护人，他们又串联了20多辆黄包车，秘密帮我们运送雷管、炸药等物资，有时帮着传递情报。

1943年夏天，日军为战争需要，在中兴公司进行掠夺式采煤，开展所谓“生产周间”活动。他们在各包工柜加强了特务控制，用高压来抢夺煤炭，以致造成伤亡事故不断出现。

7月初，鹿广连、王俊卿带信要我到横山口接头。我们分析了敌人疯狂抢煤的阴谋，决定破坏敌人的“生产周间”计划。

回来后，我找到邻居范希玉，他是老工人，托他作保在三十五号苏二麻子的柜上下了井。干的是撅穷头、填矸子。由于范希玉的关系，我很快和下井的工人交上了朋友。通过他们，我了解到中兴公司由38个包工柜担负采煤，日军和资本家通过包工柜来压迫、剥削工人。当时大级工一个班在井下作业12小时，待遇高的也就三、四斤粮食，合几角钱，养不了二、三口之家；配给的粮食有的是霉烂的杂粮，有时是橡子面。生命安全毫无保障。

一开始，我通过可靠的老工人开展怠工活动，查头子来了就大干，走了就休息。煤产量一天比一天下降，日本人训斥包工头。查头子一下井就骂大街。产量仍是只减不增。

后来，我想光这样还不行，还得厉害点。我又发动范希玉、李常胜几个大级工抽点柱、抽子墙、捅煤窝，破坏掌子面。不到半个月时间，西石硐垮了。以后一连搞垮了四、五个掌子面。三十五工号的工作面几乎全塌

了。其他一些工号也使用了这个办法。

由于煤炭产量连连下降，敌人警觉起来。日寇敏感地意识到是共产党在活动，就一面布置特务盯梢打探，一面召开各联保工人大会再次鼓吹“生产周间”。峄县县长王徽文和二区(市区)区长李福田、警察局、特务机关以及特务外围机关都参加了。各联保的工人都由联保长带队参加会。会上先由日本宪兵队长讲话，以后王徽文也讲了些。大会开了两小时，主要内容就是：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多出煤炭支援“大东亚战争”，不要受“共匪”煽动，要肃正思想。

散会到家，交通员刘占鹏从山里来向我传达领导指示：日军战争失利，国民党蒋介石正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要大力宣传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鬼，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要扩大影响，提高群众的胜利信心。他还带来了许多传单，要求快散出去。晚上，我串连了范希玉、鹿传本、丁配仁、李常胜、蒋福义等人，传达了上级的有关指示，并交待想方设法向市民、工人广泛宣传形势。

第二天，枣庄大街上、日伪军的岗楼里都出现了“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鬼”的红绿标语、传单。敌伪军惊慌失措，又是戒严，又是查户口，一连几天不安生。“周间计划”也破产了。

广连牺牲之后

1943年农历9月30日，我接到鹿广连同志(化名黄

牧平）接头的通知。当晚我就到了横山口。可是，一直等到半夜也未见广连同志。后来有人又通知我到聂庄去，走了三四里，不远就听到聂庄一片狗咬，还有妇女、孩子的哭叫声。我觉察情况不妙，赶紧岔路躲开。天眩明，我帮着一个买炭的老乡牵着驴，回枣庄。刚到老车站，我就觉着气氛不对：枣庄西门外的路上有许多人，都远远地朝一棵大树看。我慢慢凑过去仔细一看，顿时头象炸了一样：树上挂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头，不是别人，正是我的战友鹿广连！我强忍着眼泪赶快回到家，干娘焦急地问我到哪里去了，我说“打连班，刚上来。”干娘这才松了一口气。

鹿广连同志遇难后，我的警惕性更高了。年底，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我到柜上去领粮食。在街上我喝牛肉汤时忽然出现一个穿大褂（长衫）、戴礼帽的人向我走来，我全身一紧：坏了，碰上叛徒了！这家伙名叫杨旭，我在费南县一区任区委副书记时，他是鲁南区党委《鲁南日报》社社长。在滕县买纸时被鬼子抓去，叛变当了特务。一见面，周旋了几句之后，我就以攻为守地说：“老杨，我正想找你帮忙，不知你住在哪里，可巧碰上了！”他也顺水推舟，说：“到我家玩玩吧！”路上，他问我山里的情况怎么样，我说我是开了小差出来的，当了窑户，干活太累，想换个差事。到了他家，我看屋里摆设很不一般，在他向我递茶的时候顺手从我的便装里掏出了下井证，看了看说：“你改名了？”我说：“开小差不改名还行？”我接着问他什么时候听他的信，不然先领了粮食送回家，回来再细啦啦？他答应

了。正在这时，他老婆喊了一声“徐队长来了！”接着进来一个长脸高个子三十五六岁的家伙。杨旭迎上去和他进里屋不知咕叽了什么。一会儿，姓徐的走出来朝我点了点头走了，我看情形不妙，就给姓杨的说，晚上在家等着，我领了粮食就来找他。他答应了。临走，他还关照我：“来时想着带良民证。”

离开了姓杨的家，我穿胡同折头进了中兴公司。又出公司西南门西拐直奔火车站。我在估衣店，买了一条旧西式裤子和一件中山装旧褂子，特意理了个小平头。把窑衣丢在小铺里，就手插在裤兜里一面往东装着闲逛，一面观察动静。这时枣庄西门外已增加了警察，便衣也不少。离家不远，只见我干爷拉着一个人从胡同口出来，车上竟是坐着特务股的股长王全忠！幸好我换了装他一下子没认出来。干爷给我使了个眼色，我明白了，就没打招呼，到了家就对干娘说，我有事出去，有人问我就说被日本人抓伕抓走了。说完从篱笆墙钻出来，离开了枣庄。

晚上9点多钟，我到了横山口。第二天找到了王俊卿同志。几天后由铁道队把我送到鲁南区党委城工部。我向王少庸同志汇报了撤出的经过。王少庸同志对我的工作充分肯定了成绩，对因暴露身份而撤离枣庄矿区虽然能够谅解，但给工作带来了被动和损失，也提出了批评。

成立枣庄市委

1944年二、三月份，鲁南军区开办青年干部学校。校

长由张光中司令挂名，具体工作由谷红同志和我两人负责。招生学员200余人，都是城工部从城市动员出来参加革命工作的学生。学习时间半年，8月结束。除留少数参加机关工作外，大部分都派回去做地下工作。只办了一期。王少庸同志仍派我回枣庄地区负责枣庄的地下工作。

1944年10月底，鲁南军区为了统一枣庄地区对敌斗争的领导，成立了枣庄工作委员会和枣庄办事处。杜季伟任工委书记，张福林任副书记，邱焕文、张协、张城、庄玉明为委员。枣庄办事处主任由邱焕文担任，庄玉明任公安局长，马平任副局长，王德生是办公室主任。

当时枣庄办事处管辖区域是东至郭里集，西到邹坞，北到东、西凫山，南活动到峄县城。

枣庄市内的工人运动，由张福林、张城、张协三同志负责，同时发动郊区农民实行合理负担；邱焕文负责上层统战工作；庄玉明、马平负责敌伪军工作，掌握敌情。

武装力量方面，当时有四个精干的武工队，他们活动在郭里集、东西凫山、铁路南和邹坞一带。采取昼伏夜出，忽聚忽散的灵活方式打击敌人。

1945年冬，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在枣庄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了枣庄市委和市政府。王见新同志任市委书记，林岩同志任副书记，丛林同志任组织部长。市政府中，张福林同志任市长，牛子春同志任副市长，王德生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公安局正副局长分别由庄玉明、马

平同志担任。

为做好矿区工作，成立了矿务局，由范醒之同志任局长，方克强、方奕生同志任副局长(前为柴化周同志)。

市委和市政府下属4个分党委和4个镇政府。枣庄镇党委书记李宗海，镇长刘斌，工会主席张福田，妇女主任张惠一；中心镇书记张协，镇长孔良民，副镇长张瑗，工会主席朱贵清，妇女会长栗志诚；车站镇书记陈玉华，镇长张向南，工会主席王明敖，妇女会长王恩惠；齐村镇书记王宏，镇长党延生。

枣庄市委市政府上下各级组织机构的建立，为解放枣庄作了充分地组织准备。

抗战胜利

1945年12月，枣庄市委动员全区群众支援解放枣庄的战役。12月下旬，曾希圣同志指挥7师的20旅和8师的主力共9个团的兵力向枣庄伪军发起了攻击。战斗十分激烈。

1946年1月13日凌晨，上级指示：执行“双十协定”就地停战。这时只剩下王继美残部龟缩在中兴公司，枣庄外围全部解放。

我们进城后，在市民中立即展开了反奸诉苦的宣传教育活动，揭发汉奸王继美的罪行。尤其是国民党收编王继美委任为挺进支队司令，更激起了群众的义愤，打破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在反汉奸诉苦活动中，召开大会枪

毙了罪大恶极的汉奸焦黑七等人。在东海烟厂，工人积极分子杨凤英带领全厂女工控诉、斗争了恶霸厂主张拐子。通过反奸诉苦活动，物色、培养了一批群众骨干，建立了基层政权。与此同时，我们组织人民群众搞生产自救。中心镇发放中兴公司的存煤3万多吨，组织烧焦，开发小煤窑十五处，维持失业矿工的生活。恢复了一些小坊、小厂，安排人员就业。

被围困在中兴公司的王继美伪军，不断对我军民进行挑衅活动，破坏“双十协定”，不仅打伤了“三人小组”我方代表甘重斗同志，而且经常向外打冷枪、冷炮，使我军民不断造成伤亡。敌特活动猖獗，造谣破坏什么都干。在这种形势下，全市动员参军参战。挑选了1000多人，成立了枣庄工人支队，由张福林任支队长，杜季伟任政委。每镇一个大队，队长多数由镇长担任，教导员由镇委书记担任。我任第三大队教导员，队长由另派来的王福增同志担任。后来陶庄也划归枣庄市领导，镇书记徐延清同志为第五队教导员。

消灭王继美后，我们向山区抢运了大批设备、材料和钢铁。发电机一类大型设备无法搬运，只好炸毁，不给敌人利用。

1946年10月，国民党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枣庄成立了司令部，王见新同志为司令员，统一指挥撤退。10月中旬，敌51师占领了枣庄。原先逃跑了的反动地主、恶霸、地痞又组成了“还乡团”随同回来进行疯狂地阶级报复。

敌人占领枣庄后，经常对我围剿、进攻，斗争非常

残酷。广大指战员对“还乡团”恨之入骨，情绪一度偏激，抓住土顽就杀，不予宽大，致使“还乡团”和我们顽抗到底。军区发现这一问题后及时指示纠正，恢复了“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政策，形势才逐渐缓和。

北　撤

1946年底，我军鲁南战役消灭了26师马励武的快速纵队后，紧接着消灭了驻枣庄的51师。枣庄第二次解放。但时间不长，为斗争的需要，我们又立即撤出。此后，在峄县、枣庄一带敌我双方展开了“拉锯”形势。随着蒋介石重点进攻的策略，鲁南形势逐渐恶化。敌人集中了9个整编师“围剿”鲁南军区。大约是1947年3月底，军区转移到了枣庄北部山区，并通知我们全部突围。我们立即向邹坞东边的红村集合，黄昏出发向兰陵方向突围。我们带着村干部、家属、儿童近万人穿过峄城、台儿庄等敌人的封锁线一夜就到达了兰陵。在突围的沿途中，我们还铲除了敌人的乡、保公所20余处，消灭“还乡团”300多人。

1947年4月中旬，敌人围剿放松。上级指示各地区机关、部队仍回原地坚持斗争。我接通知后即返枣庄山区，住在定盘山口。为便于军事上的行动，杜季伟同志决定把后方机关的家属、儿童全部送到鲁中，到蒙阴鲁南军区后方司令部去。这次行动由张福林同志带队，我负责护送。

带领家属、儿童大转移真是不容易，为了躲避敌人

的封锁，绕过许多山头，行走一夜才到达滋（阳）临（沂）公路。按事先计划，我护送到滋临公路就返回。我们在小卞桥住下休息，准备吃饭。这时忽见公路两侧群众纷纷北跑，我们料知发生敌情，赶紧集合离村向北移动。刚离村，国民党部队从公路东西两个方向赶到了小卞桥。从此，我们就在国民党部队的追击下西躲东跑，直到沂蒙山区遇上了大部队才算脱险。又过了大约七八天的时间才到了博兴。7月，我接到带队伍过黄河到宁津县驻防的命令，立即渡河。张福林同志仍带队随军区司令部行动。

枣庄解放

1947年11月下旬，我回到枣庄地区。这时枣庄已划为特区，属薛水县。枣庄特区书记靳跃南、副书记张涛；我仍任枣庄区区委书记。枣庄镇镇长孔良民、副镇长张瑗。枣庄区武工队由王志胜任队长，我兼任指导员。这时敌我双方虽然都没有大的军事接触，但敌人骚扰，我们伏击，相互摸底、搞情报却是频繁不断。许多基本群众积极主动地为我们搜集、传递情报，使我们对敌情了如指掌，不断取得胜利。特别是陈庆文大爷一家，全家五口人都为我们做工作，始终和我们保持密切联系。

1948年1月份，枣庄重新成立工委，马平担任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张协，民运部长刘华庭。由于战局变化，我军节节胜利，峄县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开始撤退。

工委进城后，李希芝同志调来任工委书记，孙石任宣传部长兼工会主席，妇女会长李××同志。党委由李希芝、马平、张协、刘华庭、赵庆升五人组成。

枣庄成立了办事处，赵庆升同志任办事处主任，刘晓初同志任办事处办公室主任，高怀珍同志任公安局长。办事处下辖枣庄、中心、车站、齐村、陶庄5个镇。除陶庄镇书记徐庭清外，各镇机构、人员基本未动。

中兴公司设留守处，主任王志胜同志。陶庄矿受战争破坏较轻，很快恢复了生产。矿长是尹道宏同志，副矿长徐子仁同志。

淮海战役打响后，全体军民都投入了支前工作。在齐村设立了粮站，由镇长和陈庆文同志负责粮食的收储、调拨工作。各镇都组织了担架队，出民伕运粮草支援前线。

枣庄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煤矿破坏，各种生产停顿，工人、市民生活无着，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群众有饭吃。先恢复了一些尚能开采的小煤窑，同时向淮南、淄博输送了2600多名失业矿工；组织了3000多人到临沂地区参加清沙导沭工程，既有收入又修水利，一举两得。还向街道发放贷款，组织贸易货栈，到徐州、临沭一带做生意，繁荣市场。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枣庄市区人民终于战胜了战争带来的饥荒。“共产党，爱人民，她是我们的带路人”的歌声越唱越响。

（据区党史办整理稿综合加工整理）

鲁南和谈二三事

韩去非

1946年1月13日24时，停战令生效。鲁南地区国共双方就地谈判。谈判地点设在临城。因为是和国民党直接对话，陈毅军长和大家考虑到我长期做国军工作，就决定让我前去。我也没含糊，当时就答应了。军长对谈判中可能遇到的情况作了设想，甚至连吸烟、吃饭这样的生活琐事都作了指示。大概是十四、五号，一早，我带着军长现写的信出发，临分手，军长还给我壮胆："对这些人不要看得多么高大。草包！"

国民党住临城的队伍是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是陈大庆，停战令生效前他就回徐州调兵遣将部署队伍去了。副总司令叫李铣，这个人既顽固，又是菜包子。到临城谈判，我们去了12个人，12匹马。这些人里有作战科长、敌工部长、城工部组织科长，都是搞敌情工作的。他们都以我的副官一类的身份当随从。

当时枣庄到陶庄一带是我们新四军七纵防区，纵队司令是谭锡令，政委是曾希圣。过了七纵防区，就到了临城东北一个小庄子。这里大概是两军结合部。庄子上只有一间屋，别的都拆光了。一接触他们的阵地，就听着枪拴稀里哗啦一片响，还吆喝："哪来的？"明知故问，抖威风。我说："共产党新四军那边来。""几

个人？”我说12个人，都到了。问：“带武器了吗？”我说：“除了我的警卫人员带武器，其他人都没带。”有人把我让到屋里。屋里只放着一张八仙桌子，几把椅子，算是临时休息室。没多会儿，开来了一辆小卧车，接我的是总司令部的副官长，是个少将。他是我们的同志，叫徐光。跟来两名副官，都是校级军衔，一个是比较进步的，一个是共产党员，大概是个中校。这次我带专搞城工组织的冯凯余同志来，接党的关系也是一项任务，因为平时不能直接来往。我到这间小屋来的时候，已经有几个人了，其中有我们的共产党员，主要记得有孟庆元，还有个朱会生、徐天民。不便公开接头。我和副官长商量，去谈判是不是去的人太多，留下几个？他明白我的意思，说：“随你吧。”我就把冯凯余同志留下了。这是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结合。

副官长把我接到临城北的一个车站，一直送到火车上。那个火车的客车是客厅式的，前头象客厅，后头还有休息室，有沙发。专门布置的。坐在车上到了临城火车站。站外边排了一大溜接我的人，总司令不在，从副总司令起，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排到三十六师参谋长。我一出站，就听一声“立正”口令，一边还有一个仪仗队。李铣讲了几句话。车站上没有其他人，他就把参加欢迎的人向我一一介绍。他没让我到房子里去。转了一圈，还是把我领到火车站上，又换了一节车厢。

这节车厢布置得很讲究，桌上摆着美国香烟，一坐下他就吸烟。我就随口说：“尝尝我们的烟吧！”我就把陈军长教我带的烟(我的警卫员皮包里没装别的，全是

“大鸡”烟)拿出来，每人一支递给他们。那时，咱的大鸡牌烟也有锡纸了。他们吸着说：“你们这个烟丝不是自己做的吧？”我说：“是的。是解放区工厂自己做的。”他们不相信，直夸烟好，我就把我们的烟一人一包送给他们了。他们的烟一支也不吸了。该吃饭了，果然是西餐。虽说这西餐也不是太好，还是比较考究。酒瓶上都是外国字，有白兰地、威士忌。我不敢喝，强调不喝酒。他就拚命让，车轮战术，就是想把你弄得迷迷糊糊。

谈判，先是从副总司令个别谈，最后是集中起来谈。最狡猾的是八十三军的军长，黑瘦的样子象是抽过大烟。说话声音不高，能讲歪巴理儿。和我坐对面的是副总司令李铣，是个结巴嘴，说话口吃。他们在我下首坐着，我就专面对李铣谈，避开他们，省得他们胡搅蛮缠。李铣口口声声说陈军长是他老师，他说：“陈毅军长是我的师长。”我不好表态，就问：“总座过去跟我们陈军长认识吗？”他说：“他是我的老师。他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我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我这才知道是真的。后来我跟陈军长讲说“碰到你的学生了”，“他是我的什么学生？”我说：“黄埔军校第×期的学生，叫李铣。”“我哪知道他？他那时还是个毛娃子。”

李铣出面谈判，很象惊弓之鸟，对于打，丧失了信心。看样子他的上级也没给他多少明确指示。他指出了几个问题，想起来也挺有意思。一个问题，说我们的武工队扰乱他，叫我们把武工队撤走、解散。我说，武工队这个事我闹不清，它和游击小组、游击队一样。是地方上

群众的自卫组织，我们不领导他们。你说他们扰乱，你们军队的纪律好一点，对他们损害不太大，也不至于扰乱你们，老百姓武装自卫嘛。他说他们没有粮食吃，要我们动员当地政府给他送多少万斤麦子。我说，我们吃的都是瓜干什么的，走到哪里，到处有老百姓给饭吃。从来没有提着口袋把群众的粮食拿走过。你说把粮食集中起来送到你这里，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我们也没有这个习惯。第三问题，他提出要我们向后撤退，因为我们的军队把他包围得很紧，他只有临城据点，没法动弹，就要求我们后撤三十里。我说撤退是双方的事情，互让嘛，互相撤退。假如你们从临城撤走了，我保证周围都没有军队，你不占谁也不占了。别的记不清了，罗哩罗嗦的事还有，五六个人围着我胡扯，也是车轮战术。大概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我按军长“无论如何不要住下去，争取回来”的指示，离开谈判桌往回返。

到了陶庄我们七纵司令部的时候，我马也不能骑了，劲头都用完了，加上风大、天寒，浑身象散了架。李新同志和孙参谋长看出我疲劳到了极点，天色已晚，就把我留下休息。第天早晨，我急着回赶，知道军长要听情况汇报。这次谈判也是为徐州谈判开辟道路。回到军长那里，我的感冒很重了，觉得头疼、难受。正好王世英同志也在那里，他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国民党军装，高统皮靴，佩戴着国民党少将军衔。我把这趟任务完成的情况汇报了一遍，军长说“对着哩，对着哩！”说谈判中回答得很好，转脸叫把卫生部的人找来，说：“赶快给他治好！他还要出发。还要上徐州！”

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就要动身。我实在起不来了，体温一直未降下来。上徐州就有执行小组了，三人执行小组，韦国清同志负责，有魏玉国同志，那一个记不清了，他们三人去的。

停战了，和平了，我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军长临离开峄县的时候曾交代：舒同同志是书记。可是舒同同志也要走。我就问舒同同志："你们走了，我的工作怎么办？得有个依靠呀！"他说："一个是靠鲁南区党委，一个是靠你自己大胆作主。"又说："你还是请示一下军长，看看组织形式怎么办。"我给军长谈了一下，他说："并不是我陈毅在这里领导你，党领导你嘛！我们走了，你的工作还得抓紧做，还要把徐州这些工作做好，不能因为和平谈判把工作松下来。"军长对徐州工作和国民党军队工作的指示是：城市工作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军队最好能调转（即起义），能够配合我们作战。

这时我还兼着铁路工委书记。工委到枣庄的时候，中心攻势已开始了。王继美住在中兴公司，外头住着我们的队伍。我们到枣庄就住在火车站，工委就在票房里头。要修铁路，我们建立了铁路局，靳怀刚同志是局长。铁路局的人多，就住在车站后头过去鬼子的商行里，那里楼顶板炸塌了，现修现用。鲁南铁道大队番号撤销后，刘金山同志任铁路局副局长。铁路局设立了警卫股，一部分铁道队的同志担任工委和火车的武装警务。

为了修复铁路，调了许多懂铁路的干部来，停战令下达后一登记，就调来啦。还有一些是铁道学院毕业的。沿津浦铁路线，凡已解放的车站，铁路员工都接收

下来。铁路中断，工人失业，没人发工资。我们发小米，铁路员工和家属不能饿着。当时聚集到枣庄的铁路员工大概有五、六百人。除了搞作风整顿，纯结队伍，华东局还批准办了个铁路学校，培训铁路建设人才。校长是华东局城工部的副部长王见新同志，我是副校长。后来，到了形势紧张的时候这些铁路职工统统跟我们撤到黄河以北去了，以后都成了修复铁路的骨干，当站长的很多。

我的主要任务还是谈判。我们参加枣庄执行组的代表除甘重斗同志是执行部派的以外，曾希圣同志代表华东，我代表鲁南，除了美国人梅西亚，对方还有段之经、王纲。

每次谈判都是有规定的，哪一天的几点到几点在什么地方谈。在对方谈就在中兴公司里边，在我方谈就在我们铁路局楼上。甘重斗同志就是在去中兴公司谈判的路上被打伤的。

谈判桌上的时间要求很严，说到三点钟，一看时间到了，不谈了。其实，实质性的问题谈得很少，多数时间是闲扯淡。对他不利的时候，他就一个劲地拖；我们有时也拖，我们拖是想打他，把枣庄这个据点拿下来。临城以东只有枣庄这一个据点了。王继美在中兴公司西南筑了一个碉堡，很高，伪军经常放冷枪杀伤老百姓。我们就挖地道准备炸他。所以谈判时我们就设法争取时间。有一天，我方代表负责人曾希圣同志说："今天我们招待大家吃饭。"我们摆了几桌子，上了不少菜，预备了多少种酒。还准备了山东老白干，60度，很厉害，掺上带颜色的酒，准备到一定情况干几杯。主要

对付美国代表梅西亚，这个人很狡猾。喝酒的时候，记得有王见新同志，还有谁。都准备好啦。一开始，我应酬他们，后来梅西亚端着高脚玻璃杯过来了，他知道我是秘书长，来碰杯。喝葡萄酒的玻璃杯比我们平时用的酒盅子大，一般说喝果酒三杯五杯不至于醉。我给他碰了一杯，返手就拿了准备好的白干酒给满上了，带着颜色，他也看不出来。我一仰脖子“咕咚、咕咚”就下来了，他也喝下去了，虽然觉着不是滋味，说不出口。接着王见新，还有谁又给他碰了一两杯，他就醉了，跳起舞来。就这样闹闹哄哄，这次就不谈了。

6月9日打王继美那天，谈判是在我们铁路局住地。也吃了酒，还看了点枣庄的小戏，戏唱的不怎么样，我们陪他看，主要是熬时间。这时，我们已经把地道挖到他的碉堡底下了。碉堡里的脚步声都听得清清楚楚。炸药也都摆放好了。在谈判时我们看预定攻击的时间到了，就强硬地提出马上解散伪军，不行就打！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事很坚固，很保险。梅西亚非常得意：“哈哈，你们是拿不下来的！要拿下来得付出很大代价喽！”王刚象是有心事，不敢说我们拿下拿不下的话。后来他们看我们变脸色了，真要打了，沉不住气了，起身要走。曾希圣同志说：“不要走，还有5分钟我就把碉堡拿下来！”梅西亚笑了：“还有5分钟？”5分钟几句话就拖过去了，他看我们的脸色，知道是真的了，5分钟一过赶紧下楼钻进吉普车就走。他们往北拐还没过铁路，“轰！”真是惊天动地，好大一股黄烟冲天而起。他们过了铁路去看工事，那么大的碉堡不翼而飞

了。就摆头把车调回来。梅西亚上了楼向那里一坐，说："真不象话！"我们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我那块表是我的订婚纪念。"这呀，那呀，就怕他的东西少了。那个王刚也是往那里一坐，闭着眼睛，什么也不说。他们都住在中兴公司里边，离碉堡不远。

到了晚上，打得差不多了。我们请他们去查点他们的东西。梅西亚一回去，赶紧上楼找他的东西，结果一样也没少。我们在打的时候下了一道命令，不准损坏美国代表的财物。他门口的岗，由我们的一个排长给他站着。这一次梅西亚对我们部队的纪律很佩服，诚心诚意地赞扬了一番。

（据市政协提供的口述记录稿整理）

王明增烈士传略

丛永新整理

王明增同志，台儿庄运河南侯孟乡泉源村人。生于1907年（属羊）。他是枣庄矿区工人中首批中共党员之一。曾任枣庄矿区党委书记。1940年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2岁。

王明增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王庭杰去世后，母亲梁氏带着他和前母撇下的两个哥哥（明德、明均）到枣庄东北的侯宅子村投奔外祖母家。住在村西南角的一间破草房里辛勤度日。

1923年，明增16岁了。他看到母亲终日劳苦，便决心自谋生路，替母亲分忧解愁。经人介绍，在枣庄中兴公司西南门外一家鞋铺当学徒。三年出师后，仍难营生，又于1927年在中兴公司下窑拉炭筐。开始拉筐，力薄炭重，运量少，每日工资只有一角八分。由外工转为里工后，虽然工钱略有提高，但仍难养家糊口。在中兴公司干工当窑户，他尝到了井下的各种艰险，看到矿工的悲惨遭遇，也亲身经历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使他意识到：穷人要想有出路，只有与资本家进行斗争。

王明增同志在与煤矿工人的接触中，开阔了眼界，同时也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32年，他积极参加了中

共地下党组织所领导的中兴公司“六·一三”大罢工。罢工斗争中，他一直冲锋在前，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罢工虽然失败了，却使王明增走上了革命道路。这年冬天，在郭子化同志的培养教育下，王明增同志很快成了对资本家斗争的骨干，并成为枣庄矿区首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1933年2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枣庄建立了矿区工人党支部，王明增同志为党支部委员。是年春，又成立了中共枣庄矿区临时工委，郭子化同志任书记，王明增同志为委员。他由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逐渐成长为一名矿区革命斗争领导人。

1933年，枣庄矿区工委根据公司资本家对外工（采煤工）和里工（技术工）待遇不平等的情况，决定发动“五一”罢工，要求外工和里工一样同样分“花红”（红利）。

外工人数最多，他们劳动最苦，命运最悲惨，但由于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愚弄，很少想改变命运。把这支队伍组织起来投入斗争是罢工胜利的关键。王明增担负了对外工的组织发动工作。他深入到矿井下和工人们谈心，到劳工棚子里和工人交朋友。因为他了解工人的疾苦，所以工人把他当成自己的穷哥儿们，愿听他讲道理，决心抱起团来斗争。王明增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由于采取了正确地斗争策略，再加上里工、矿井、社会等方面的配合，“五一”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不仅使外工取得了分“花红”的权利，改善了矿工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一年来矿区工人运动的沉闷局面，提高了工人的觉悟，使社会的政治空气活跃起

来。

罢工胜利后，矿区发展了党员，扩建了几个党支部。1933年6月，正式成立了“中共枣庄矿区党委”，郭子化同志任党委书记，王明增同志任党委委员。

为了开辟新区的工作，加强统一领导，1934年冬，各地党的负责人在枣庄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王明增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选举郭子化为特委书记，张光中为宣传委员，丛衍瑞为组织委员。丛林任特委秘书。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听取了几年来我党在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盲动冒险造成严重损失的情况通报；总结了枣庄前几次工运失败的情况；提出了“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口号，防止冒进情绪，注意积小胜为大胜，树立长期斗争的思想。在活动方式上要注意以公开职业与秘密行动相结合；领导骨干要尽量隐蔽，群众组织要公开合法；党组织要小而精。会议决定，枣庄矿区党委书记由王明增同志担任。委员有褚雅青、傅宝兴二同志。

根据特委的指示，王明增同志在矿区积极开展活动，注意党员的培养和组织发展。1935年上半年，发展了一批阶级成分好、工龄长，在历次工人运动中表现好的积极分子入党。他把党员的发展范围扩展到职员、教员中。他还发动、组织工人对资本家、封建把头和走狗进行斗争，抓住这些人的违章犯规来罚款分给工人。还多次将罚款交组织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对残酷欺压工人的把头，他亲自组织工人进行惩治。中兴公司的稽查长秦五，平时打工人最多，群众早就恨之入骨。王明增便

与几个工人商定好，找机会把这个家伙痛揍了一顿，打掉了封建把头的凶恶气焰。

王明增同志在工人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凡是与他接触过的工人，都知道“王麻子”，感到他和蔼可亲，喜欢与他交谈。他高个、长方脸、赤红面皮上有几个麻子。由于他性格坚韧，工作中沉着稳健，见面就能给人一种精干老练的印象。

1936年底，“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改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同时建立了“中共枣庄中心区委”。特委委员丛衍瑞同志兼任区委书记，分管宣传工作；王明增同志任区委副书记分管组织工作，并兼任矿区党委书记。

1937年，日寇侵略中国。抗日烽火遍地。同年11月，中兴公司停产。12月28日，矿区党组织领导矿工队伍参加了反对日寇侵略大会，接着又组织失业工人参加了抗日武装队伍，组成了“峄县抗日保安大队”。1938年春，日寇侵占枣庄前夕，王明增遵照特委的指示带领队伍撤出，参加了人民抗日义勇队，与敌寇开展游击战。

1938年，中兴公司受日军控制强行复工。抗日队伍东撤山区。组织上选派王明增等少数骨干安插在矿区坚持斗争。王明增同志任矿区工委书记，以普通工人身份为掩护，任务是组织发展党员；发动工人与日伪进行合法斗争；搜集掌握情报；搞好地方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购买军需物资，供应山区部队等。王明增同志依靠和发动群众，很快打开了局面。他对表弟梁宗江说：“兄弟，以后社会就要好了，日子就好过了。共产党一定

胜利。”

1939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王明增在赌场接到了梁继璐部下梁宗明（冯庄人）把自己所带的几十支枪拉出来的消息，十分兴奋。他立即找到地下党员马继礼（又名马征进，回族），二人同骑一辆自行车向荆山口赶去接头。王明增和梁宗明是表兄弟，他曾多次做工作，动员他把队伍拉出来。还约定，只要拉出来就在荆山口接头，然后进山找苏鲁支队。但这一次在他们骑车由小路向荆山口赶路走到孟庄时，突然遇到进山扫荡的日军：马队在前，步兵在后。他们见势不妙，立即躲闪。但已被敌人发现。马队将他俩追逼到大尚岩河沿时，连人带车一齐截获。敌人从王明增的自行车把里搜出了字条，就将他们五花大绑，先押解去抄家。梁宗明知道消息后，全家跑走。他俩被送进枣庄日军宪兵队。

在枣庄宪兵队，敌人为了要他们供出同伙，先灌辣椒水，人踩杠压，以致七孔流血，然后再由四人架起来往下摔。一连几天，严刑拷打，坐老虎凳，过电等刑罚都用了，折磨得二人死去活来，他们始终没有吐露一句真言。20多天以后，他们被转移到济南监狱。

1940年，农历正月初，王明增同志在济南被敌人押向刑场。他面对敌人的屠刀，大义凛然，英勇就义。

又过了一段时间，马继礼被释放出狱，他专去侯宅子看望王明增烈士的母亲，介绍了他们被捕经过和明增在狱中的情况。王母思儿心切，忧愤成疾，于1945年去逝。

王明增同志只上过两年学。一生未婚。

（原稿由市政协文史办提供）

我的侄儿鹿广连

鹿传本口述

我的老家是齐村南的李家庄。因为靠我父亲教学一家7口不能糊口。就逃荒到泥沟东吉家庄。我弟兄5个除大哥传杰在我父亲的指点下跟随教学外，下余兄弟4个都给地主扛活。

鹿广连是我大哥的二儿子。大哥病故后，大嫂改嫁，我就收养了广连。广连自幼聪明好学，20岁中学毕业，毕业后在峄县受了三个月的训，结业后分配到山后田庄村教小学。

广连对教育工作很热爱。教育学生都是耐心讲道理，还常到学生家里了解情况；对困难的学生，有时还掏钱帮他们买文具。广连自己生活很俭朴，教书两年了，还是穿着上学时做的大褂。每次家来，总是把他的工资恭恭敬敬地交给我。这些品行在农村里很受好评，学生家长都争相送吃的东西。有时放假了，学生们都把他送老远。

1935年，广连在地下工作者赵镛同志的启发、教育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教育下他以教学作掩护为党秘密做工作。

1938年，日寇侵占了枣庄。从此，枣庄人民生活在万丈深渊之中。一天夜里，广连穿着一套新衣裳来到家

里，我吃了一惊，小心地问："孩子，你不是跟鲁南三特委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他说，特委研究，为了继续坚持枣庄矿区的抗日工作，决定派他和一位史同志留下开展工作。我说："日本鬼子那么多，你不怕死？"他说："怕死还能抗日吗？"这时我已在枣庄西边的老车站落户拉车子。第二天，我到南马道西门外请来56保的保长彭士修，中午办了一桌酒菜，吃喝后，他给广连办了一个"良民证"。广连在枣庄有了行动自由。

广连在学校里教书，书是日本书，他一看书就来气，只好稀里糊涂地讲。晚上回到家里就活跃起来，写标语、写传单，夜深人静我们就出去贴。赶集的人看到各处的标语，就议论纷纷，说："都说'毛猴子'没有了，这标语是哪来的？""毛猴子"是日本鬼子对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污骂称呼。

1939年下半年，党的地下工作已经深入到矿警队和替鬼子看孩子的中国褓姆中间，有的还发展入党。因此，标语有时贴到警备司令部的大门上。鬼子军官的宿舍里也常发现我们的传单。

由于标语、传单接连不断地出现，敌人惊慌不安。他们派了很多特务来侦察广连他们的活动。1939年农历腊八那天早晨，敌人突然戒严，各处搜扑广连和马平同志。他们把广连和马平常活动的地方都搜查了，扑了空。万恶的日本强盗就把广连的妻子徐氏和不满周岁的孩子抓了去，在宪兵队严刑逼供。徐氏始终不吐真言。腊月三十，日本鬼子把关押了22天的徐氏用麻袋包着头，带着孩子，用洋车（黄包车）从洋街拉到刑场。敌

人抢过孩子，扔在地上，把徐氏剥光衣服捆在栽好的柱子上。丧天良的刽子手两手抓起哭喊不停的孩子的两脚，提在徐氏面前，灭绝人性地把孩子劈成两半！接着又将徐氏开膛破肚，残忍地凌迟整死了！徐氏这年才22岁，在广连的帮助下参加了共产党。她为了保护广连和党组织，就这样带着孩子殉难了！

广连在工人的帮助下离开枣庄以后，到了革命根据地学习了13个月。1941年春天又回到了枣庄。这时枣庄一带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公开活动了，广连被任命为峄县第二区区长，与大队长刘刚一起领导武装斗争。

1943年农历10月25日那天，一大早就听过路的说："打死了八路军的大官，血淋的人头挂在西门外，真吓人！"我心里一激灵："莫非是……"果不其然，那真是俺孩子的头呀！鬼子拿铁丝拴着挂在西门外路边的槐树上，还派着几个人拿着家伙看着！

原来，鬼子不知从那里得到广连他们在聂庄开会的消息，从枣庄、山家林、峄县城调动了五路匪军连夜包围了聂庄。等到开会的发觉的时候，晚了，天已晓明！赶紧突围！多数同志脱离了险境，广连却在突围中牺牲了！他的头竟被匪军头目蔡××割下带回枣庄向鬼子献好表功！

广连的人头就在离我家门百多米远的地方挂着。当时我家里还住着两位以下窑为掩护的地下工作者，我们看不敢看，哭不敢哭。看守的敌人却一个劲地喊呼："这是八路军的大官，'毛猴子'全都打死了！"我虽然心

里难受，白天还是象没事人一样拉着洋车跑街；晚上就在墙缝里观察西门外敌人看守的活动情况。这天夜晚，西北风一劲地刮，这是入冬后第一个冷天。从篱笆帐子墙缝里我看有两个家伙进了看守屋子弄柴禾烤火了，还有一个在外面遛来遛去。过了一会，外边的这个也进屋烤火去了。我赶紧挟着准备好的蒲包，悄手蹑脚地赶到那棵树底下，轻轻取下头，放进蒲包里。这时候天上飘下了小雪花，我赶紧朝永安葬埋广连身躯的地方跑。到了坟上，我只好用手扒土。好在是鲜土，加上悲愤心急，一会就扒开坑，把头安放了，又把坟头堆起来。这时我才觉着棉袄贴身凉。

第二天，我拉着洋车跑街送客，就听行人传说：昨晚八路军来了30多个人，杠着机枪，把人头抢走了。

广连牺牲的时候才27岁！

（市中区党史办供稿）

回忆刘安琪总队长

蒋 树 柏

1937年12月，日军进攻邹县两下店，战火临近枣庄。学校停课，学生流亡。我和一些同学飘泊徐州，寻求出路。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得知国民党革命军第17军团招收青年学生的消息，我和枣庄的李汉英、任子安、戴秉均、峄城的刘秉铨、翟长庆、周长英几个男女同学怀着抗日救国的心情报名参加了学生队。

报名不久，我们在徐州上了一列铁闷子车（货车），沿陇海线向西开去。途中由于日寇飞机轰炸，铁路常遭破坏，火车常常被堵在小站上等待抢修。因为部署徐州会战，军列调运频繁，我们的车也得停靠避让。这样走走停停，整整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到西安西边的虢镇。下了火车，又北行四十里，到达了凤翔。

凤翔是一座历史名城，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墓就在城内。城东关有座喜雨亭，宋代文学家苏轼在凤翔府做判官时曾写有著名的《喜雨亭记》。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就设在这里。

我们经过入学考试，体格检查，年底，都被录取为第十五期步科学生。我编在第二总队第四大队第五队。

第二总队含三、四两个大队和一个特科大队。每个大队下设4个队，每队150人。特科大队除炮、工、通讯

3个队外，还有一个女生队。我们一道入学的峄城人周长英编进了这个队。1938年元月，我们就投入了严格地学习和军事训练。

1938年2月，刘安琪少将出任我们第二总队的总队长。我们知道刘将军在枣庄山阴武璋校长办的峄阳中学读过书，大家很为有这位同乡的将军感到光荣。我们认识刘将军，是在操场上。学生每天早晨5点多钟起床，集合队伍到操场出操。有一天，我们一进操场老远就看到检阅台上挺立着一位军人，戎装冠戴，很有风度。以后，天天如此，风雨无阻。我们很佩服将军这种作风。于是，刘秉铨、翟长庆、李汉英和我，大家相约，在一天傍晚一同去参见这位抗日勇将。

到了将军的住处，我们被引进总队长室。刘将军见我们去了十分高兴，热情接待。他作自我介绍："我叫，就是刘安琪。韩庄人。"一口乡音使我们顿时消除了拘束。他中等身材，脸膛黑褐色，有点清瘦。身穿草绿色呢子军服，领上缀着金灿灿的少将领章，腰挎一支小巧的左轮手枪。将军在我们眼里：和蔼、朴实，有精神，没架子。接着，他向我们陈述了自己的抗战经历，说这次忻口之役是第二次和日寇对阵。第一次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那时他在张治中将军的第五军五二一团任团长，和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抗击日本海陆军的进攻。在上海苦战月余。去年抗战开始，他任九十七师师长，在山西省忻口阻挡日军南进，激战持续半个多月，因腹部受重伤回西安疗养。

在谈话中，刘将军强调的两点给我很深的印象。他

说："一是爱民，凡是老百姓的针头线脑味，一根柴禾棒都得爱惜。二是两军相对勇者胜。高级指挥官有时也要亲临第一线。我的指挥所总设在前线附近，一是便于了解情况，一是弟兄们见师长就在身旁，胆就壮了，气也足了。"将军的话，使我好象明白了他受伤的原因。

刘将军深情地端详了我们一阵，大概是看我们穿着一身簇新的军服，想到了我们的任务。他说："做好一个指挥官，肩膀上担子很重。成千上万官兵的生命在你手里掌握。要尽量多杀伤敌人。要尽量减少自己的伤亡。在忻口前线，我那十来天，手拿电话筒眼里一直瞅着地图，不知道饭吃的什么，觉是怎么睡的。要知道战争是一项综合艺术，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要下功夫学习。"伶听将军教诲，我们连连颌首称是。

晚自习号响了，我们怀着亲切的敬意离开了总队长室。

那年4月，徐州会战结束，我们听到枣庄家乡沦陷的消息，心情都异常悲愤，对于学习和操练更加发愤了。

一天早晨，按课程是进行100米卧姿实弹射击考核。因为下过雨不久，地上湿漉漉的。可巧，我们队和女生队同在一个靶场。大家看着地面，嘴里不说，看神色有不少人心里犯嘀咕。就在这时，总队长刘安琪将军又出现我们面前，亲临靶场视察指导。

女生第一个上靶位的是谭纫秋，她一贯是周末晚会的主角演员，大家都认识。她见靶位上有泥水，有点迟疑，怕弄脏了衣服。刘将军看到这情形说："战士出征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日则忘其身。还能怕脏吗？"说

着拿了一支枪迅速卧上靶位，然后站起来，要小谭照样做。

别的靶位上枪都响了，小谭伏在那里好久没有击发。问她，她说："我怕！"刘安琪将军严肃地说，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家乡，那靶上的人像就是我们的仇敌。你要用子弹消灭他……

小谭的枪响了，报靶员用红、黄两色旗挥舞：正中靶心，12环！

那次100米卧姿实弹射击，在刘总队长的指导下，两个队都获得了较好的成绩。记得我三枪打了29环。

不久，女生队的施德谦同学患伤寒病医治无效身亡。校方将她埋葬在秦穆公墓旁，并举行追悼会。记得刘总队长引用了杜甫的两句诗作挽联："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表达了全体军官和学生的悼念心情。

五月初，刘安琪将军离开二总队重返抗日前线。我们在次年10月毕业，各自东西。我与将军始终无缘相见。

将军与我们一别至今已经53年了，音容举止似乎还在眼前。据由台湾回枣庄探亲的刘秉铨同学说，刘将军已退休，但身体很健康，很有精神，仍然很重乡谊……

听了介绍，我更加思念我们的总队长：何时能再见一面呢？

清末鲁南画家董志颉

刘学林　董鼎清

董志颉，字谧侯，号敉亭。今枣庄市市中区渴口乡郭村人。大约生于公元1862年，卒于1934年，终年72岁。葬于郭村河东龙山钓鱼台下。

谧侯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皆为黉门秀才。由于耳濡目染，加之庭训严格，他自幼便好学苦读。少年时受教于济宁孝廉魏成基，其聪慧和天赋很得魏先生的赏识。到了二十岁，他考中府学生员，享受官府的生活津贴。《董氏族谱》介绍他是“戊戌岁贡生”，但据清光绪三十年修成的《峄县志》所列职员身份中他仍是廪生。是否在修志后取得“岁贡生”资格？目前尚无资料查证。

谧侯先生才华出众，辞赋书画无不精通：行文气势酣畅，“咳唾都成珠玉”（《董氏族谱·传》）；真、草、隶、篆书法自成一体；画花鸟形神兼备，画山水尤善写意。由于战乱，他的作品真迹传留甚少，目前仅见他亲绘山水纸扇一把，上题：“癸酉岁，立秋后五日，仿查士标画意。金源吾孙宝存之，谧侯氏，年已七十一矣！”（标点为笔者所加）。画面布局层次分明，疏密有致；笔法细腻，设色明快，很富立体感。另，光绪三十年所修《峄县志》附有“峄县八景”，他绘四

幅：《君山望海》、《仙坛晓翠》、《仙洞悬云》、《刘伶古台》。虽经石印复制，仍显示出浑厚、拙朴的风格。《峄县志》卷首是由他绘制的《峄境舆地全图》，这是一幅立体画法的地图，由图可见光绪末年峄县境内山、川、泉、村、路、古迹、名胜、四至、晷度皆悉数标示。今天看，无论方位还是走向，标示仍较确实。山体形象尤其具体生动，显见绘画功力，在不具备测绘条件的情况下，凭直觉能绘出此图，实属难能可贵。如无踏勘求实的科学态度，如无探幽寻踪的认真精神，如无栉风沐雨、跋山涉水的顽强意志，断难完成此舆图！

谧侯先生自号敉亭。查“敉”字，是“安抚、安定”意思，足见他为人敦厚。平时靠教书维持生计，在峄县城和文王峪都曾坐馆课徒。日常粗衣淡食，自奉甚俭，但逢人有求于他，则慷慨解囊相助。尤其是他虽身怀绝技，名播一方，对父母却是十分孝敬：不仅虚心听取教诲，侍奉饮食起居；而且不避污秽，凡事皆主动料理。他的行为很受邻里、亲朋的赞誉，称颂他才足以名世，孝足以垂远。

顺便提一句：本书封面的底图即是谧侯先生所绘《君山望海》。

附：

岁贡生谧侯董公传

董鼎清抄录　刘学林标点

从来非才不足以名世，非孝不足以垂远。才本难才，而济之以学为尤难；孝不易孝，兼之以弟尤不易。惟郭村谧侯董公以一身而兼有焉。

公讳志颉，字谧侯，号敉亭。生员镇九公之孙，庠生允常公之次子也。学本性灵，才著英敏，年少时于书无所不读。成童后曾受业于任城孝廉魏成基，尤蒙器重，期以远到故。采芹食饩即在弱冠之年。工书法，真、草、隶、篆无不备；善绘事，花卉、翎毛俱有神。而山水写意、渲染尤称绝技。兼之文藻清丽，笔能横扫千军；赋尤超绝，咳唾都成珠玉。

尤可重者，公学本自庭训，故能善体亲意。往往于父母之前以颐指、以气使。凡亲心所欲，皆先意合而无龃龉。一切饮食起居以及污秽事，皆亲奉之，无不周至。且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少间。

其与胞兄方白公和乐之耽尤异寻常。平居时，或讨论诗书，或纵论古今。

（渴口乡政协工作室供稿）

编者按：读这篇《岁贡生谧侯董公传》，感到言犹 未尽，

文如无尾之凤。据行文，气势正酣畅，不应戛然而止；就章法，亦应有结语。按一般立传文章，撰稿者于文后落款署名，以示负责，也显示传主的身份。这里没有。另从董鼎清同志所摄两帧照片看，恰恰正反两页，文尾无空格。因此判断：造成缺憾，实为缺页所致。盼有识之士补遗。

赵文亮侦察

1942年2月，日军为了镇压枣庄西南山区我游击队和民兵的抗日活动，在永安村安设了据点。中共峄县二区区委决心拔除这个钉子，就派21岁的民兵赵文亮进据点侦察敌情。赵文亮装扮成一个送饭的民工，刚接近据点就受到了敌人的搜查。一个日军小头目发现赵文亮手上没有茧子，认定是“八路的干活”，就要动手抓捕。文亮沉着应变，说自己是个唱戏的，没干过力气活儿。敌人就拉了个场子，命他当众演唱，进行验证。文亮毫不含糊，扯起嗓门唱起了“拉魂腔”（柳琴戏）。敌人没辨明真假，他却探知了敌人的虚实，为拔除永安据点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于承明）

塾师高鸿才先生

庄 子 云

高先生名继英，字鸿才，原峄县邹坞人氏。高先生于1882年（清光绪八年）出生于一个制糖的手工业家庭。自幼思想敏捷，聪颖过人。曾就学于西石沟的薛老师（名字失记），后又师从田庄村的田毓池老师。求学时期即勤学好问，过目成诵；及长，熟读五经四书，博览诸子百家，尤擅长诗词歌赋。据其嫡孙高连元回忆，说在他记事时，家中尚有藏书数百卷。

先生恒存经纬之才，常抱治世之志，二十余岁即应聘去峄城西鹁鸽村坐馆课童。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他又回邹坞，在邹坞学堂任教。后来考取黄埔军校的高庆彬、高魁元、阎玉栋、阎玉珠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1926年，他受枣庄李学思之聘为其课子，李家的几位公子都受其谆谆教诲。在李家的4年，其间，先生于闲暇亦学习法律，曾代人捉刀诉讼。可惜这时染上吸食鸦片烟的恶习，壮志锐减，唯借古人诗词吟咏自况。

从1931年起，先生不再寄人篱下，在枣庄三合庄自立学馆。由于他传道授业解惑向来一丝不苟，并注重因材施教，所以前往求学及送子就读者争先恐后。此时的学生有刘全忠、冯维圣、张鑫全、张鑫荣、金宝山、李凤岐等。1937年后，先生又迁至金庄街开馆，这时的学

生有程学智、吕秀山、李炳东、牛仁山、赵福林等。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只教四书五经可以回避日伪教育署的监督检查。但是先生遵从古训，宣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规范，所以经他教诲的学生多有成就。先生常恨那些平庸的私塾先生只管束修丰厚，不管学生成绩如何的做法，先生有诗吟道：

舌耕事业要凭心，师弟同堂道义亲，
经过砚田无凶岁，方知天不厌斯文。

先生还有一联座右铭写道：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先生的文章写得极好，对学生也非常重视写作的训练。学生几乎每周必有一天用来练习作文，先生总是出二、三题目任由学生自选。当时学生写的都是文言体的记叙文和论说文。老师逐篇圈改，但不使用标点符号，完全以圆圈断句读，遇佳句加双圈，学生以获双圈多者为荣。几乎每篇都有评语。老师常以写文章来启发学生爱国思想，如让学生写《木兰代父从军论》等。

先生年近花甲，自感平生所学得不到用场，便产生怀才不遇凄凉之感，常常写诗自叹。记得他有一首《暮春有感》，诗这样写道：

莺声歇后子规啼，正是清和四月时；
蛱蝶穿花分上下，蜻蜓逐水任高低。
农民尽力麦始秀，织女精心蚕渐丝。
共说乡村闲人少，愧余终日正无为。

先生起居生活极俭朴，粗茶淡饭也不计较，夏日常穿一件黑色长衫，冬天常着棉袍，戴一顶高帽子。平日不

苟言笑，即使内心很高兴也微笑而已，常给人以严肃之感。先生平生喜欢读书看报，不论看问题或认识时事以及讨论学术方面从不保守，故常教学生一些新知识。如地球有几大洲，中国有四大发明等等。后来又逐渐增加地理、历史等新的课程，成了中西合璧的学馆。

先生到了晚年，经历了兵荒马乱，看破了人间沧桑。时常萌生出世之感。他对明末遗老李楚航甚为推崇。李楚航有《醒世诗》十首，他让学生抄下来背诵。限于篇幅，只摘录（其实只是凭记忆）其中两首为例。第九首："一字归来绿野堂，从今不作嫁衣裳。四时佳趣闲中领，千古英雄梦里忆；莫道悬崖方勒马，须知岐路惯亡羊，人生缺陷君休憾，戏到团圆是散场。"第十首："俯仰乾坤发啸歌，万般人事苦泪磨。正唯名士贪心重，越是僧家俗气多；苏子天真原烂熳，宋儒礼数太烦苛。庐山真面谁能识，苍狗白云奈我何？"这些诗对晚年丧偶独处凄凉的先生来说，吟诵之中是有共鸣的。

先生晚年竟下决心戒鸦片烟！这是始料不及的，也足见他的意志坚强。最初，每逢烟瘾，只服药丸抵御，而后终于戒除。他总结过去，得出的结论是除不逢时外，鸦片烟也害了自己的一生。于是写了一首《戒鸦片烟歌》，记得歌词是这样的：

我憎罂粟花，我恶阿芙蓉：毒我中国，害由暴英。熬汁成膏，打泡靠灯；短笛无腔，入口有声；喷云吐雾，助神提精；既俾昼以作夜，更味后而兴浓。有此一物，可以助茗战，消酒兵，驱睡魔，破愁城。偶失之，则神魂颠倒，涕泪纵横；手忙脚乱，有死无生。虽似人实

类鬼，更鹄面而鸠形。正麻醉之炽恋，又霹雳兮一声：政府戒烟，国法无情，上至官僚，下及遍氓，应早自恤自戒，且不可以身试刑。从此脱开烟狭败癖，而消除黑籍之名。

英国侵华的卑劣手段，是从偷运鸦片烟毒害我国民众开始的。先生戒烟后写出这首《戒烟歌》就是对鸦片烟的流毒进行悲辛地控诉！当时诸多同学都将老师的一些创作抄在本子上，我也不例外。后来几经辗转，那笔记现已不复存在了。

1948年先生病逝。我每当回忆起我那博学多知、教诲有方的业师时，他的为人和这首《戒烟歌》便在我的脑海里回荡不已。

1991、5、1

郭子化诗一首

1933年4月，徐州特委书记冷启英来枣庄视察工作时，同郭子化到十里泉游玩一天。郭子化在十里泉作诗一首：

峄西十里著名泉，
吐玉喷珠汇一川。
资本金融残废鳏，
任人牛饮不需钱。

（离休干部柳玉信推荐）

回忆杨赓昌医师

张　镛

1940年，经人介绍我进了中兴煤矿公司开办的鞠仁医院，跟佟继武先生学习眼科。

鞠仁医院位于现在的枣庄矿务局学校和市供电局，占地面积之大，庭院绿化之美，医院设备之精，人才技术之高在当时鲁南地区是无与抗衡的。1938年枣庄沦陷后，鞠仁医院虽遭破坏，但日本人为了掠夺煤炭，知道医院的作用，不仅派院长加强控制，而且增补医疗器械，吸收医学人才。那时的高级医师、职员中，有几位就是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

大约在1942年，医院里的梨花正盛开的时候，院里来了一位瘦巴巴中高身材的人，他身穿阴丹士林蓝长衫，脚着一双布鞋，很象个教书先生；跟随来的还有他的女儿，穿着也很朴素。他一到，就受到了院长、日本人森田凌三的殷勤接待，并把自己二楼的办公室让出来为其居住。那时候，有家属的职员、工人住的宿舍大多只有两间。就连我的业师佟继武先生虽是北大医学院毕业来煤矿多年的高级职员，也住的很扁窄。这位先生受到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引起大家的猜测，认为定有来头。

没用多久，大家都认识了。他和我的老师是同班同学，和医院里的几位医师也是前后届同学。他叫杨赓昌。

杨赓昌老师字歌亭，临沂县人。他北大医学院毕业后，据说在日本国鹿儿岛医科大学继续攻读。毕业时因学业优良留校任教。以后回国在家乡临沂行医。不知在什么事上触犯了日本人，日本宪兵队要找他的麻烦。幸有知情者透信，他不敢在临沂呆下去，就到枣庄来了。

鞠仁医院虽然有好几位大学毕业生，杨老师独与我的老师佟继武相交甚笃。空闲时间常来眼科找佟老师聊几句。那时我们做学生的，每遇师长谈话，是不敢近前的，更谈不上插话了。如果佟老师不在，他就和我们说话。记得有一次他对我们几个青年人说："你们的老师是个忠厚人。我们上学是同班，那时我俩最要好。你们要好好跟他学，不仅学技术，还要学做人，做好人。否则要吃大亏的。"

他很善于言谈，爱说笑话。时间长了，有时他也邀我们到他的住处去玩。在他的房间里，中国古籍书很多。他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很熟。他看书常有感而发，随笔在书上批解。有时我们瞥到他在书上的批语，不过谁也不好意思近前去看。他很爱字画，自己爱涂几笔。墙上挂着他画的石头和竹子。他写的条幅，说不清是什么字体。现在想来，他很可能喜欢摹仿郑板桥字画。

杨老师的专业是妇产科，在外科上班。外科的青年医护人员都尊称他为老师。有一位外科医生居然为此不

满，认为不应称不同科的外行为“老师”。杨老师对此并不在意。一天，外科收到了一个井下伤号，深部出血不止。外科医生们采取了几种措施都不见效。当时杨老师看到了这一情形，在旁略加指点，马上解决了问题。1946年春，有一个烫伤病人来医院换药包扎，一位医生却施撒磺胺结晶药粉（消炎粉）。几天后，病人来换药时，创面明显隆起，颜色由淡红色变成了灰血色（出现一层类假膜）。杨老师询问这位医生创面变色的原因，借此机会提醒他治疗不当。那位医生不仅答不上来，而且不服气，说：“俺又没上过大学，那能比你知道！”就不再搭理。杨老师只好一笑置之。

对杨老师的高超医术，我们因为不同科室，只有耳闻。据说妇产科遇到一例死胎，人们为引出死胎酝酿剖腹手术时，杨老师却使用手法，很快引出死胎，避免了开刀手术。

鞠仁医院的用房分楼房和平房。楼房专住日本人病号，大夫、护士都是日本人。平房是中国人住院、治病、看病的地方，临床科室的医生、护士自然也都是中国人。杨老师虽然也在平房外科上班，但找他治病的就不限中国人了，日本人也找他看病。杨老师向来对病人是来者不拒，不过他爱寻开心，往往对有财有势的病家敲一敲竹杠。比方说，日本人找他看病，他说：“最近牙疼，因为吃不到好糖所致。”日本人就赶紧给他送来由日本国寄来的方块白糖。车站面粉厂的绅士找他看病，他说：“我拉肚子。吃配给的面粉发霉了！”对方就派人送来两袋“头等洋面”。事后知道，这些东西杨

老师自己并不存留，都送给了有困难的职工。

杨老师日常生活简约而又不拘小节。不仅衣着朴素，也不讲修饰。他最讨厌不学无术而且发式、服饰刻意追求的人。他每每讥讽这种人是“绣花枕头，草包一个”。他日常最习惯的动作是除了在工作时间站必站、坐必坐外，平时最爱蹲着。就是宿舍里尽管有沙发、地毯也是如此：不是蹲在椅子上，就是蹲在沙发上。后来他女儿走了，他的生活成了问题，就和一个叫永吉的日本事务员合伙，永吉做，一块吃，两人平分帐单。杨老师饭量很小，永吉大沾其光。所以永吉一个劲地讨好杨老师：“您和我爸爸一样”。其实，杨老师并不是个“癞和尚”。记得在他来医院后不久，有一天下班后，我们见一辆小轿车驶进医院。当时枣庄只有中兴煤炭公司的日本矿长有一辆轿车。这时杨老师从楼上下来，真是气度非凡：身着燕尾礼服，脚登皮鞋，坐上小汽车就走了。

1946年，枣庄第一次解放。新四军派了一位干部到鞠仁医院领导工作。这位干部在药房里，边工作边处理事务。由于时局的混乱，许多医生离开枣庄自谋生路。我的老师佟先生也到徐州去了，杨老师和几位医生没有走，因此医院没有停诊。这年夏天，我患了重伤寒，头发几乎掉光了。身体很弱，躺在床上起不来。一天中午，杨老师身着便裤褂，头戴一顶斗笠（竹篾编，圆顶、圆边）来询问我的病情。他看我实在爬不动，就说：“我马上跟新四军转移到后方卫生学校教书去，你能跟我一起走有多好！看你这样子，办不到了。”他

也担心自己身体太弱，怕跟不上队伍。他离开我时，一副遗憾的神色。我也十分遗憾。听说和杨老师一道参加新四军的有两位台湾籍大夫：一位是鞠仁医院的郭医生，另位是中新街里西商团景山医院的吴渊如医生。

1947年初，大军南下。杨老师随军路过徐州时，得知佟继武先生在市立医院工作。就专程去看望他。后来听佟先生说，杨老师当时身穿黄色棉大衣，身体也还壮实。显得精力充沛，很有些军人气概。

后来，上级根据杨老师的身体情况，未让他过江，又调回济南。大约在1951年，曾担任过一段工人医院院长职务，不久就病故了。终年约六十岁出头。

枣庄《抗敌报》

《抗敌报》是1937年由枣庄各界抗敌后援会办的宣传抗日的刊物。编辑人员有李作森、高利民，撰稿人有孙百鲁、梁度世。此报由中兴公司职员方奕生通过关系在中兴中学铅印。主要在枣庄各界散发。后因一篇评论稿触及了曾留学日本的中兴中学校长胡季珊，胡恼羞成怒，禁止在中兴中学印刷。以后，《抗敌报》又以墙报形式继续在街头出刊。1938年初，李作森等参加了抗日自卫军，《抗敌报》停刊。

（秦景才采访　中心街政协工作室供稿）

中兴煤矿经营始末

张叔诚　谈在唐

作者简介：张叔诚，曾任中兴煤矿监察人、驻矿委员、协理、常务董事等职，现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谈在唐，曾任浙江省农学院讲师、西北实业公司总经理、河北省棉产改进会总技师、天津市企业公司协理等职，现退休。

中兴煤矿为国人资本兴办的企业。在前清末叶列强虎视眈眈争夺资源的情况下，系由潞河张翼（燕谋）与余杭张莲芬(玉渠)倡议，得各方赞助兴办起来的。张叔诚系张翼之子，在该矿初任监察人，后担任董事、常务董事兼任协理，并驻矿实地工作，达三十四年之久。现根据叔诚口述，经在唐草成此文，作为史料以供参考，希海内识者予以补充和指正。

一、兴办的动机和经过

山东峄县（今枣庄市），地势峰峦起伏，岩壑深阻，山之南麓多长岭平冈，河流纵横其间。据山东志书所载，该地区蕴藏多种有色金属，惟在近世纪中多以开

采煤为主。迨至清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时，以鲁南境内煤质优异，曾檄当时峄县知县会同地方士绅筹款兴办煤矿以利民生，后以工程艰巨和费用浩大不克告成而止。该地区小型土窑，当时已为青岛德国商人所觊觎，遂以二十万两将该地区大部分小型土窑据为己有，准备探明其蕴藏量后，再集资进行开采。由于当时现场情况复杂，加以巨大资本一时难于征集，建矿一事搁置很久也未能进行。当时路矿帮办张翼有鉴于此，商得山东盐运使张莲芬的同意，复得沂县知县戴华藻的助力，探知该地区土窑掘煤情况，遂决定向德商人洽商，以二十万两原价买回。当时德帝国主义以教案为藉口，要求在胶济铁路沿线三十里内准有采煤之权，用心叵测，因此促使张翼对该地区煤矿加速开发的决心。于是集资一百万两，组织股份有限公司，定名为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取其为中国人自主兴业之意。

该矿区的矿权面积约有一万零五百余公顷，均属上石炭纪煤系，直覆于奥陶纪石灰岩之上，走向及倾斜方面颇不一致，有反向断层一道，自东北至西南，横断煤田为两大部分。东南部有正向断层三道煤田，西北部亦有正向断层三道煤田，北方有大断层一道煤田，于此断层之北，见五台系的云母片岩甚多，盖已属元古界。东南两方均见露头，前人所采的土井触处皆是。闻在明代已有人开采，证明发现之早。大槽煤愈向西面而愈薄，惟至矿区西南陶庄一带，复有一块盆地蕴藏至富，枣庄、陶庄之间煤层则甚薄，无开采价值。但枣庄和陶庄煤田可采之

煤均共有两层，其大槽层厚度自三米至八米，其小槽煤层厚度仅一·四米。两槽煤的储量当时估计约有五千万至五千五百万吨之多。

二、历次增资改组和经营情况

该矿在清光绪二十五年开始筹备，由张翼和张莲芬及沂县知县戴华藻并向各方征集资本，凑足一百万两。当时张翼任清政府“督办直隶全省及热河矿务”，对该矿不能躬亲其事，仅认股五万五千两担任该矿董事，从侧面赞助，董事会长由张莲芬担任并兼任经理，戴华藻担任董事兼任协理，赵尔巽为监察人。该矿创办伊始，仅整理各区土窑实行统一管理，聘德人高夫曼为矿师，普查煤的蕴藏量，计划开采程序和建筑铁路便利运输。但当时现场情况复杂，本诸艰苦经营精神，开辟新法小井，生产之煤在运河沿岸山东、江苏两省的济宁、杨闸、韩庄、宿迁、马头、界首、瓜洲、镇江等地设厂销售。经营六、七年以后，至光绪三十一年粗具规模，始遵照新章呈报清农工商部注册立案。次年，筹建枣庄至台儿庄运煤铁路，其长度为四十二公里，因受地方顽固封建势力的阻挠，直至民国元年（一九一二）方告完成通车。但在当时该矿董事张翼以帮办路矿大臣的政治力量，对该矿综理规划以观其成，中经义和团之变该矿几致不保，复以财力不济，未能按计划进行。

民国二年本诸矿师缜密勘探的结果，查明地下蕴藏量的情况，得到交通银行信贷支援，方开始建设第一大

井。迨生产正常后，煤的生产量较其他小窑倍增，每年生产达二十万吨左右。加以台枣铁路完成与津浦铁路连接，得到联运的便利，在浦口设立销煤厂，因此煤的销路除运河沿岸各站外，在沪宁铁路沿线打通销路，为该煤销售环节打好基础。同时遵照矿业条例呈请北洋政府农商部注册，以完成合法的开矿手续。在此关键时刻，民国二年创办人张翼因病逝世；民国四年，该矿第一大井发生火灾；次年董事长兼经理张莲芬因忧致疾逝世。当此绝续时刻，有识之士对国人兴办中兴的煤矿报以同情和支持，由徐世昌出面联络南北人士增加资本力谋改善。其时张勋驻节徐州，深知该矿蕴藏甚丰，为国人经营有希望的大矿，有意投资，即由该矿董事兼协理戴华藻之侄戴绪万商得其同意投资二十万两。后由赵尔巽介绍张作霖认股六万两，由其子张学良代表加入董事会为董事。

该矿值第一大井发生火灾之后，奠基人均相继逝世，各项事业亟待兴办与整理，遂改组董事会增加股本收足三百八十万元(在添足股本时将银两改为银元)。选举徐世昌为董事会长，朱启钤为代理董事长，董事有张学良、任凤苞、袁静谙、张仲平，监察人为赵尔巽、张叔诚。设总公司于天津河东二马路，推举任凤苞、袁静谙、张仲平为常务董事执行总公司事务。任凤苞曾任交通银行协理，过去与该矿有历史关系。袁静谙为朱启钤的贵州同乡，由朱介绍加入董事会为其助手。张仲平为该矿奠基人之一的张莲芬之子。经总公司聘戴绪万为驻矿经理，胡希林为副经理。在整顿中，首先确立会计制度，改用新式簿记，引用孙啸南为会计处长，又由浙江

商业学校选用毕业生四人协助工作，为该矿会计制度打好基础。（后孙啸南辞职去北票煤矿工作。）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朱启钤与张翼及中兴煤矿的关系。朱启钤，字桂辛，贵州紫江县（今开阳）人，清光绪中叶由大学士瞿鸿禨推荐给当时的路矿帮办张翼，由张派其在公署内担任侯补道职衔的官员。朱办事勤恳，甚得张之赏识，屡在徐世昌面前赞誉朱之才干，遂由徐推荐给荣禄，派充京师外城巡警司官。后徐世昌外放东三省总督，朱随往襄助政事，更得徐之倚重和信赖。因此，在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朱启钤被任命为南北议和的北方首席代表。袁世凯洪宪称帝，朱启钤积极筹划，出任登极大典筹备处长。帝制失败，朱与梁士诒、张膺方等被通缉，避居天津。张翼逝世后，徐世昌倡议各方对中兴煤矿增资以扩大生产，被推选为中兴煤矿董事会长，徐遂推荐朱启钤任该矿董事，并代行会长职务。朱事业心甚强，数十年艰辛努力，对煤矿的发展颇多建树。由于其与张翼过去的渊源关系，对张叔诚提携照顾，多年合作融洽无间。

民国八年中兴煤矿为了推广销路，增辟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处销售点，又在第一大井附近增开汤庄、佟楼、韩家岭各小井以厚生产，因此产销渐入正轨。实行经理制，推举朱启钤为总经理，袁静谙、张仲平为助理，并推举黎元洪为董事会长，向德商西门子洋行订购运煤车辆，并在溧口设厂收购木材，设立通州分厂、瓜州堆栈。为增进全矿职工和家属保健措施，设立鞠仁医院。开辟第二大井时，提议添足股本为五百万

元，取消不记名股份。该矿兴办之初有一规定，在增股时老股东有优先认股权，张翼的原股份为五万五千两，经二十年之久未发给股息，历年积累以股息一分计已达四十万元之多，在其逝世后，无力优先认股，将其权利转让与黎元洪。黎开始对该矿投资仅五万元，后得张翼之子张叔诚转让的优先权，先后共投资为七十五万元。黎元洪由其股份中拨出十五万元赠与武汉大学为奖学基金。

该矿在整顿后改进矿场地面建筑，与舜耕山大通煤矿合作筹办水泥厂，组织审查会清查全部矿产，设立中兴小学培植矿工子弟，以上各项建设皆需大量资金，于民国十一年扩充股本至七百五十万元，此次增资由黎元洪介绍湖北省方面人士投资一百万元。改组董事会，仍由黎元洪任董事会长，朱启钤、张学良、张仲平、张叔诚、徐节庵、罗义生、苏汰余、周景棠任董事，赵尔巽、吴炳湘为监察人。后驻矿经理戴绪万因病辞职，聘请原陇海铁路督办章祜（笃臣）为驻矿经理总司其事。该矿地处山东南部，又在津浦铁路中段，铁路运输对其业务发展有关系，初意聘章主持矿区事务，是为了能在运输上得到便利，但章祜接办矿区事务后，对办理企业没有经验，仍按其做陇海铁路督办的官僚作风进行企业管理，各项事业不按计划进行，应付当地各级政府也不甚融洽，时仅六个月即知难而退。该矿区经理复由戴绪万担任。

在当时那一段时期山东主政者，为田中玉、张宗昌、韩复榘等人。田、韩二人均为行伍出身，因该矿为

黎大总统主办，他们还有封建意识，遇事均加照顾，对该矿向不刁难；张宗昌系绿林豪杰，知道该矿有张作霖的关系，也向不刁难。虽如此，该矿经营数年未能获得理想的发展。每年股均不能如期发给，而将各股东应得利息滚存为投资。在经过增加新股后，调整人事，协理袁静谙辞职，由董事张叔诚兼任。为了加强开矿技术，派矿师朱言吾赴欧美调查，学习开采煤矿先进技术。在此时驻矿经理戴绪万不幸病逝，此人为一实干家，任驻矿经理时与矿工方面相处甚好，多年来未发生罢工事件。后改由吴炳湘任驻矿经理，吴曾为北洋军阀政府京师警察总监，官僚作风浓厚，更无办矿经验，因此任事不到半年辞职，即由驻矿副经理胡希林升任经理。

民国十七年，北伐军攻克枣庄，因中兴煤矿有北洋军阀投资，勒令该矿停工封存，由战地政委会组织中兴煤矿整理委员会，委俞飞鹏为主任委员，对北洋军阀投资进行清理。清理结果仅没收倪嗣冲股份五万元，其他如黎元洪、张作霖等人之股份均未触动。北伐军复命该矿报效军饷一百万元（认购战地公债），该矿董事会以筹措困难，拖延未办，为此，蒋介石大怒，下令将该矿收归国有。因中兴煤矿业务周转资金依赖上海金融界支援，其大部分股票皆因贷款抵押于上海各银行，该矿债券亦皆由上海各银行代理发行，彼此间的经济关系很深。为此，上海银行公会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向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农矿、财政、工商各部呼吁，要求收回没收成命。又由钱新之以私人关系从中斡旋，乃得农矿部指令，将该矿发还，董事会复将矿上存煤标售及向上

海各银行贷款，凑足一百万元，认购战地公债，了此一段勒索公案。

同年六月，董事会长黎元洪逝世，由董事会推朱启钤兼任董事会长，并推选黎绍基为董事，聘请钱永铭（新之）担任总经理，张叔诚、张仲平为助理。总公司由天津迁往上海（办公地点为上海南京路国际饭店二楼），并延聘德人克礼柯继任总矿师，积极准备恢复生产。该矿选聘钱永铭担任总经理的用意，是为了与南京政权发生联系，钱当时是交通银行董事长，在金融界声望甚高，更由于他是蒋介石的财政顾问，与蒋私交甚厚，有利于疏通南京政府的关系。

民国十八年八月正式复工。其时适台儿庄、赵墩支路与陇海铁路接轨，对该矿煤的运销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即在陇海铁路的大浦、运河两站设立储煤厂栈，为该路东段与中段沿线推销作准备。为了进一步改善经营，加强矿区管理，取消驻矿经理制，改设驻矿办事委员会，置委员五人由董事兼协理张叔诚、董事黎绍基、陈景韩、唐在章以及申士魁（当时为矿警队长）组成之，亲赴矿区工作。首要任务为增加生产，计划筹建第三大井。当时该矿无公积金可以动用，其时再行扩大增股恐非易事。由朱启钤的友人吴鼎昌（时为天津大公报社社长）向朱建议发行公司债二百万元，为扩建该矿第三大井之需。朱接受其意见，得到预期的效果。开始计划三年完成生产，在各方的努力下，仅一年又六个月即告完成。这一期间，恢复了沪宁沿线各销煤处的营业，设立了矿工补习学校，添设中兴中学和台儿庄中兴小

学，在连云港码头建成后筹建该港储煤厂栈，同时购买运煤船只十艘，由连云港运销上海、香港和日本等地。

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召开股东会，通过改一分股息为六厘；呈向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换领采矿执照，遵照新公司法改公司章程；改组董事会，推选叶景葵继任董事会长，罗义生、张叔诚为常务董事，朱启钤、钱永铭、张学良、周作民、叶琢堂、王荫泰、苏汰余、周景棠、庄仁舆、张仲平、陈景韩、黎绍基为董事，任凤苞、陈介、徐节庵为监察人；由董事会聘钱永铭继任总经理，张仲平、陈景韩为协理。此次董事会改组，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叶景葵被推选董事长，叶与南京政府财政部有密切关系，又与蒋介石、宋子文私交甚厚。新选任的董事，如周作民是金城银行总经理，对该矿经常以贷款支援，并与南京政府有密切联系；叶琢堂，过去在上海经营拍卖行业起家，与蒋介石同乡，早年蒋介石在沪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时，生活潦倒，叶劝其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并慨赠五万元得以成行，后叶在南京政府中虽未担任过官职，但在上海金融界中声势显赫。监察人陈介是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后转驻外使节为驻阿根廷大使，与宋子文有亲戚关系。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该矿的发展变化与政治浮沉是分不开的。

在连云港码头建成后，以购进的轮船从连云港往日本、香港、台湾以及南洋各地开拓业务。为此又设立中兴轮船公司，为中兴煤矿的子公司。为了各地钢铁厂的需要，增设炼焦厂以扩展煤的制品，打开煤与工业相配合的出路。日本的八幡制铁所对该矿煤的质量甚感兴

趣，因该矿的煤炼成焦炭后对炼钢有较好的效力。在此时期，该矿步入正轨，每年产煤升达七十余万吨，销路日广，可谓该矿兴办以来的极盛时期。

七七事变发生后，该矿被日本武力掠夺。在上海战争发生前夕，国民党政府征用私营企业船只封锁长江，该矿附属的中兴轮船公司有三艘轮船被征用，其他船只逃避隐藏后，也为日本掠夺。日本侵华目的是掠夺战略物资，最重要的即所谓“两黑两白”（两黑：煤与铁矿砂；两白：棉花与盐）。当时该矿董事会长叶景葵、总经理钱永铭均在上海，后来去香港转往重庆；常务董事兼驻矿委员张叔诚逃回天津；董事兼驻矿委员黎绍基避居上海。日本侵占该矿后，有意与该矿主持人进行所谓经济合作，曾由北平日本兴亚院头子盐泽清宣和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出面托大汉奸王荫泰（王当时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督办，因王为该矿法律顾问兼董事，与张叔诚交谊甚厚），三次向张叔诚磋商，劝诱张出来与他们合作。张不为所动，避居天津英租界，托病拒绝其要求，未与合作。日本遂单独在该矿掠夺原煤，由连云港运往日本。

抗战胜利后，该矿满目疮痍，井上井下的损失无法估计，即由驻矿委员张叔诚、黎绍基二人开始计划恢复加以整顿。因矿区环境复杂，张叔诚未能前往参与其事，由黎绍基派该下总煤师陈跃林就地接收；复因在抗战胜利后，该矿区境内治安紊乱，无法恢复工作。为了总公司和一部分矿区职工生活，即由董事兼驻矿委员黎绍基在沪设立该矿的子公司鼎中贸易公司，亲自主持经

营进出口贸易业务，并在天津设立鼎中贸易公司，由周一峰为负责人。同时计划恢复中兴轮船公司业务，派人将隐藏后为日本掠夺的船只，经过艰难曲折的手续，集中到青岛，聘姚禹矫为该公司经理在青岛主持一切，并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其业务于该矿总公司兼理，由黎绍基亲往香港、台湾以及南洋各地开拓业务。在抗战胜利后的两年中，该矿两个子公司业务尚称顺利，民国三十七年解放前夕，将中兴轮船公司所有船只，皆集中于香港，发展香港、台湾和南洋各地航运业务。此时，该矿董事会长叶景葵，董事叶琢堂、周作民，总经理钱永铭均离沪去香港，一切事务由董事黎绍基在沪负责处理。

三、建立台枣铁路的经过

台枣铁路为中兴煤矿附属铺设的运煤专用铁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该煤矿公司成立时，即在奏请办理煤矿呈折内声明建筑台枣铁路以利运输在案。至光绪三十三年该矿筹办第一大井时，预计煤的生产有大量增加，为便利运输，开始筹备建筑台枣铁路，聘工程师张并庚勘测路线，由起点至终点计长四十二公里，奏请开工建筑，经清政府邮传部批准照办。在进行中首要任务是购买土地，当时在山区乡村封建势力阻挠甚大，经过曲折的交涉，方得以按计划进行，但遇村庄及坟墓必须绕道筑路。原计划路线系从峄县东北关经过，嗣因该县绅士王进士在该县声势煊赫，他的宅第在东北关附近，百般刁难阻挠不予通过，不得已改道该县南关。这样多设置了五

十米铁桥一座，十米铁桥二座，增筑路基大弯道一段，增加了筑路费用。在枣庄设立车站时，附近齐村为清光绪庚辰翰林崔广源的宅地，其子崔培静倚其父在该地区的声望和势力，反对设立枣庄车站，后经过多方疏通调解，答应无偿供应他家全年用煤，始同意兴建枣庄车站。民国元年一月台枣铁路竣工通车，民国三年津浦铁路临枣支路筑成与台枣铁路接轨。台枣铁路本为该矿运煤而设，但为便利地方起见，也兼营客货，不过一切设备均甚简陋。民国二十四年陇海铁路台赵支路筑成，又与本路接轨，并经中兴煤矿公司与陇海铁路局商定，于枣庄车站至运河车站，每日对开客货混合列车各二次，办理客货联运，便利人民。该矿台枣铁路全长仅四十二公里，东接陇海，西连津浦，为了行车划一而收完全敏捷之效，因此对于各种改进事项，如沿线桥梁的加固，电报路签措施，台庄车站的改建扩大等，均与两大铁路配合一致。按以上情况，总辖该路建筑费用共为一百七十万元，以四十二公里正线计算，平均每公里建设费用约四万元。其他枣庄矿场所在地与各大井间，均筑有联络岔道及存放车辆岔道，添设煤务站专备装煤过磅之用，在二、三大井间开辟岔道范围逐渐扩大，计有矿场岔道总长度为二十公里。该铁路一切基建工程，如路基宽度、轨间距离、坡度、桥梁与涵洞、钢轨和枕木等，均与各大铁路基本建设工程标准相同。该路机车大小共十七架，车辆头二等客车一辆，三等客车二辆，守车五辆，棚车二辆，十五吨煤车五十六辆，三十吨煤车三十二辆，四十吨煤车二十九辆，平车六辆。自民国五年至

民国十四年十年间，运输情况尚称良好，其运输量每年均在三十万吨以上。民国十五年以后，内战迭兴，地方变乱，台枣一带沦为战区，运输停顿。民国十八年初大局安定，地方恢复平静，该铁路复经改组，事权统一，在其后七年间运输恢复正常，每年运煤量达到五十余万吨。在抗日战争初期，台儿庄战役名震世界，该矿车站皆成废墟，所有车辆损失殆尽。

四、解放后得到了新生

解放前夕，该矿董事会长叶景葵，董事叶琢堂、周作民，董事兼总经理钱永铭均由沪去港，该矿一切事务无人负责，等于停顿。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在沪的董事黎绍基北来天津与该矿常务董事张叔诚洽商该矿恢复生产事宜，张意应先改组董事会加强人事上的调整方可推动一切，后经协商结果，推选滞留北平的董事朱启钤为董事会长，张叔诚仍任常务董事，黎绍基为董事兼任总经理周叔廉为董事兼任协理（周当时为天津交通银行副经理，该行向与煤矿有贷款关系），任凤苞、唐伯文为董事，组成了该矿的领导班子。第一次董事会开会议决，请董事唐伯文去香港，设法将所有滞港船只，悉数重返大陆集中上海，得到人民政府的表扬。但所有船只未能即时加入航运生产，滞沪一年余，对该矿在经济方面损失很大，未能恢复正常生产。后经常务董事张叔诚商之全国工商联领导人陈叔通，由陈代向周恩来总理陈述该矿现状，亟待经济援助恢复生产。后得国务院令有关管理机构给以

支援，才得到全面恢复生产。一九五一年该矿申请合营，获得批准。由于该矿在抗日战争期间未与日本合作，在发给定息时，仍按该矿规定股息六厘发给，以资奖励。该矿经合营后，将其附近各小矿及小窑均并入，经营规模日渐扩大和发展，现已形成为鲁南一大矿区，是全国煤炭工业基地之一。

（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火烧渴口村

二十年代中期，峄县为防备“马子”打家劫舍，按区域组织联防自卫。峄北自卫团团长是崔福藩（蘧庵），团副田毓岷（瑶峰，兼四营营长）。渴口为四营一连（连长高镇南），与中兴煤矿公司、田庄三家组成联防，约有七、八百支枪。1927年12月13日，杆子头周虬龙率数百“马子”于下午4时突然包围了渴口，原因是渴口自卫团拦截了他们出山购物的人。渴口受困，虽告警，但中兴公司、田庄皆慑于匪势，按兵不救。结果，村民83人被紧缩逼进高培田楼内，堆上秫秸，放火焚烧。除12人冒险跳楼逃跑外，下余71人全部罹难。其中有3户被烧绝。

（田培材）

（渴口乡政协工作室供稿）

中兴公司包工柜

傅宝森

中兴煤矿公司成立后，在用工制度上基本沿袭峄县官窑局所采用的雇佣制度，各种作业人员都由“班头”（也叫“领脚的”）统带。“班头”的任务就是组织生产，安排活路和领发工资。

随着中兴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原有的用工制度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于是开滦煤矿的“包工大柜”制度在枣庄顺时而立。

民国十八年（1929年）后，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的经营方式，基本采用开滦煤矿的办法。公司设采矿处，专司煤矿开掘计划和采掘技术业务。采矿处把所辖煤区划分成几个生产段，段设工程处，作为管理机构。各段按实际情况划分出若干采煤工作面，（矿工称之为“掌子面”俗称“窝头”）分由“包工柜”组织劳力采掘。

承包采煤任务的班头（后称把头）无官称，习称“大头子”。大头子组织的承包班子称为“包工柜”。包工柜很多，为了区别，群众按姓氏呼为“张家柜”、“李家柜”。

包工柜是个生产组织，有权指使工人，无权支配煤炭。公司根据各段所报包工柜的产量开钱；包工柜靠窑

户（矿工）的血汗发财。

1938年前，全公司有新老4个采煤段和1个公段，分别由28家包工柜承担各项生产任务。大体情况是：

一段采区：在北大井下层940尺大槽煤区。包工柜有吉、董、白等5家。

二段采区：在东大井。大槽煤区，煤层高达8、9米。包工柜有洪、李、杜、毕、葛等9家。

三段采区：在北大井。此区包括北大井的一部分大槽煤矿和南大井的一部分小槽煤。包工柜有邓、赵、张齐、郭等6家。

四段采区：在北大井。这是个老采煤区，负责残余的角子煤。虽然零星，不集中，也是大槽煤。包工柜有彭、谷、陈、程等5家。

公段：负责南井、北井、东井的运输、下材料以及井口上下、升降把钩等任务。由郑、杨、赵三家包工柜担负。

28家包工柜登记的下井工人有4200多人，但流动性大，每天出勤率达不到80%，日产原煤不足2000吨。

1938年3月，日寇铁蹄踏入枣庄。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枣庄的优质煤炭早就垂涎三尺了！他们出于“以战养战”的需要，占领中兴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修复矿井。经过半年的排水、整修，年底命令生产。在用人上，他们继续任用对枣庄中兴公司内情了如指掌的德国人柯礼克为总矿师。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德、意是轴心国，任用柯礼克掌管采矿大权不会拆台。另外，还任用陆松崖（外号“路倒”）、周厚基两个中国

人为总煤师。各采区段里又在工程处设主管煤师（工程师），加强技术管理，保证出煤正常。在经营管理上，他们是就坡上驴，沿用中兴公司的包工柜制度：一面加强法西斯控管，一面利用包工柜奴役工人。为了掠夺枣庄优质煤炭，日本侵略者调进了大批机械用以掠夺式开采。采煤面开拓、扩展，用工量大增，导致包工柜林立，最后发展到38家。大体情况是：

一段：北大井。由1号（吉）、4号（白）、5号（董）、32号（赵）等6家柜承包。主管煤师俞启英。

二段：东大井。东大井采区分南北两片称“南二段”、“北二段”。南二段由12号（毕）、19号（杜）20号（陈）、29号（葛）等6家柜承包。主管煤师刘允萱。“北二段”由2号（田）、8号（杜）、11号（李）、13号（洪）等6家柜承包。主管煤师李建辉。

三段：南大井。南大井采区又分南、北两片，称“南三段”、“北三段”。南三段采石碑一带小槽煤，由14号（张）、15号（郭）、16号（齐）、17号（张）35号（苏）5家包工柜承包。主管煤师陈孝威。北三段由18号（董）、23号（邓）、28号（王）、31号（刘）等5家柜承包。主管煤师刘熙洽。

四段：北大井。由21号（程）、24号（彭）、26号（陈）、34号（谷）等6家柜承包。主管煤师孙其康。

公段：担负南井、北井、东井下材料、井架上运输、升降把钩、信号打点等任务，由25号（杨）、31号（郑）、38号（赵）等4家柜承包。主管煤师是荣焕

新。

中兴公司的包工把头多数出自于本地，少数来自河北省及本省诸矿区。公司所用煤矿机械多从天津吉昌洋行公司购求，有些职员就跟随机械来枣庄谋事。也有些人怀有一技之长，想闯荡一番事业的，如陈、毕、吉、刘、二董等从天津、唐山、淄博等地来到枣庄立柜营生。枣庄矿区的开采历史悠久，窑户众多，积累了许多采掘、管理经验。他们包柜往往是家传。例如张玉坤之弟在井下事故伤亡后，其侄儿请求接班揽柜，矿师看他尚通工程就批准了。董金环（工程师，大学毕业生）因公伤亡，其弟也被批准包号。还有一种被提拔、任命的情况，如苏老二（苏云田），他在执行工程监督质量上有心计，很得德国矿师柯礼克的赏识："给他一个号让他包！"从各柜拨来近百人，成立了35号柜。后来苏家柜发展到500多工人。

包工柜的把头，由于工作能力的差异或者工作环境的优劣，经济效益有差距。想摆脱事故多，效益低，困境大的采区段，只要与总矿师（工人称外国人为老毛子）、总煤师搞好关系，也可以申请调换。换一个煤炭肥，顶板好，比较安全的采煤面马上就可牟利。也有的在本段里调换施工区，在这里亏损了，换一个采面照样赚大钱。不过，调换包工区段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还真得有"鬼推磨"的本事才行。

包工柜在工程管理等方面要听从总矿师、总煤师、煤师、总监工、监工的指挥，要按采段划定的区域范围采掘施工。在日本侵略者统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监

工并不放心，他们每天也派出工程师和监工，既监督工人劳动，也监督中国工作人员是否尽忠“天皇”。他们为了掌握工人情况，在公司专设劳动科，其中有一个叫工人课的部门专门办理工人登记手续，发放工作证。包工柜用工，须先开信介绍到采矿处，而后经工程段主管人签字盖章批准，本人交3张1寸像片，办妥证件方可持证到班出勤。日本规定窑户（矿工）上班进矿门要先脱帽鞠躬，再出示工作证；下井时，在井口交牌（砸着印记的铁牌子）。公司靠所收到各包工柜的工牌计算出勤人数。

包工柜的工人，真正无产无业专以下窑谋生的只是少数，多数是周围十里八村的农民。出勤受农忙季节影响很大。日本人在农忙季节为了吸引工人多出勤，采取补贴香烟、肥皂、土布的办法。但是，窑户们本来对里工，外工待遇不公平就心怀不满，加上抢农时，那些小恩小惠根本刺激不起来积极性。直到农忙过后才陆续下窑。

1942年夏，日寇掠夺煤炭更加疯狂。一个叫朱花的日本监工在北三段大槽煤采面上坐镇不让工人上井，十分横蛮。这时大巷木垛上边压力突变，落下一块重约百斤的矸石，正巧砸在朱花头上。这个鬼子监工当场毙命。日本人对这次事故十分恼火，专门开了追悼会。日本矿长大桥小太郎立即下令增派十多名日本矿警荷枪实弹跟班下井，名为保护日本工程人员，实际对工人血腥镇压。与此同时，还对包工柜下令：凡招用新工人，都要取保立状，查问清楚来历方可办理登记手续。

日寇霸占中兴公司时期，工人的登记数曾到过8950余人。其实虚数很多。不光包工柜把头吃空额，煤师、监工，查二头子手里也有空额。日本人只按人数要产量，明知有空额并不追究。这样空额越多、工人要完成的定额越高、劳动强度就越大。工人与把头，查二头子的矛盾很尖锐。有的柜上查头子、二头子、为了多出煤弥补亏空，对工人施加压力，态度凶横，甚至敲诈勒索，因此，往往遭到工人的痛揍和暗算。1941年秋，一个外号“吴大傻子”的工人在北大井井架上因下井与查头子魏三发生口角，吴大傻子一怒之下挥起木工斧头将魏砍倒，逃到淮南煤矿谋生去了。

把头的剥削和监工的恶劣也造成工人的流动：或弃工远走他乡，或跳柜，换一个自认为好一点的柜去下窑。为此，包工柜在用人问题上常有纠葛。他们有时也会耍点手腕，藉以笼络工人，希望少出事故。

包工把头和工人之间，有一个办事班子负责帐务、督察、勤杂事务。各柜人员有多有少，与各自的生产规模大小有关。按分工，基本上都要设司帐（坐柜）、跑牌、接灯、散牌、查头子、二头子等。在包工柜里查头子、二头子作用很大，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煤炭采掘经验，跟班下井一是督促工人拚命干活，再是指点生产操作。工人和他们时有冲突，矛盾激化时就有流血事件发生。

包工柜执行公司制订的三班生产制度。早、中班出煤，夜班维修，拆柱子、挪簸箕（运煤机），为早、中班创造出煤条件。因为早班是出煤的关键，日本监工和各级煤师多在早班下井督阵。早班很少为中班创造出煤

条件。为了使中班产煤量不致悬殊，矿方也着意派技术高，经验丰富的监工，总监工下井，既督阵，又指挥。包工柜也是派经多见广熟练工人到中班下井，使中班产量能完成定额。

夜班虽没有生产任务，但要为早、中班出煤准备条件。当班要整理停当，还要合乎生产的要求。解放前采煤是使用充填法，采空一洞煤再用矸石填上一洞，矸石不上井。倒棚充填是最危险的活，因为顶板支柱倒出后必然要下压，如果顶板碎裂（俗称“烂顶”）倒棚情况更复杂。这项工作，在操作时一定要精力集中，身手麻利，躲闪灵活。但是，夜班工人白天多数无休眠条件，下半夜更是神困力乏，因此夜班经常出伤亡事故。采矿处对各包工柜死亡矿工的处理，只是开个条子到机厂木工处领一口薄皮棺材，再发给伪储票300元应付了事！

包工柜每日出工和产量都由公段负责记帐、结算。公司规定下井工人下井时要交各柜的牌子，因此，工人下井前到井口领灯（过去是豆油灯，后来是电石灯），牌随灯领。在井口专由公段设置的稽查员收取牌子，点牌计工。出煤时，各采煤面在车皮上拴好本柜煤牌，提上井后，公段把钩收取，点牌统计各柜煤炭车数，计算产量报各工程段。

各主管工程段每月结一次帐，根据产煤量、开拓进尺数（含掘进和挖通风小眼），算出经济效益。扣除各种损耗，如坑木、黄药、雷管、机器损耗等，每月开出工值单。包工柜持单到财务课算帐领款。而后，各柜再经一番克扣，依半月一借支，一月一开资的惯例再按大

工、小工的差异开给工人。

下面，举17号张家柜1942年10月份的生产、开支情况为例，以见包工柜经营之一斑。

公段10月份根据井口收取煤牌数，张家柜是5785车（根据公段产煤报表），每车载容量0.68吨，折合原煤3934.2吨，该柜吨煤值公司作价为10.5元，产煤总值款为41309元。在开拓上，上大巷开拓石洞进尺为101.5米，每进尺1米为15元即应得进尺款为1522.5元；上风道炭洞小眼进尺为157米，每米5元计款785元。10月份产煤及进尺款合计为43616.5元。是月坑木消耗按每立方米90元计算，即8550元；机器折旧，工具损耗等2050元；炮采煤使用黄药（含雷管）350斤，每斤5.5元计1925元；工程质量不合格，扣罚款1250元；鞠仁医院开列工伤医疗费款2750元。10月份合计公司各项扣款16525元。张家柜10月份除去扣掉款在公司领款为27091.5元。

张家柜10月份总投入工为14205个，其中下井工11275个，下余为地面用工和自身用工。支付工资的办法，柜上给每人定出日工资额，然后按30天予算出月工资，月底开资时按实际出勤数发给工资。例如：

（1）查头子4人，每人每日定工资5.5元，4人月计660元；

（2）二头子9人，每人每日定工资4.5元，月计9人共1250元；

（3）柜上司帐、跑牌（统计）、技修、杂工等人员12人，每工3.5元，月计12人1260元；

（4）按照月投工的45%计算大工数为6392个，每日工值为1.90元，计12145元；其余小工7813个，每日工值1.60元，计12500元。

按以上支付工资计算，张家柜10月份出煤所领工程款还不够支付的。其实，除第四项基本是实数外，其余三项都是匡算数。关键是按实出勤发给工资。敌伪时期工人、查头子、二头子大都半月一个轮休，但一个月很少有能跑上27个班的。例如：张家柜10月份毕查头子因感冒病休2天，加上轮休2天，实到仅26个班，每工25.5元计得143元；杨查头子到班27个，日工资5元，计135元；温查头子手指碰伤休假三天，共上25个班实得工资125元。照此计算查、二头子工资都不超过预算月工资。而张大头子这月净得余款1407元！是工人工资的几十倍哩！

枣庄沦陷前，矿工们把收入概括为“大工五毛四，小工四毛三”这不过是个约数。张家柜10月份为工人所定工资大工1.9元，小工1.60元，并非月月如此，要根据出煤量来决定。有一个月大工的工资仅只有0.85元，小工0.72元，因此矿工工资没有保证。

张家柜在38家包工中不算是大柜，常年日出勤也就是350人左右，只相当于大柜井下工人数的五分之三。采面是小槽煤，除安全上略比大槽煤区好些外，其他方面并不优越。把头一人所得工资够几十个大小工苦一月的吧！更不用说那些大包工柜了。

由于切身利益所系，各柜包工头都把吨煤耗资看得十分重要，损耗越少自然是收入越多。有时连大筐（条编）和筐系（苘麻绳）的损耗都要过问，责斥查、二头

子使用“太费”。有的包工柜为了对付公司，遇有冒顶塌方事故，就借机扩大灾情，将机器损失不是呈报为“报废”，就是呈报“丢失”。一些进尺和用工数量皆随人员伤亡而报销。这就是说，包工把头不仅吃空额向下盘剥，而且虚报谎情向上揩油。

日寇为了加速掠夺枣庄的优质煤炭，在刺激工人多出勤上煞费了心机：由公司配给粮食，棉布（士林）等生活必需品。粮食有大豆、豆饼、高粮，甚至还配给过大量橡子饼、面。不管好坏，给什么接什么。所以当时矿工中有句饱含辛酸的话：“有心不下这班窑，哪有橡子面掺猪毛！”（盛面的麻袋中有用猪毛编织的）。配给物品都要在开工资时扣除钱款。1942年后，日本人又想出了新点子：凡出勤26个班以上的工人加发日用品，半尺布，一合“大金花”牌香烟；满10个工加发一块肥皂。各包工柜按下井牌子数每月到工人课配给处一次领取，然后按各柜实出勤情况分发下去。所剩物资甚多，自然为包工柜把头所有，无形中包工柜又多了一层收入。

各柜的月终结算由段工程处负责核算，在计算中，往往有这种情况：同一个段里几家包工柜在同一项工程事件上未必受到相等待遇。这就要看把头和工程段主管煤师的关系了。关系好的，融洽一点，做帐时宽容些，不十分苛刻算计；关系不太融洽，或认为包工把头奸诈馊抠的，那就刻薄算计，甚至从重克扣。表面上看，包工柜之间有奖有罚，实际也是公司方面及各段里煤师主管人的一种手腕，今日“连横”，明日“合纵”，都是

为的使把头们忠诚效力。所谓克减，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到头来还是窑户们倒霉。这样做的结果，只不过是在各包工柜之间增加了一些勾心斗角的由口罢了。

（齐村镇政协工作室供稿）

枣庄旧时浴池

旧式浴池，池底盘着火道，用来保温。浴室拱型顶，窗小。由于空气不畅，常有浴客“晕堂子”的事发生。池水一般只添不换，以“上半夜摸池，下半夜打飘”作清洁处理。“摸池”，是在上半夜客散之后，水静止了，人下去用布将池底的沉积物轻推捧出池外；“打飘”，下半夜水烧热时，沉滓泛起，飘浮水面，用木片将浮沫刮聚打捞出去。为了多揽生意，看堂人员常催促洗罢澡的人让铺位，但又不好直截撵，就漫天吆呼：“前客让后客，穿脱连利的！”“擦干生虱子，晾干起皮子！”意思是快穿衣走路。

（王克明讲述）

大辛庄人走过的一段路

文史委

安城乡的大辛庄村，在旧社会是个佃户庄。

1932年，东流井的地主董金池在小辛庄置田占业2000亩，把庄名改为“董新庄”作为他的外庄子。居住的都是给董家扛活、种地的佃户。

解放后，农民斗倒了地主，当家作主把庄名改为“大辛庄”。

大辛庄人在探索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独特的经历：带头冲破思想牢笼，成为农业合作化道路上的闯将。

变工组

1946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辛庄成立了农救会。贫苦农民为减轻负担，在农会率领下向地主展开“减租减息”的斗争。斗争取得胜利。为解决贫困农民劳力、农具困难和开展党的工作，农会会长刘家启发动男女进步青年14名，组织了以帮工为形式的换工组，有的也叫变工组。

1947年，国民党二十六师和五十一师进攻解放区，地主、“还乡团”趁机对翻身农民反攻倒算。抓走了共产党员刘家启等人。变工组随之解体。

互助组

1948年秋，淮海战役胜利后大军继续南下。1949年，大辛庄乡政府建立。乡政府号召：“一面支前，一面生产”。为了取得政治上翻身，大辛庄农民在农会会长、共产党员刘家启的带领下，清算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倒算罪行。此后不久进行了土地改革。虽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原本佃户，虽有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并不完全具备。部分农民面临破产。此时，农会大力宣传党中央“组织起来”的方针政策，贫困农民十分拥护，自愿结合，先后办起了季节性变工组8个。以“帮工”，“搭犋”、“帮牛腿”等为组织形式。后来以刘家启、程玉兰、李岐山、王启洪等为主的16户农民，建立了两个常年变工组共78人，土地177.5亩，牛3头，驴2头，破旧农具两套。在生产上采取以人换人，以人换工。在报酬上根据每户土地多少，多干的户由少干的户找粮，麦、豆草给有牲畜的户，收入的粮食、柴草归个人私有。经过一年的变工互助，小麦亩产100斤，比单干户多产30斤。因而受到中共八区区委的表扬奖励，推动了变工互助合作的发展。

1950年，土地改革使农民分得了土地。农民有了地却喜忧参半：一是农具不全，二是畜力不足，三是劳力弱。李岐山3口人分得了7亩半土地，忙不过来，他积极响应党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串联了8户贫苦农民，办起了互助组。全组31人，土地137亩，牛3头，农具一套。互助组成立后，民主选举李岐山为

组长。还设有记工员、技术员、保管员、检查员。互助组的土地、牲畜、农具和收入的粮食、柴草仍归私人所有；在报酬上实行了“按工记分”，土地统一耕种，收入归个人；牲口每耕一亩地规定找饲草50斤；农具私有，公用公修，折价保成本，坏了公共赔偿。互助合作解决了生产中的困难。

大辛庄在土地改革后，村里的阶级成分划分得十分清楚。95户村民中，贫农69户，下中农8户，中农8户，老中农5户，富农3户，地主2户。由于长期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之间的矛盾，贫富不均，拥护互助合作的绝大多数是贫农和下中农。富裕中农手里掌握一部分生产资料，怕参加互助组吃亏，表现不积极，看势头。大辛庄的干部为了发展互助合作，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的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使互助合作能够不断发展和巩固。

李岐山领导的互助组，全由群众自愿结合，入组欢迎，出组欢送。组员曹桂春在互助组怕吃亏，退组单干。1957年收麦后，抢种豆子，他没有及时种上，豆子减产一半。秋后，曹桂春又要求入组，李岐山热情地吸收了他。这个组在使用劳力上注意分工合理，如：男的主要是耕、种、送粪、运庄稼；女的倒粪、收割；老人看场、看小孩；儿童放牛、割草。男女老少都有活干。李岐山为了寻找增产途径，自费到莒县爱国村学习吕鸿宾的办社经验。回来后，在互助组里制订了耕种计划，解决了季节性农活耕种先后的矛盾。又引进了“四三八”、“白马二号”小麦、“胜利百号”地瓜等品种。

同时，带领组员抗旱打了9眼土井，扩大了水浇地面积。“组织起来产量高”，单干户看到了好处。秋后，李岐山的互助组由8户发展到11户。组员宋汝合的11亩旱稻每亩产量550公斤，县里让他出席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介绍旱稻丰产的经验。

王启洪互助组1951年由变工组转为互助组时，组里只有1头牛，2头驴，一套农具。他们积极改进生产技术，采用优良品种，打了7眼井扩大浇地。岭地小麦平均亩产70公斤，丰产田小麦达到亩产240公斤。这一年组里增添了3头大牛，一把耩子，一部水车。8户组员有余粮的2户，年收年用的6户。盖了14间新房。45岁的甘老大不仅盖了两间房，娶上了老婆，还买了一头大黄牛。互助组还配合扫盲，组织参加民校学习。组长王启洪原先不识字，在民校学习后，能阅读《大众日报》。

互助组在经营管理上，开始是“死分死记”：不论干什么活，都人顶人，数顶数，同样记分。这样记，整劳力吃亏，影响了积极性。后来根据外地经验，经过组员讨论，把“死分死记”改为“死分活评”，采取按天按段根据组员劳动情况进行评分，组员认为这样合理，能多劳多得。1952年底，全村已发展10个互助组，入组农户78户，373人。

大辛庄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得到峄县县委的重视，专门派了8人组成的工作组来总结经验，帮助工作，同时还安装了电话。李岐山、王启洪、程玉兰等先后出席了县劳模会议，被峄县人民政府授予县劳动模范

称号。王启洪1952年出席了省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被评为丰产互助劳动模范，《大众日报》上还登了他的事迹。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由于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它的思想基础是自愿互利，土地、牲畜、农具仍是私有制。种植无计划，农忙各自争时，抗不住天灾人祸。不久，村里出现了分化：何德科因常年患病，无钱治疗，卖了3亩地；朱印全卖了2亩半地。全村1208亩地，有106亩土地年年不上肥料。村里还出现了放高利贷剥削的。“四属五保”更无法照顾。

1952年冬，李岐山和王启洪这两个互助组根据形势发展，向县委提出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要求，以便进一步解决互助生产中的集体劳动与个体经营的矛盾。县委经过一番酝酿和考察，同意在自觉自愿的原则下，两个常年互助组进行合并，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2月10日，大辛庄村办起了全县第一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社19户，78人，男女劳动力34人，土地218亩，牛9头，驴2头，农具2套，水车2部，土井16眼。社内有党员7人，团员15人。

办社开始，群众关心“由谁当家”，最后民主选出9名社管理委员会委员（其中党员5人，团员1人）。李岐山当选为社长，王启洪副社长，刘银才、刘化清任会计。社管理委员会组成后，划分了2个生产队，正副

队长各1人，分4个生产小队，正副小队长各1人。设置了记工员、记帐员、保管员、技术员、饲养员。

初级农业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除留出小块园地供个人使用外，其余土地全部入社统一耕种。牲畜私养公用，农具私有公用公修，采取“地三、畜二、劳五”分红办法。

合作社成立之后，社员生产劲头很足。这一年小麦亩产达到138公斤，比互助组时每亩增产68公斤。当年调换3头大牛，养猪69头（自养35头，公养34头）。到大辛庄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峄县县委书记吕少奇等领导同志多次在这里召开办社现场会。社长李岐山出席了省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受到省委的表彰，还领回了省委颁发给农业合作社的一面奖旗。

1954年春，合作社发动社员讨论，制定了办社章程。主要内容是：第一，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农民有“入社自愿，出社自由”的权利。土地入股，按“一查三定”时丈量的地亩和确定的地块级别评定土地股。把原先制定的“地三、畜二、劳五”分红比例改为“地四、劳六”分红。第二，对耕畜、农具、种子、饲料、饲草折价入股，顶股份基金；对于其应交股金部分，分年偿还。第三，劳力按定额评工记分。第四，收益分配，在留足种子、饲料、公粮的基础上，从总收入中扣留百分之一到三的公益金，百分之三到五的公积金。季节预分，年终决分。第五，对肥料、圈杂肥、沤绿肥按质量民主评价记帐，从年终总收入中扣除归还。第六，社里的财务收支和分

配，做到民主公开，按月按季向社员公布。经济开支设专人分管，按数量多少，分级审批使用。

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办起了一处农忙幼儿园和8个农忙托幼组。针对“死分活评”造成“活好干、分难评，睡觉晚，伤感情”的弊端，根据莒县爱国村吕鸿宾的办社经验，实行了耕作、播种、管理、收获、供应五类农活的劳动定额管理，超产部分归个人的办法。

这一年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全年平均亩产233公斤，吸引了社外群众纷纷要求入社。秋后，初级社由原来的19户扩大到78户，373人，土地1239亩，土地股993股。社扩大了，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社管会由原来的9人增加到17人；生产小队由4个增加到6个。

1954年，社管会根据社里的条件和社员的专长，陆续办起了油坊、粉坊、棉花加工组和石灰窑，当年收入500万元（旧币）。为了发展生产，李岐山和县工作组组长史洪连跟随省委书记项明到北京参观农业机械展览，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秋天，李岐山又出席了济宁地区农业劳动积极分子会议，大会奖给收音机1台。

到1955年，大牲畜由办社时9头牛，2头驴，发展到25头牛、3头驴、1匹马；社内公有农具有：双轮单铧犁2部，旧式犁14部，耙5盘，耩子9把，大车5辆，喷雾器2架，水车8部，打井15眼。为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办社3年，由于生产发展，社员生活得到提高：人均口粮200～250公斤；社员自给有余的户占总户数的

59%，年收年用的户占35%，因老弱病残缺粮户占6%；20%的户建了新房，50%的户添置了生活用品。1955年水、旱、虫灾比较严重，产量受到影响，造成26户口粮不足。社管会对缺粮户逐一分析情况，采取了不同的解决办法：6户按地股分红和工分数不够口粮，用社里卖地蛋分的钱折算口粮；9户地股分红，应得工分不够口粮，由社偿还的投资款及社里留的公积金暂借给各户，秋后分红时扣下；11户地股分红，应分之数不够口粮，社里还给各项投资，如口粮仍不足，由自己和余粮户协商借用。为26户缺粮户共解决口粮1865斤。

为了总结办社的经验和教训，专门召开了社员大会进行讨论。讨论中，干部和社员认为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使用劳力，副业相应发展，各业都比互助组收益高。讨论中，劳力多土地少的社员对按土地分红有意见，认为不取消土地股就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经过讨论，全体社员赞成取消土地分红，认为按劳分红合理。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冬，大辛庄乡掀起了冬季生产高潮。这时全乡7个自然村有11个老社和2个新成立的社，多次酝酿愿与李岐山领导的社合并成一个高级社。中共峄县县委根据农村合作化发展的形势，在上级指示下，大辛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11月，大辛庄乡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这是峄县第一个高级社。由全乡的大辛庄、野岗埠、潘官

庄、纪官庄、良辛庄、牛角、南安城7个自然村的13处初级社合并而成。全社共836户，3675人，12505亩土地。高级社实行土地公有，取消土地分红，采取以劳为主的分配原则。全社设党总支委员会，下设3个党支部；设团总支，下设8个团支部。生产管理，行政事务由社管理委员会负责。

1956年3月29日，社管理委员会选举成立。由23名委员（女委员4人）组成。管委会下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3人，负责日常工作。党总支书记王文忠负责政治；社长李岐山、副社长李怀珠负责农业生产；副社长靳洪喜、童金英负责经营工作；刘银才任会计、刘化清任会计网长。社管会下设9个股，即：生产技术股、财物保管股、包工包产定额股、水利建设股、饲养股、副业股、信贷、治安保卫股、文化福利股。各股股长由社管委会委员担任。全社划分8个生产区，16个生产队。生产队设正副队长3人，并配备技术员、记工员、保管员、经济员、水利员、副业员、检查员、福利员、治安员等9大员。生产队下设66个生产小组，每小组设正副组长各1人。另外，社里有妇女代表会，11名委员，正副主任各1人。监察委员会7名委员，正副主任各1人。全社小组长以上干部510人。当时，还缺记工员、记帐员40人，社管会为了解决人才不足的困难，在8个生产区开办了民校，晚上学习文化。

1955年全社有党员13人，团员25人。高级社成立后，党团总支很重视组织建设。1956年5月，大辛庄乡通过整社建党，党员发展到31人，团员发展到60人，约

占全社总人口的1.5%。

高级社干部的待遇，以固定的办法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按最高劳动力250个工日；二等按220个工日；三等按170个工日，记帐报酬。如工作表现好，一年两季再提成奖励。固定补贴人员有社长4人，会计1人，队长7人。其余干部按社务出勤的天数，采取每天补贴工分的办法。

高级社成立之后，按照上级指示，首先进行整社巩固工作。根据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允许要求出社的26户出社。同时对社员成份进行了审查、清理。经过整顿，除地主、富农成分以及受管制改造的反革命分子未吸收和一部群众未入社外，入社农民占大辛庄乡总农户的89.6%，共817户，3456人。社管会对入社的11045亩土地实行统一管理，拔除了地块间的界石；划分了生产队的经营范围；制定了《峄县郭里集区大辛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章（草案）》共11章48条。社内实行计划、劳动、财务、物资“四大管理”。还讨论了两年农业发展规划。

1956年3月，为了加速农业发展，根据上级指示，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批判。同时展开比思想、比劳动、比贯彻政策、比创造、比完成任务的“五比”活动。全社开展了红旗竞赛，掀起生产高潮。至当年8月，共打井193眼（其中大口井一眼）；挖蓄水池1个（3米深，面积3.5亩）；建猪圈8个，社里养猪210头，社员养猪126头；建石灰窑2个，烧石灰4万余斤；栽苹果树1000棵。116人评为先进，受到奖励。

社里实行统一种植。全社土地分由16个生产队、66个生产小组耕种。社内有大车16辆，双铧犁7部，旧式犁91部，耙21盘，耩子130把，水车67部，喷雾器8个，还有其他农具按数量、质量分给生产小组调配使用，并建立了使用制度。种子、农药分由生产区保存，队、组按规定领取使用。肥料（包括化肥）由社里供应。

社里试行包工包产劳动定额。根据季节不同，农事忙闲，天气长短，土地远近，耕作难易，活路轻重，技术高低，牲畜强弱，农具新旧等条件，采取分级定额按件记酬制的办法，由5类农活完善到8类农活200余种，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峄县县委对此经验给予了肯定。并向全县推广。

大辛庄高级社在全社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8个生产区使用一个分配方案，工日工值一样。实行夏季预分，秋季总分，年终决分。为了避免瞒产私分，各生产区都由社员民主讨论推选大公无私的人负责掌秤过粮。按工日分配柴草。对“五保”、“三定”户给予补助粮食和现金；对因公伤失去劳动能力和家庭无劳力的，照顾工日。

1956年，李岐山被评为山东省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积极分子，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同时省和华东局也分别对他进行了表彰、奖励。

1956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针对农业合作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冬季生产的指示》，大辛庄高级社

在县委工作组的帮助下，发动社员进行整社。

整社中，社员们对于劳动管理的过分集中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提出尖锐批评，尤其对干部主观决定问题不满，感到民主办社的思想没有了。因此，对完善各种制度和改进经营管理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决定，按生产区劳动定额包工包产，超产粮除按规定各种提留交社外，剩余部分由生产区的社员商定处理；财务开支包干，建立“三定一奖罚”（即：定任务、定措施、定劳动人员；超额奖励，没完成任务受罚）制度，费用开支由生产区自己解决。

通过整社，密切了干群关系，掀起了冬季生产的热潮。县、区等上级单位对大辛庄高级社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都给了很大支持。国家拨款购买了2辆胶轮马车，6匹部队退役的马，添了大牛3头，水车40余部。在县委工作组的帮助下实行了“三包一奖”（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包赔）“四固定”（即：劳力固定、耕畜固定、农具固定、地片固定）的责任制，克服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

到1957年，全社自给有余户占40%，年收年用户占55%、5%的缺粮户在社里的帮助、调剂下也没有挨饿。另有15%的户盖了新房子，30%的户添置了生活日用品。全社有鳏寡孤独和残废军人、无劳力户68户，145人，根据中央“保吃、保穿、保教、保烧、保葬”的五保精神，按其收入分别由社里补助解决，基本做到了生养死葬。社会福利方面，办了3处小学，有学生150名；常年民校由5处发展到8处，有60余名青壮年

参加学习。另外，还设了一个保健站，小伤小病能治疗。

由于社员生活水平提高，生产情绪也比较稳定。1957年秋，社会上掀起一股闹社、退社风，大辛庄高级社没有受到大的影响。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比较高涨。

人民公社

1958年8月14日，峄县县委召开乡党委书记会议，贯彻省、地委试办人民公社的会议精神。决定先在郭里集乡试办。8月16日，郭里集乡召开党委会，认为办人民公社条件已经具备。8月27日召开全乡党、团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9月1日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宣布成立红旗人民公社（后改为郭里集公社）。9月2日举行了庆祝大会。大辛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隶属红旗人民公社编制领导，土地和生产资料一律归公社所有。在经营管理体制上，实行公社一级核算。原大辛庄高级社社长李岐山被选为红旗人民公社副社长。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行统一领导。推行生产战斗化，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任务时间化。按军事编制，全公社组织了13个团，大辛庄高级社为1个营，所属的8个生产区划为连，16个生产小队划为排。全营包括原7个自然村，997户，土地11885亩。宋朝英、靳洪喜等4人任正副营长，下设正副连长16人，正副排长32人。

1958年9月，公社贯彻党中央发布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紧接着，大家斗志昂扬地掀起了生产“大跃进”：农业搞深翻土地，配合工业开展了大炼钢铁运动。一律实行“大兵团作战”。大辛庄95%的整半劳力都投入了这两项“作战”。

人民公社一出现，说是共产主义来到了。“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开始实行供给制，大辛庄按指示办了食堂，社员一律到食堂领饭菜就餐。不仅社员吃饭不要钱，甚至连过路人到食堂吃饭都不要钱。社员错认为“吃大锅饭”就是共产主义生活。这时正处在秋收秋种的农忙季节，村里只剩下老弱病残人员，豆子无人割，豆粒全炸在地里；地瓜也没人刨，由着冻烂。本来是丰产年，却没有丰收。在生产管理上，提倡“政治挂帅”，砍掉了包工包产劳动定额责任制，取消了评工记分。在分配上统一拉平，多劳不多得，多收不多吃，“够不够三百六”（每天1斤粮）。

成立了人民公社后，处处讲“公有”，社员的自留地一律收归集体，不准私自开垦荒地，不准搞家庭副业和饲养业。土地、牲畜、车辆、粮食、蔬菜、黄姜、饲草等上级无偿调拨。浮夸现象严重。当时，生产队长刘荣义对这些做法看不惯，被说成“右倾保守”，当作“白旗”拔掉（撤职）。社员劳动情绪低落，生产大幅度下降。

1959年3月，中共峄县县委召开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小队五级干部会，传达贯彻中央和省委工

作会议精神，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大辛庄由军事编制的“连”改为生产大队，靳洪喜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启洪、王洪春任正副大队长，刘银才任会计。这一年，上级拨款退赔了集体和社员在1958年“献钱、献粮、献物、献房”“四献”活动中所“献”的财物，调动了干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当年劳动工日值（包括粮、菜、草）1.5元。

1960年春，在大辛庄大队的生产刚刚回升的时候，上级指示以富带穷大合并，将原高级社时的5个自然村重新合并为一个核算单位。全大队730户，2909人，男女劳力879人，土地6199亩。合并后，冯永析任大队长，王茂喜等4人任副大队长，任思学担任会计。由于各队穷富不一，经济悬殊大，人的思想觉悟也有差距，结果生产统不起来，当年粮食减产30%，全年每人平均收入24元，由增产队下降到三类队。社员每人每天只有半市斤口粮。

1961年，贯彻中央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调整了经营管理体制。重新落实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大辛庄管理区划归安城公社，将5个自然村分开。经市批准，大辛庄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原大队党支部书记因经济不清被撤职，由安城公社副社长李岐山兼任大辛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支委会由9人组成。王茂喜、程玉兰为正副大队长，刘化清担任会计网长。大队下设2个生产小队，正副小队长共6人。大队又重新划分了自留地，支持社员恢复家庭副业。社员对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感到满意，生产有了新的起色。

1962年春，划归枣庄市齐村区。基本核算单位由原大队下放到生产队。经营管理上实行“三包一奖罚”（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赔偿）和“四固定”（生产小队的土地、牲畜、农具、劳力固定）调动了生产小队和社员的积极性，生产得到了发展。

1963年，大辛庄大队粮食总产113210公斤，扣除其他开支，社员报酬按人七劳三的比例分配，平均每人口粮138.5公斤。

1964年，“四清”工作队进村，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由于绝大多数干部是党、团骨干力量，又是近两年来新调整的领导班子，队里经济收入单纯，对查出的经济问题多属于借支挪用。大小队干部10人中退赔款仅780元。干部中没有因“四不清”受处分的。

1965年11月，“四清”结束，建立了领导班子，党支部委员会由5人组成，李岐山任支部书记，靳洪臣任支部副书记。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由9人组成，王茂喜任大队长，房洪玉、裴万喜任副大队长，王洪清、刘学德任大队会计。下设2个生产小队，正副队长各2人。同时新建了由7人组成的贫协委员会。

大队重视科学种田，1964年建立了科学试验小组，粮食产量达到165810公斤，交公粮卖余粮32787公斤，社员口粮每均206.5公斤。生活得到了改善，两年新建房80余间。

1966年，大辛庄大队被评为齐村区先进集体。

（根据区农工部采访稿整理）

建国前齐村的普通教育

蒋树柏（执笔）　傅宝森　吴本生

明清以来，齐村由于物产丰腴和盛行掘窑采炭，使商贾辐辏。经济往来促进了平民教育的兴起。

抗战前，有人曾见齐村东圩子后街三教堂正门内墙所嵌一方小碑上，有“义学”“康熙××年”等字样。据查《峄县志》：“康熙五十四年，通饬各省、府、州、县，立义学，民间亦听自建。自此无社、义之分矣。”看来，公元1715年以后，峄县境内乡间办学已趋普遍，社学（官办）、义学（民办），已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这块小碑至少说明齐村民众在康熙年间接受了办义学的宣传，是否兴办，尚无佐证。

《峄县志》又载：“齐村有学田地一顷九十七亩”。这是说齐村为支持县署办教育，提供了学田地197亩。自己是否兴义学了？不得而知。另有传说：翰林崔广沅的塾师王圣仪曾在义学执过教。由此可见，平民教育在齐村已有影响。

推翻帝制，民国建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废止读经书，引进欧美学制，创办新学。齐村绅士崔毓相积极响应，于民国二年（1913年）将三教堂5间北屋的神像全部拆除投于河内。经过一番清理、修葺之后，将北屋当教室，3间西屋为学生休息室，门内东

西厢房为教师办公室和住房。聘请颇有名望的前清秀才黄子臣（峄县人）和在师范讲习所受过训练的田毓沅（北田庄人）来校任教。学生按先前在私塾读书的程度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相当于后来的四、三、二、一年级），共72人，同在一个大教室里进行复式教学。课程设置国文、算术、修身以及体操、唱歌、图画等科。课本封面上印有“单级国文教科书”，“单级算术教科书”等字样。均系商务印书馆印刷。教材以文言编写，内容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主，强调尊长敬上。重视书法教学，每天早饭后都要写大楷和小楷，要求当堂完成，老师当面圈改。优秀书法张贴在校门过道墙壁上让大家观摩。每天设6堂课，早晨两节，早饭后4节，每堂为50分钟。考试制度规定：每月有月考，学期终了进行期考；期考成绩分甲、乙、丙、丁4等；80分以上为甲，70分以上为乙，60分以上为丙，不足60分为丁。用毛笔书写“榜示”，张贴公布于校门外。甲等第一者享有荣誉和奖励。因榜中每班写完以红笔勾勒，故最末一名被讥笑为“坐红椅子”。

学校在管理方面依然沿袭私塾学规，以打戒尺、罚跪为主。中午大休息喝茶，由级长（甲班的学生）指挥到休息室坐好，中间设茶桌，校工用黑砂壶冲好茶水按次序饮用，而后由级长带回教室学习。

由于学校办得较正规，因而被县署命名为“峄县县立第二模范小学”。学校校牌由齐村秀才崔毓材书写，横悬于学校大门上方。此后，隐居在家的崔广沅为学校书写了校训：“勇敢诚实勤勉”，隶书横匾挂在二门之上。

学校只招收男生。1914年（民国三年）第一届单级小学甲班毕业，毕业生有蒋树棠、李成林等10余人，其中吴钦元、王柏山、张敬俊等当年考进了济宁第七中学。

1915年（民国四年），黄子臣、田毓沅两教师离校，另聘刘国基（字庆如、薄板泉人），王钟岐（齐村人）来校任教。崔毓相仍为校董，管理学校各项工作。教师聘用与否皆由校董决定。聘书于暑假期间交与受聘教师，任期一年。如教学成绩良好，可连续聘任。教师在教学上态度都很严肃，其中刘国基教师为最好，他虽有“刘阎王”之称，但由于学识渊博，教学认真，威信反倒很高，累计任教15年之久。

1921年（民国十年，学校由崔家盘任教长，吴仲乾、崔子丹等任管理员。他们将齐村天齐庙地卖掉一部分作为学校经费。

1922年夏，筹办高级班，因校舍不足，买东邻董家堂屋3间。高小班招生布告一出，慕名报考者480人，经考试，仅录取50人，编成一个高级班。齐村二街76岁老人王怀德是当时小学乙班学生，参加高级班考试竟中第三名，至今每提及此事仍津津乐道。学校又聘请了李敬如（德州人）等四人，担任高级班教师。课程增加了地理、历史、常识、英语4门。学校名称改为“峄县县立齐村两级小学”。

1924年（民国十三年），两级小学首届高级班毕业。当时教育界名流刘仲旭先生应聘来齐村任校长。刘校长多才多艺，音乐、书法都有较深造诣，但由于军阀

混战民无宁日，学校停办，刘校长才华未能发挥。

1928年春，军阀张宗昌被北伐军赶走，社会稍趋安定，农民协会会长王伯扬，地方绅士崔家榴倡议兴学，原校舍遭到破坏，难以利用，崔家榴便将自己的住宅3间堂屋让出来当教室，办起民众学校，由王伯扬任校长，吴仲乾、宋树溪、崔绍煜等人担任教师。入校学生近百名，编为两班：一、二年级合班，三年级为一个班。时值灾乱之后，疮痍未复，为减轻学生负担，校长教师均属义务，没有分文待遇。学校实行半日制教学，以利学生帮助家庭生产劳动。

1929年秋，学校迁回修理好的三教堂原校址，改为全日上课，学校由峄县教育局定名为“峄县县立二十二初级小学校”。校长王伯扬，聘刘仲旭、张捷三、朱道南、谢少白、胡九德等任教。崔福藩（字蘧庵，翰林崔广沅五子）任名誉校长。当时崔正在经营寨子煤窑，热心教育，答应每月供给学校银洋100元，煤炭1吨。他还时常到校看望，每次到校先对教师们一一慰问，然后进教室了解教学情况，看到认真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当场称赞，勉励。

是年，招生由专招男生改为男女生兼收。但仍按“男女7岁不同席”的封建陈规，采取男女生分校制度，东院为女校，聘请女教师于璧群管理女生。这种男女生分校制遭到了进步师生的反对。仅实行一学期，于第二年（1930年）春即合并一校，男女生混合编班，全校一至四年级各一班。一、二年级设国语、算术、图画、唱游（音乐体育结合课），三、四年级增加常识课。为

统一语音教学，国语教师教授一年级学生学习注音字母。

学校每逢星期一早晨举行纪念周活动，全校师生集合于校院，面对墙壁上悬挂的孙中山遗像，由校长领读《总理遗嘱》，然后静默3分钟。接着：校方领导作总结性或指导性的讲话，然后结束。

由于学校里进步、开明教师较多，社会上发生的事件极容易在校园里引起反响。1931年，日本侵略我东北三省，全国掀起反抗侵略的怒潮，齐村小学师生也是怒火满腔，在校外进行宣传，开展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朱道南老师就趁机讲述国民党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发动内战造成国弱民穷引来列强入侵的罪行；还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后实行五年计划的成就。因为有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遗教，做这些宣传并不违法，爱国主义教育在师生心中产生了革命思想的萌芽。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大批师生如张捷三、刘仲旭、谢少白、岳聘农、王磊、邱伯达、牛志远、张元智、彭启凤、阎玉朴、马凤扬、李廷斌等投入了党的怀抱，参加了革命工作。

朱道南老师革命经验丰富，学识渊博，待人热情，师生相处如磁石吸铁。尤其对贫穷学生爱护备至，郭村学生王磊家庭贫苦，与寡母相依为命，白天肩挑煤油、火柴沿街叫卖，晚上到民众小学求学，朱老师与校方协商让他在校半工半读。牛志远、阎玉林家庭贫穷，朱老师向校方建议予以豁免学费。王磊、牛志远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为使他们能继续深造，朱老师到处奔波，在社会上募捐助学。1937年，他俩兖州师范毕业。

1931年夏，齐村学校第一届初级小学毕业，毕业生有王磊、牛志远、黄兴仁等。毕业典礼十分隆重，地方官员，社会名流，学生家长济济一堂，还请来京剧戏班演出节目助兴。本届毕业生多数考入枣庄南庙小学（今实验一小前身）和田庄小学高级班继续求学。朱老师于此时调到峄县教育局任视导员。

1933年，刘仲旭二次来齐村小学任校长，张捷三任教务主任，张慧僧任训育主任，先后受聘教师有十余人。

1935年，齐村小学第二次设高级班。初级四年级毕业生，通过升学考试直接升入本校高级班。名誉校长崔蘧庵为高级班添置了全套课桌课凳，并修缮教室。此时刘仲旭调走，王伯扬任校长。1936年，第一届高小班毕业，毕业生有张元智等30余人。

1937年，农历八月十四日，日寇12架飞机轰炸枣庄。齐村完小师生群情激愤，当即组织宣传队、歌咏队到街头、集市控诉日寇侵略罪行。当年冬，日本侵略军进犯邹县，在两下店川军与之激战，隆隆炮声时有所闻。齐村已面临前线，为避免战火，群众开始逃难，学校随之解散。

1938年，齐村沦陷后，日寇为在文化上奴役中国人民，督促各乡成立小学。1940年，伪峄县县政府教育科派崔万峰、巨桂昌来齐村办学，学校设在东圩子崔家盘的住宅，以堂楼5间作教室，其中一间套间作办公室，校长崔万峰，首届学生分一、二年级，合班复式教学。翌年，崔、巨调走，学校由吴仲乾任校长，教师有崔绍燸等3人。一、二年级仍合班上课，三年级单班教学。

学生75人。所用课本为北京伪教育部编写的国语、算术、常识、修身等，并设体育、音乐、图画、劳作等课。

1942年，学校四个班，学生近百人，校舍不足用，遂将三教堂老校舍进行整修后迁回。仍由吴仲乾任校长，又增添褚庆榴等四名教师。

日寇在地方上搞强化治安，对学校也加强奴化教育，当时向齐村小学派进日语教师和军训教练，教日语的姓徐，东北人，他是日本人的翻译官；担任军训教练的姓李，叫学生称他李老师，他们都着日本服装。此二人上课虽然卖力，但效果不佳，学生经常借故请假，再不然当堂装病退出课堂。虽有多种体罚，也免不了学生变相罢课。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齐村镇建立民主政府，王寅生任镇长，王洪任指导员。民主政府决定筹备重建齐村小学。校长由王寅生镇长兼任，邵士钦任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镇政府拨出100元北海币作建校经费，开明士绅崔毓相自愿献出靠近学校的3间西房宅基约1亩，用以扩充学校操场，另又献银元100元以辅助办学。

原校舍经整修后即开学，招生200名，按程度分一至五年级各一班。教师有冯炳君、范树生等9人。镇长王寅生兼任政治教师。课程设有国语、算术、常识、地理、历史、自然、体育、音乐、图画等科。统一课本没有印刷出来，各科教材都是临时编选。教师都经过培训，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对事业负责，对学生民主。学校提倡自由平等，废除体罚。学生除了在校学习外，还

做些社会工作，配合校外儿童团、姊妹班进行站岗放哨，防奸防特，查路条等备战活动。

1946年4月，王若飞、叶挺等同志在黑茶山遇难。枣庄市政府召集全市人民开会悼念殉难烈士，齐村小学全体师生排成整齐队伍，前往枣庄南的空场地参加追悼大会。会场主席台正面悬挂着王若飞、叶挺、邓发、秦邦宪等烈士的画像，两旁是各机关、团体送的挽联和花圈。市党政领导人及各单位代表在追悼会上讲了话，许多学生回来后纷纷表决心，要继承烈士遗志，五年级学生、少年儿童大队长王钟岱，还报名参加了武装民兵。

1946年8月至9月，国民党军进攻鲁南，二十六师进驻枣庄。地方政府安排有组织的战略转移，齐村小学也随之疏散。

1948年11月，枣庄完全解放，枣庄行政办事处成立，齐村镇为所辖四镇之一。为了恢复学校，当时鲁中南五专署在峄城举办教师训练班，由乡师校长张捷三领导集训，齐村镇冯炳君、范树生、牛志远、吴云程等教师参加了学习。1949年2月，集训结束，上级指令冯炳君任齐村完小校长，范树生等为教师。为了尽快复课，齐村镇人民政府倪志刚镇长专门开了劝学会，动员家长尽快送子女入学。会后，报名学生一百多名，按程度编为三个班，一、二年级各一班，三、四年级合为复式班。因战火破坏，原校舍损坏严重，暂在原校路南丽昌酒店上课，当时称为南校。因在恢复初期，只开语文、算术两科，一个学期后，师生们又兴高采烈地迁回修葺一新的三教堂原校址。此后，学生增加，教学逐步正规化。

武璋创办峄阳中学始末

吴庆华

峄阳中学是峄县士绅武璋在农村创办的一所私立中学。也是枣庄地区的第一所中学。这所学校虽然只办了一年多，但它诞生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战鼓声中，为黄埔军校输送了一批颇有作为的人才，在枣庄市教育史上开拓了地方办学的先河。

创办人武璋原是政坛上的活跃人物，为什么要在这风云突变的时刻热心办教育？学校的寿命又为什么如此短暂？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通过查阅档案，寻访武氏后裔及其知情人，获得了一些资料，试综述如下。

一 武璋生世及其办学背景

武璋，原名学璋，字明斋。1886年出生于峄县城西北10里的山阴村（今属市中区）的一个土财主家庭。家有土地13顷。兄弟三人，武璋排行居长。父母很重礼教，望子成龙，专聘了塾师课子。武璋读了不少年书，由于正值清政府“废科举，兴学校”，虽无缘中举，却于1910年考上了山东政法大学。

武璋毕业时，已是民国更元。“洋学”毕业，在民国时期却是比举人吃香得多，因而获得了跻身于峄县名

流的资格，受到了峄县士绅的青睐。不久，便当选为山东省议会议员，往来于济南、枣庄之间，名噪一时。

1922年，山东省议会改选，峄县的四席代表是刘少彭、王惠甫、黄保忱、金绪英。武璋落选。刘少彭当选，对武璋刺激很大。因为刘少彭是武璋的同学，但家道贫寒，时称“穷书派”。“穷书派”得势后，经过一番争斗较量，夺取了原来为峄城士绅王宝同所掌握的峄县高等小学校长的职位。于是形成了新旧两派势力的大争斗。武璋是旧派势力的急先锋。教师分成两派，学生自然也形成两派，相互指责攻击。由此引发的峄县高小学潮延续一年之久。这场风波一直闹到刘少彭挨打，省议会出面干预，控告全峄县士绅为“刑事犯”，旧派士绅不得不向刘少彭道歉，方才平息。从此，武璋一蹶不振，官场失意，只好赋闲在家。

1925年，南方国民革命热潮高涨，峄县虽仍属军阀统治，也摆出一些改革姿态，如：破除迷信，反对封建；剪发放足，解放妇女等。受过新思想教育的武璋闻风而动。他向峄县县长辛葆鼎建议：以山阴附近寺庙财产为基金，创办峄县第一所中学。对此，当时社会舆论褒贬不一，有的说他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趁机抓峄县的教育权；也有的说他为了培养亲信，发展势力。由于峄县教育落后，学生要跑到济南、徐州去上中学，当地办中学，方便就读，群众十分拥护，同时，北洋政府也鼓励地方办学。所以武璋的主张受到了辛葆鼎的赞赏，于是着他筹办。

二　武璋办学经过

武璋以个人的名义办学，困难实在不少。

首先是没收庙产问题。山阴村附近庙宇不少：庄东有关帝庙、泰山奶奶庙和天齐庙；庄西有尼姑庙；东北有湖山寺，十里泉也有庙。四处庙地共4顷63亩。要没收这些庙产，谈何容易？因为这些寺庙是与峄县的封建势力紧密联系着的。武璋拿庙产去办学，势必触犯以王宝同为首的峄县旧派人物的利益，因此，全县士绅一片反对声。支持武璋办学的只有韩庄的褚庆兰，田庄的田培坤以及县城和邹坞的商界。虽然如此，由于县支持，没收庙产办学终成事实。

其次是校舍的修建。东山阴有三座庙宇连在一起，武璋便以此为基础，修建校舍。四周拉起了土围子，把三座庙圈在一起，作为教室和办公室。另外建造了3间正屋、4个岗楼和3间学生宿舍。盖屋的木料是从武家山林砍来的。其他费用，全靠武璋四处筹集。

其三是聘任教员：学校聘有专任教师4人，两名是本庄教师叫武学礼、刘汉英。都是秀才，教国文。还有两名是从外地请来的，教英语和数学。

其四是学生来源：学生都是保送来的。支持武璋办学的韩庄、邹坞、田庄3处的学生最多，县城次之，齐村和台儿庄极少。共收了六七十学生。他们中贫寒的居多，有的高小还没读过，由于古文底子厚，也被保送来了。根据文化程度，学生分成两个班。当时峄县土匪猖

獗，为了防止学生被绑架，辛葆鼎特地派了县警备队的一个班，驻在学校的岗楼里。

1926年春，学校开学，辛葆鼎送来了亲自题写的“峄阳中学”校匾。峄县旧时的最高学府是峄阳书院，后来改办成县立高等小学。现在辛县长把“峄阳”之名送给山阴的中学，也就承认这座学校是峄县的最高学府。为此，武璋很是得意。

武璋在名义上担任校长，实际上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由王子清和吴玉英二人负责。课程有国文、数学、英语和文体等科。校纪严格，平时学生都要集体活动，不准私出校门。星期天上峄城、枣庄赶集，也要结伴同行，且有警备队员随从。教员功底厚，教学很认真，各科考试都很严格，学生学习紧张，晚上都要上“灯课”。

武璋平时也教课，培养后代，不拘一格。其本家侄子武德山只上过私塾，想上中学，又怕进不去。曾两次以请修改习作为名，写信给武璋。武璋回信说：

两次来意殷殷，余嘉汝有向学之诚。

见近作已能顺理成章。吾老矣，不禁期之后生。因命二题《以侪身而济世乎》、《禹稷、颜孟异地而皆然》。

武德山交上了这两篇命题作文后，便被录取了。

武璋还教育学生敢于冲击封建的陈规陋俗。齐村的学生范锦堂丧父，武璋为他主持丧礼，不按旧俗，行的是新礼。翰林崔广沅对此十分反感，说：“赋头武璋，范家出殓，胡乱主张”。讥讽他作为“文化班头”实在胡闹。

武璋很崇拜康有为，称其为“康圣人”。还说：“康的字写得很好，是其祖母教的”。武璋的字也很好。他曾给武德山写过一幅中堂：

古蓊山边古钓矶，沙鸥与我共霞辉。
目前虽有小德善，天下岂无公是非。
沧海横流何日定，古人复起与谁归？
扁舟醉倒君奚憾，岂失风尘一布衣！

落款：山阴农夫

这显然是一首他政治失意时写的述怀诗。虽然他对眼前“沧海横流”的社会不满，但他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国民革命的胜利上，而是把希望寄托于“古人复起”，孔孟再世。这就是为什么武璋以“禹稷、颜孟异地而皆然”为考核学生的命题作文的原因。由于复古主义作怪，他提倡学生写文言文而抵制白话文，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逆流。他并没有诚心在山阴办学，一旦时来运转，他就要从“古钓矶”上跳起来，到政治舞台上表演一番的。

三　峄阳中学停办

1926年7月，北伐战争拉开序幕，武璋的活动舞台也由教育转向政治。他经常到济南跟国民党在山东的元老拉关系，而对学校的经济问题抱消极态度。

原来，峄阳中学的开支光靠山阴的几百亩庙地是维持不了的。武璋曾说过大话，要把各地的庙产都拿来作教育经费，但他不敢也没力量这么做。因为各地的庙宇

都掌握在有头有脸的经营人手中，想拿谁的，就要得罪谁，结果事没办成，反而结了仇。就是山阴的几处庙产，他也拿得不安生。山阴庙里的和尚，在崔翰林的怂恿下，状纸满天飞，省里、县里都有。还有人扬言要买通歹徒，暗杀武璋。这年秋，又招了一个班，学生达百人，教师加警卫二十来人，困难更大了。

然而，这时武璋已经不上学校，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在北伐战争中大捞一把。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他与抱犊崮土匪拉上了关系。1927年初春，国民党派要员陈干到枣庄，与武璋一起受命，把抱犊崮的土匪武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九师，武璋任付师长。3月，北伐军贺耀祖部打败奉军孙百万，进驻枣庄。武璋收编的第九师赵有容旅进驻峄城县政府。这就是尽人皆知的“土匪坐大堂”。5月，宁汉分裂，蒋介石叛变革命，北伐军撤围。于是武璋带着暂编第九师南下。临行时，峄县地主被抓去不少，其政敌刘少彭父子也被裹胁而去。同时，峄阳中学的部分学生也被编入军队，随校长南下。不久，这支杂七杂八的部队在窑湾被奉军打得落花流水，至此，峄县中学也就彻底注销。

四 结 语

武璋创办的峄阳中学，由于旧式士绅反对，经费严重不足，更兼武璋在战争年代办学，“醉翁之意不在酒”，故只有年余的寿命。然而武璋敢于在逆境中办学，培养人才，说明他还是有远见的。在峄阳中学困难

之际，武璋凭着与国民党的良好关系，先后介绍二十多名学生投奔黄埔军校，说明他爱惜人才。学生中著名者如高魁元、刘安琪后来都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又如邵子珍（山前人）曾任过我县委书记。但是，武璋的爱徒，多数是右派人物，如武儒（字洪轩）系戴笠手下的特务，其子武挺秀系“剿共”大队司令。这也是跟武璋本人改良复古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

五　峄阳中学的余波

峄阳中学停办之后，校舍未受破坏。北伐战争胜利后，原峄阳中学的管理人员王子清、刘汉英、武学礼3人又在这里办起了峄县第二模范小学。但是庙地仍在武璋手里。王子清和刘汉英要求武璋把庙地拿出来作为校产，武璋不愿意，理由是当年办中学，武家赔进了许多财物。双方打了两年官司，一直相持不下。1930年，国民党推行义务教育，武璋出了个新点子：腾出自己的堂屋，办了一处女子小学。这在当时农村，也是惊人之举。教师由他的女儿武琴声担任，学生是本庄的十来名家庭妇女。就这样，把王子清他们的嘴堵住了，官司不了了之。这所女子学校取名叫“明德”。意在宣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儒家思想。后来，这所学校也没办多久就解散了。

漫话“洋街”

吕之文

枣庄窑市

今日枣庄市区，在18世纪就是一片窑场，“炭窑时有增置”（《峄县志》）。清朝乾隆年间峄县教谕傅尔德描写：“巨垣拖拽轻轮开，石根吼动烧劫灰”；“官棚歌呼振地动，北客牵车万牛送”。

1903年张莲芬莅任矿务，引进欧洲采矿体制，成立中兴煤矿公司，并“呈请当道，严定矿界。百里内不得用西法治窑，十里内不得用土法治窑。”（《峄县志》）小窑停业，窑户尽投奔大窑。公司人数与日俱增。

饮食业与矿业同步发展。原有的几家卖汤水的粥缸和丸子锅已供不应求。下窑卖力气的人饮食不求精细，只需快便充饥，牛肉汤锅出现。店家所备皆是泥制陶盆，食客可以按需随添汤水。当时称改善伙食为“小泥盆，大窑黑，牛肉汤泡高粱煎饼”。此后，饮食花色品种逐渐繁多，以至发展到“小鸡儿小鱼儿，鸭蛋粉皮儿；拍黄瓜，拌豆虫，炸蚂蚱”。

服务性的摊点应运而生。从大筐、苘绳、铁锹、洋镐，到鞋帽摊、土布挑、针头线脑的货郎挑，发展为估衣市、杂货行、广货行。铁匠、木匠、皮匠相继出现。

剃头的，掌鞋的、缝穷的也都有了。工人开资有定时，这里做生意的经营方式皆以赊为主。他们绝大多数没文化，但有一套自己特殊的记帐方式。有的在秫秸莛子上用指甲盖掐个记号，月头结帐，谁赊的，赊多少，一清二楚。大的买卖人多与包工柜来往，凭条子，凭折子到年终结算。无论大小生意人都本着这样一条原则："喝四两酒，饶上个咸青皮（鸭蛋）"。

伴随着窑户的增多，五花八门的营业相继在枣庄的窑场出现。

赌场、宝棚。其中有压黑红、对神像、掷骰子、带牌九、抽竹签、打彩等等。人们称爱赌博的是"借钱贩蚂蚱——想飞利"。十个赌，九个输，输了净光只好押裤子。于是，枣庄窑场又出现了典当铺和放高利贷的钱庄、钱店。文娱活动少，除了拉地台唱拉魂腔的，就是唱大鼓、说"武老二"的。围观的多，掏钱的少。

窑户们是天天"点卯"的临时工，朝不保夕，最怕出事，大祸随它去，小病小灾得忍受。因此，在窑场上卖血鳝膏的，卖狗皮膏的，卖大力丸、跌打丸的，买止血散的每见于市。这些东西是否顶事，只有用过的人知道。窑场上"流"字行很普遍，有算八卦的，有演说奇门遁甲的，有六爻，有马前神课，有测字、圆梦的，有相面的，有看手纹的，有看图论关煞的。矿井安全没有保障，窑户们最关心自己的命运，所以"流"字行的生意并不冷落。

窑市上还没有"半掩门子"（娼妓）。

自然，窑场更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除了粮食、禽

蛋、肉类、柴禾和编筐的黑条外，大宗的是蔬菜，应时的是山果。

随着“商贾辐辏”，市场逐渐扩大，开始有了名称——南门桥头。枣庄窑过去有“四大桥头”市场，这里最早、最热闹。南门，即今枣庄矿门。当时是中兴公司大门，与后来在西边开辟的南门（现矿务局门）相比而称。新辟门称西南门（即西边的南门）。桥头，是指今剧院北边一带。那里原有一道排水沟，沟上有座小桥。倚桥设市，这也是个有趣的现象。

矿业起，百业兴。枣庄成了一块丰腴宝地。有人垂涎三尺，有人虎视眈眈。

枣庄北面山连山，山套山，自古为强人出没之处。老百姓称抢掠财物，劫人作“肉票”（人质）、讹人钱财的称为“马子”。马子进家，明抢明拿；进门不空手，就是半刀草纸，一条裹脚布也不剩下。

民国七年（1918年）中秋节前，枣庄大小商户无不赶节令紧张忙碌。半个多月辛苦下来，算算都挣了几个。就在八月十五后半夜，突然出现了马子！盘踞山里的大小杆子联手行动，乌合上千之众在枣庄窑场抢、杀、奸、焚达两日之久！

窑市，一片凄凉。

“洋街”之灾

1918年冬天，中兴公司出资、动工在南门前建造一座十字街商埠，南北街与中兴公司的南门贯通。次年秋

天建成。中兴公司以租赁方式招揽包工柜及工商各界进街经营。

这座十字街商埠，第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四个街上只有三座大门，唯独没有北门。中兴公司是否将商埠设想为自己的“服务部”而不置门设卡呢？不敢妄说。再一个特别之处，十字街南与北，东与西并不对称：东门内每旁20间门面；西门内每旁28间门面；南门内每旁8间门面。北段除每旁30间门面，两边约取其中各设住宅大院门。两院中虽然居住的多是包工把头、公司职员、商户家眷等，由于设在商埠内，仍被称为“商团”，路东为“东商团”，路西为“西商团”。商埠建筑，一律青砖青瓦。商户进街后，公司派出巡警日夜巡逻。

商埠建成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统一的名称。时间一长，民间就有“东门里大街”、“西门里大街”、“东商团”、“西商团”等六、七个称呼。有的把此街比作济南二大马路，也有的夸如上海四马路。都不是正式街名。后由公司联络地方商董、士绅，经过一番切磋琢磨，把东西街定名为“兴商街”，南北街定名为“中新街”。枣庄窑自此有了带街的地名。由于十字街从建设到使用、管理是个统一体，居民对两个街名并不是严格地各兴各叫，而是根据商业特色十分浓的现代建筑风格，干脆把这种没有见过的新鲜街区笼统称为“洋街”。街门外的人称此街为“洋街里”，后来根据街道格局的变化，把此街叫做“大洋街”，把从南门向南由私人相继建造延伸的街称为“小洋街”。

民国十二年（1923年），“临城大劫案”发生后，

枣庄窑空前热闹起来。招摇过市的有穿马褂的，穿西装的，穿军服的；有拿扇子的，挎刀的；有坐洋车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洋街”上的生意人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不久，马子受了招安，开进了枣庄，少部分扎进了“洋街”。他们的身上装着赏钱，不明抢了，只是变成了硬讹——多要东西少给钱。

有一天，没到响午，枣庄窑象滚开的锅，各处打枪。人们听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孙美瑶在中兴公司东大楼被枪决了！得信逃窜的马子们在“洋街”上一边抢东西，一边杀开血路狼奔豕突。他们的身后是穷追不舍的官兵。枣庄窑的商户们，这一次虽然不同程度地遭受了些损失，但比起五年前八月节那次劫难，还算是有惊无险。

此后不几年，“洋街”又受到了一次火的洗礼。

起火的具体时间、地点、因由众口不一。当时从东商团以南至南门，路东是一片火海。虽然有东风劲助火势，但街西竟然无恙！受灾人家各自抢救物品，拿不出的皆成灰烬，拿出放在街心的又不翼而飞。真是名符其实的“趁火打劫”！

因为房产是中兴公司的，事后，公司又出资重新修整。原建街时用的土制青砖瓦，火后重建所用皆是机制红砖瓦。形成路东、路西红、青二色。有人说这红、青两色代表枣庄的“红帮”和“青帮”。实是无稽之谈。

沦陷时期

日本侵略军占领枣庄以前，“洋街”上除了九家包

工柜，主要是商业。行业中，有百货、绸缎、土布、成衣、五金、杂货、手饰、钟表、文具、印刷、照像、烟草、陶瓷、中药、西药、茶叶、饮食、副食、南味、货栈、染坊等20多类，约60家商户。经商者主要是本省、本县人，其他商人来自粤、苏、皖、平（北京）、冀、晋六个省市。

1938年日本鬼子的先头部队骑着大洋马冲进了中新街，接着铁甲车、炮车呼呼隆隆穿街而过。这自然是示威。于是街上出现了膏药旗，“八格牙喽”的声音此伏彼起。在“洋街”内，日本人设立了西本愿寺、领事馆、顾问团、宪兵队、居留会、军妓院、歌伎院、日语班（后并入北井训练所）。还设置了银行、汽车站、电话局、邮便（日本民间通信机构）、配给所（与中兴公司的配给处不是一码事）、三菱、三井、红××等。另有洗衣、写真（照像）、时计（钟表）、理发（男女各一）、百货、建筑、医院、台球、茶点、鱼类、料理等。

日军联队司令部强占了中兴中学。又在薛庄以西建造了兵营。

鬼子到，汉奸冒，“一块白云日当午，五色彩条随风飘”。汉奸组织三会两班相继在“洋街”插标现世。商会也配备了武装保卫。

这时，实行了新的行政区划。中新街被划为“峄县二区枣庄镇第一保”，成立了保公所。日本人在邮便上写为“东洋町”。保公所的办公开销，商会的保卫开支，都由商家供奉。

日寇为了实现他们的“武运长久”，对中国人采取逐步奴化的策略。同时辅之以“强化治安”。最初，对华人商户限制凭“许可证”进销货；后来再次“强化”，有“许可证”也不能自行进销货了，只能从日人手中进货。这样，既封锁了华人商户的行动，又垄断了地方经济。与此同时，他们尤其害怕东部地区的抗日活动，为防备“八路的干活”，关闭了“洋街”东门。西门和南门都由二鬼子（皇协军）把门。时称“二鬼把门”。当时的联合票子天天贬值，“孔夫子坐天坛，五百块钱当一元”。生意难做，民族商业凋敝萧条。

胜利之后

1945年9月，日寇宣布投降。原先在街上大摇大摆的真鬼子（日本人）、假鬼子（朝鲜人）都无影无踪了。这时，“洋街”上挂出了牌子：“枣庄商界欢迎国军筹备处”，简称“欢筹”。不几天，由东路开进枣庄一支人马，自称“抗日救国忠勇义军”，头子就是王继美！一进枣庄就扎进了中兴学校。后来各界人士听到国民党将这支队伍收编为“山东挺进军三十二纵队”，成了“国军”，又挂出了一个牌子：“枣庄商界慰劳国军筹备处”，简称“劳筹”。商人们经过奴役七年本来就一筹莫展了，怎能经得起“两筹”搜刮？

接着，国民党县党部、县公署挂出了牌子；区公所、镇公所也挤进来安了窝。王继美的三十二纵队也插进来安设了政治部。专员公署的牌子挂在原先日本宪兵

队的门口。商人们说："走了杀人阎王，来了劫财大王！"

为了捞钱，专员公署出牒，"两筹"出面，首先拿商户开刀。先是以收商会会费的办法刮油。不过收法很特别：寅吃卯粮"预收"。先是预收5年的，又预收10年的，再后20年的，最后达到预收50年的商会会费！令人哭笑不得。再一办法是敲诈勒索。他们说，枣庄的商户在沦陷期没离开当地，就是没有参加抗战；没参加抗战又做生意就是发了国难财；发国难财就是汉奸，是奸商。要把发了7年的国难财吐出来！办法就是按资金抽。还公布了一个"惠政法"：商户有钱的交钱，没钱交金银首饰也可，商品货物也行！

这一来，摇头晃脑进枣庄自称"劳苦功高"的人们阔气了，男的领了饷，换了装；女的一身花，个个油头粉面。专员公署衙内上下一身崭新黑衣帽。有了钱就有了花天酒地：夜晚有"大脚班"、"千金班"、"贤内班"串衙门唱曲陪宿；白天是大席小宴"朱门酒肉臭"。有一次王继美的一个支队长路过东门里大街，看到楼上有女眷招待男客，为此犯了醋意，就举枪朝天打了一梭子子弹发疯。

又过了几天，专署的门上添了一块招牌："枣庄各界联合勘乱指挥部"。牌子一挂上，马上伸手"暂借""勘乱经费"，按人计算，（老百姓称为是"人头费"）名义"欢迎自动捐献"，其实谁拿慢了就给谁戴"通匪"的帽子。紧接着下令修"防共壕"：从中兴公司东北角的电光楼，到枣庄镇东南角的天主教堂（今市

房管局一带），往西到老车站（今君山路铁道道口一带），挖掘宽、深丈余的大沟。

枣庄地层是黄粘土，土里饱含砂石礓。石礓小如鸡蛋，大如石碓，称为马蹄石。时值初冬，有钱的买命，无钱的挣命。形容枯槁的枣庄百姓在饥寒交迫中四个人都抬不起一块马蹄石！但是稍一怠慢身后就有当兵的拿枪托捣，当官的扬鞭子抽。为这道沟，出资万两，丢命百条，几百人身上留伤残。至今枣庄老户人家六十岁以上的人还谈沟色变！

“洋街”上50多家商号，自“两筹”募捐起，到“两壕”挖开，不过30天，十店九闭。

首次解放

1946年1月9日，晚10点多钟的时侯，由枣庄镇东边响起了枪声，十分激烈。这枪声并没引起街民们的注意。自从王继美的“忠勇义军”一脚踏进枣庄时起，百十天中经常发生因分赃不均、抢夺地盘开枪动刀子的事。处处有乱子，时时有枪声。大家对枪声已经习以为常了。

1月10日，白天大街上兵来马去，街民也看惯了，谁也不打听怎么回事。入夜，枪声大作，只听到街上兵哗马嘶。人们心神不定，一整夜未合眼。

1月11日，黎明，王继美32纵队的95、96支队和各路杂牌象涨潮一般涌进街里。居民们从乱成一窝蜂的士兵嘴里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八路军来啦！”大家

不知是福，还是祸。天傍黑，枪声、炮声、爆炸声混成一团，天空银蛇乱窜，火星乱迸；弹头呼啸声刺耳，就象在头上飞过。

1月12日，五更天。街上的兵象退潮似的朝中兴公司里涌：县太爷抱着印领头进去了；专署命令教练营守街，也都一股脑地进去了；有的街民胆颤心惊地耿着儿女、拎着包袱也随着进去了！中兴公司的围墙好象能够救苦救难！

下午，教练营的大批教官们带着兵沿街串户，扬言："找点吃的，借件衣裳夜里好打仗！"一边说，一边动手，连床席都揭着，临走撂下一句话："这是战借！"

夜12点，街民们听到东南方向"轰"地一声巨响，接着听到一阵军号声音。后来知道八路军炸开了大洋街东门南边的墙角，发动了进攻。

1月13日，天亮。街民从门缝里看到来去匆匆的军人，都穿着灰色军装。这是些没见过的队伍。有好奇的打开门，开腔打招呼，一听，都是蛮子兵。讲了好多遍才搞懂"我们是新四军"！不过，街民受了多年的反共宣传，打定主意：莫谈国事！回避，不接触，小心为妙。

1月14日，上午，大约八九点钟，从西边上空飞来飞机，撒下传单。传单上说开始停战谈判了。不大会儿，街上来了一队军人，身穿黄军服，胳膊上戴着"纠察队"字样的袖章。有几位路过居民门前还分别和主人打招呼："我是×××"。主人感到惊奇："原来是

你？你也成了共……”下音的“匪”字不好意思说出来。当兵的介绍：“我们是公安局，他是×长，那是××长。看望你们来的”。渐渐地，街民们有了笑容，打开了话匣子。

1月15日，新四军驻街×部，接待从矿里来的十九集团军、专署代表。和谈即将进行。

1月16日，上午，街上贴出了山东省枣庄特别市政府的布告和新四军七旅的命令。下午，新四军和地方干部在街里分片召开座谈会，宣传时事和政策。街民们感到新奇地是，第一次见到女军人。不过，当干部讲到保护工商业时，大家有点伤心：现在各店都是架空柜净，只能卖估料啦，还有什么可保护的？

1946年3月，新四军按停战协定撤出。以后从徐州又有汽车开来枣庄，送粮来，载人走。也分不清那方，都是穿街而过。

1946年6月9日，王继美踞守的枣庄中兴公司在一声爆炸中被解放了。枣庄全部解放！半年中“洋街”简直就是楚河汉界！又好象是个中立区，国共双方在此接触。

彻底解放

1947年1月，解放军进了枣庄，这是第二次解放。不知什么原因，解放军又很快撤走了。以后的日子，就是俗说的“拉锯”年月：国共双方你进我出究竟有几次，恐怕一时难以统计准、算得清。在此期间，商业区

的“洋街”变成了住宅区。有营业能力的剩余20家左右，多数靠肩挑、车推赶四集。坐商变成了行商。街民纷纷外出逃难，住户有减无增。

1948年夏末，伪政府的“镇公所”招牌也找不到了。每天太阳升老高时，就有人领着几个横担着步枪、敞怀坦腹的“还乡团”团丁，从街上走一趟，齐几个钱。太阳刚偏西，就赶紧往马宅子溜。马宅子驻扎着国民党五十九师的一个连部。过了中秋节以后，大概到了阴历九月底，再也见不到他们进街派捐收税了。滚蛋了！

一天，“洋街”上进来了我一支名为胶东子弟兵团的队伍，多数是女青年，搞通讯工作的。不久，她们调防南下了。此后，我公安局正式进街办公。从此，枣庄结束了兵荒马乱的岁月，开始了新的制度，新的生活。

1951年10月，“洋街”被正式命名为“中新内街”（“小洋街”名为“中新外街”）成立了“中新内街街政委员会”，隶属峄县第十区区公所领导。

由于地理位置居中以及在经济、政治生活中的核心作用，“中新街”渐为“中心街”代替。至于“洋街”已变成历史名词了。

枣庄第一家回民餐馆万福楼

马 金 兰

提起“万福楼”这个老字号，枣庄的老人们无人不知。

万福楼原座落在中新街南门口路东，是一座东西向上下两层共6间的青砖瓦小楼。门面正中写着三个红色大字：“万福楼”，十分醒目。门旁还挑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立式招牌，上面写着：“清真教门万福楼饭店”，披挂着一块红绸子，随风飘扬，好像招呼八方来客。

我父亲马继元是万福楼的创业人。宣统元年（1909年），他十四、五岁，因家境贫寒随同村人由泰安两界村来枣庄窑谋求生路。来枣庄本想下窑挣口饭吃，只因身单力薄，管窑的不要，只好投奔一家同乡开的回民包子铺。这家包子铺主人姓朱，也是泰安人，家在南驿，与两界村相距不远。朱家夫妇念我父亲年小，就说：“天下回回一家人，留在这里干点零活吧”。从此，父亲就在朱家包子铺当了伙计。

朱家包子铺所处位置是窑场通衢，加上经营中注重简便温饱，因而生意比较红火。当时除经营水煎包外，还烧糁，这样有吃有喝，上下班的窑户（矿工）感到就餐方便。我父亲在朱家包子铺每天天不明就起来剁馅子。先剁一大盆牛肉，再剁一大盆萝卜、葱。之后，就

是挑水烧糁锅看包子锅。这样一来二去，学会了烧糁、打煎包的手艺。日久天长也能独挡一面了。

大约在1916年，朱家夫妇因年迈，想回家置田治业，安度晚年。他看我父亲老实勤快，就把包子棚和家伙劳什作价给了他。临走留了句话："老二，好好干！"就走了。朱家走后，父亲陆续把我大爷、大娘和爷爷、奶奶接来枣庄，齐手劳作，应酬门市。自此，窑面上的人称呼我父亲为"马二掌柜的"。

随着中兴煤矿公司的发展，不仅来枣庄下煤窑的、买煤运煤的大量增加，就是做小买卖的，靠手艺吃饭的，以各种方式"混穷"谋生的也把枣庄当成了富贵地，八方云集。"民以食为天"，我父亲的生意随着也兴隆起来。有了积蓄，就想扩大经营。在1920年，父亲把包子棚拆了，就地盖了几间草屋，开了个连家铺子。一家老小起五更睡半夜地操持着这个水市买卖。这时，人称"马家包子铺"。

马家包子铺制作的牛肉煎包，特点是馅多、皮薄、灌汤。当时很受欢迎。烧糁用肉全是鸡丝，不掺牛肉丝。由于货真价实，早晨营业总是应接不暇。我父亲为人厚道，很讲究"和气生财"那套理论，热情好客。他经营上灵活：有钱的现金，没钱的赊帐。特别是窑户们十天半月开一回资，不开资时手里没有钱，照样记帐吃饭。我父亲不识字，也没有记帐先生，就把秫秸棒劈开，用拇指甲在秫秸穰上掐指甲印，由吃饭的自己保管。什么时侯开了钱，就拿着秫秸棒找掌柜的结帐，凭指甲印给钱。为此，我父亲结交了好多朋友和煤矿工友。后

来，有些在外地工作、干工的老人们逢探家时，有机会总要看望我父亲。搞赤色工会的张福林同志就是一个。

随着生意红火，积蓄增加，一些回民乡老、士绅和亲邻就劝我父亲开个饭店。父亲治业的心劲很高，也感到枣庄回民人数众多，应该有个回族自己的饭店。于是求亲告友，东拚西凑把草屋翻盖成小楼。一应陈设、器皿、家什除了自己购置，还有一些是街坊邻居凑钱置办了资助的。与此同时，从兖州专门请来两位厨师，灶上的是张师傅，他还带来一个弟弟跑堂服务；另一位是陈师傅，在案上。下余的活计都由自家配合着去做。

大约在民国十年（1922年）秋，万福楼开业。记得那天不光放鞭炮，还请来了各方人士。有的带着贺匾，上边写着字号和掌柜人的名字。熙熙攘攘，很热闹。从此，万福楼不仅成了回民往来交流的场所，也成了汉民品尝异族风味的食堂。

万福楼开业之后，在经营上仍坚持薄利多销、服务大众的老宗旨。在楼下直接服务于大众的“快餐”中，除传统的水煎包外，又增添了蒸包和水饺。蒸包分发面、烫面两种。包子馅又分牛肉馅、羊肉馅、素馅和三鲜馅。另外还经营面条，有清汤面、牛肉面、鸡丝面、杂酱面、虾仁面、麻汁面等。过往散客，不论穿戴一律热情接待。一菜一汤都讲究实惠，让顾客有兴而来，满意而归。

楼上主要是包办酒席。鲁南地区一般宴席就是“十大碗”：用碗盛菜，十碗菜是一席。“十大碗”的菜肴，无论回民席或汉民席都没有固定的规格，皆根据经

济条件而定。使用器皿多是景德镇出产的细瓷花碗，喜事常用红花的，白事多用素花的。万福楼的“十大碗”，通常是红炖牛肉，清蒸鸡，海米烧茄子，瓦块鱼，清炖羊肉，四喜丸子，八宝饭，油炸山药，油炸地蛋，油炸金针菜等。先分装盛于扣碗（齐村烧制的一种小黑碗），上笼蒸熟后扣入汤碗，浇上高汤，撒上蒜苗或芫荽上席。绝不用白菜帮垫碗底来显示丰满。

平时说的“两大件”席，是指席上有两道主要的菜。万福楼制作猴头、燕窝、鱿鱼、海参、鱼肚、鱼翅等山珍海味这些“大件”，有自己的一套烹调方法，讲究鲜美。但由于社会购买力低，用这些“大件”的人多是达官显贵，用量稀少。一般宴请能用整鸡、整鱼“两大件”席就显示规格很高了。因此，万福楼在对鸡、鱼的加工烹调上并不因为用料平常而草率行事。比如糖醋鱼，这是大件中烹调过程比较简单的菜。选取斤半重的鲜鲤鱼为主料（枣庄有句歇后语：“斤半鲤鱼——巧个儿”），破膛去鳞稍加刀工后，先用温油炸熟，再用热油炸酥，然后浇上用油、糖、醋、蒜泥熬好的糖醋汁。食用时口感是外焦内嫩，甜里带酸，酥软可口。

万福楼的席面，讲求色、香、味、实。让被请的客人感到主人的盛情，也让主人感到光彩。这是替顾客着想，决不让顾客感到吃得窝囊，花得冤枉。

越是顾客常点的菜，万福楼的厨师在操作上越严格，因为稍一不慎就会失去顾客的信任。比如炒牛肉丝，出锅后满盘的牛肉丝油光光的呈酱红色，青蒜苔（或芹菜）、白笋丝、红辣椒作为配料，鲜艳丰满，香辣

可口。无论动几锅，炒多少盘，火侯和配料都不马虎。再如干炸里脊，出锅装盘上桌时，必另备一碟葱段甜酱，配合食用，鲜美爽口，回味无穷。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枣庄，老百姓都朝四外乡“逃反”（避难）。生意停了，我们也随邻居们一道往北部山区躲避，当时到了崔庄、葫芦套。以后又回来在南马道东门外天主教堂的席棚子里栖身。直到我父亲开了业我们才大着胆回家。

在枣庄沦陷的日子里，万福楼的生意十分难做。最难应酬的是二鬼子（伪军）和不明身份的便衣（穿普通衣服而又有政治背景的人）。他们吃饱喝足，抹了抹嘴说了声“记在帐上”，或说“记在×××帐上”就扬长而去。还有的吃喝完了，逮个苍蝇扔在碗里，说“不卫生”，我父亲就得低声下气陪小心，不收钱还得听他们骂。王继美兵进枣庄后，他把商界当作摇钱树，今天要军装，明天要白面儿（海洛英）；不是商会送来条子，就是保长派捐通知。字号越响派捐越多。不管什么名目，都是折成钱按数送过去。家底再厚也不撑这样折腾。万福楼很快就感到资金短缺。别无良法，只有向住在中新街东商团的“高丽棒子”借印子钱。“高丽棒子”是枣庄老百姓对朝鲜人的称呼，朝鲜当时叫韩国。借了印子钱，每晚要向上门讨债的人交利息，一天不还利息第二天就利上加利。到期不还本息，驴打滚的高利贷就永远还不清。那时侯我们姊妹年龄小，只想过年，因为过年时停业，就听不到谩骂吵嚷，看不见凶脸恶相了。

由于枣庄是个回族聚居地区，牛羊宰牲量大，因而

吸引了天津、济宁等地的皮货商。他们长期落脚枣庄，坐收牛羊皮。为了支撑饭店，我父亲决定把我们住的后院两间房腾出来，改成客房，我们娘几个搬到三合庄金家场赁了两间西屋住。这样，万福楼的门首又添了一块招牌："万福楼客栈"。既住宿，又包饭，方便了过往行商。

就是这样前饭店、后客栈的经营，也挽不回困难局面。1942年，我父亲辞掉了厨师，让本家的两个叔伯兄弟马继才、马继存当帮手，同时又把一度停了的糁锅烧了起来。

日本投降后，枣庄成为兵家争夺之地。中兴公司停产，煤矿工人失业，市面冷清，商业萧条停滞。为了养家糊口，我父亲继续做小本生意：打煎包让继存叔到小煤窑去卖。这样一直到枣庄彻底解放。

从"马家包子铺"到万福楼，一直是全家协力经营这个水市买卖。但是经营多年一没置了房子，二没置了地，就算赚了个热饭碗。因此，解放初期定阶级成份时，我父亲划为"小商贩"。1955年，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小商小贩进行合作联营。这一年，万福楼和苏家馍馍坊、吕家馍馍坊、打芝麻缸贴的赵家、卖丸子汤的沈家、烧辣汤的邵家在万福楼原址成立了合作饭店，起名为"回民饭店"。我父亲是负责人之一。为了保持菜蔬的清真风味，我父亲把马继存和一个叫成九的青年留在店里继续工作。

此后不久，回民饭店迁到小洋街（中新外街）南头路东的沈家菜馆去开。万福楼原址后来成了水产公司门

市部。

万福楼曾在枣庄的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许多口话。如："万福楼的包子，有名的。"常常有人开玩笑或打赌："输了，万福楼我请客！"老主顾一张口就是"上万福楼"。这些，恐怕与万福楼的菜肴佳美和服务热诚有很大关系。

三班六房

封建社会峄县衙门的各种公务由"三班六房"办理。

"三班"是指皂班、快班、捕班。负责衙门的公务差遣、公文传递和地方治安。

"六房"是指盐房、米房、漕房、粮房、仓房、礼房。各自的职责大体是：盐房负责盐专卖，缉查私盐；米房负责纳米，附收胭脂费；漕房负责治理、疏浚河道，管理境内船闸；粮房主要负责粮食征收，下"粮串"（纳粮通知单）催粮，兼管土地买卖、典当过拨和填发契约事宜；仓房主要负责粮食储存、保管；礼房除管赞礼、司仪、迎送宾客外，还负责处分犯错误的秀才和教授。

（孙业艺讲述）

孙美瑶集团函牍辑录

吴庆华　　批　注

孙美瑶武装集团自临城劫车之后，中外说客云集枣庄，口舌之外，互致文墨。孙氏集团所发函件和文告，有的已被京沪等大报作为专题新闻转载。这些文件均出于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之手。孙氏集团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如孙洪图、朱陶、侯大合、夏慕尧等。峄县著名的教师刘仲旭，当时也被绑架到抱犊崮，受到优厚待遇。刘仲旭在1980年时说他曾替孙美瑶写过告示。他说："孙美瑶不坏，是想革命的"细读这些文件，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和了解孙氏集团。现摘录原文，稍加注解，供研究者参考。

一、孙美瑶致田中玉信（大意）①

三月二十五日，孙美瑶致田中玉信：掳去外票二十二人，现放回五人，尚有十七人②。请于二十五、二十六两日内速将二十旅撤退，否则与外人安危有关系。又谓：外人吃水有困难。

注①：本文摘自《临城大劫案——枣庄受难秘记》。三月二十五日是古历，即1923年5月9日，劫车后的第四天。当时抱犊崮主峰仍被二十旅紧紧包围。

所以孙美瑶通过释放杨士祺(黎元洪的女婿)向山东省督军田中玉转达了先解抱犊崮之围，再谈判的意愿。

②外票：土匪称绑架来的人质为“客票”，也称“肉票”故称被绑架来的西方客为“外票”。据精确统计：被绑架西人共27人，途中共释放了5名妇女，两名儿童；为给政府军送信又释放两名男子；还有一名牧师途中中流弹身亡。实际上被作为人质分散扣留在孙氏集团各部的共16名。

二、孙桂芝让裴尔来捎给郑士琦的信①

我等数年冤枉，愤不能雪，请到外人，作为保证，以便办理接洽事项。今各路队伍未撤，有碍我等集会，应将五、六旅及二十旅等驻军一律撤回原防。限一星期，我等自有相当之答复。如此为宜，再议条件。否则作罢。意国病人，我等已择一净地，移往调养，不能释放。

孙美瑶　周天松　郭琪才启

注：①裴尔来是兖州德籍天主教士，他于5月13日进山，要求释放身患重病的意大利老律师穆素安。先到龙门观见孙美瑶。问他：“听说如3日内政府不允许所求（指撤军），则杀外人，是否真意？”孙答：“凡此恫吓之词，在要求不遂时，决将执行。我等非优柔之人，所言皆能实践”。裴又到抱犊崮见孙桂芝（当时抱犊崮周围的二十旅已撤退到抱犊崮东侧，与五、六旅对抱犊山区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孙便捎此信给当时专程

来枣办理此案的山东军务帮办郑士琦，要求先撤军，后谈判。

孙桂芝是孙美瑶的族叔，是孙氏集团抱犊崮总柜的老当家、老族长，外号赛张良。凡孙氏集团的一切内务包括票客处理，对外接待等等，均由他主管。他是孙氏集团实际上的中心人物。

三、山东建国自治军告示①

建国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孙为告示军民人等知悉②：

溯自近年以来，国事溷淆③，是非颠倒。一则曰“加税”，再则曰“筹款”，派捐、公债、印花、厘金种种苛派④，纷至沓来⑤，使农不得耕，工不得造，商不得贩；兼以贪官污吏，乾没剥削⑥，劣董恶绅，表里为奸，直令英雄豪杰郁郁而难平也。今天中国，或为仕而蜚缘者⑦，终南有径⑧；或为军而缙绅者⑨捷足先登；或为商而多财，奇货而居。独是我等同仁⑩，一腔热血，胸藏大略，而当轴上峰⑪，反待之若草芥，若奴隶。人非阘茸⑫，谁肯伈伈俔俔⑬，俯首贴耳？故我之所以啸聚山林者，盖有以驱之者耳⑭！吾同仁奋然起义，纵横齐鲁，人强械广，智勇双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平等为主义，均户为目的⑮，志在除尽贪官污吏，杀绝劣董罪绅，将中国之腐烂病民政策，洗刷一新，熙熙皞皞⑯，打成一个清平世界，为父老兄弟造真幸福，岂不美哉！且吾同仁，千人为英，万人为杰，人

纷众多，声势浩大，所到之处，粮饭寓所不能不仰给我父老兄弟也，尔其勿得抗违⑰。所伐之点，均系豪富财虏丰饶之家⑱，贫民小户，尔其勿惊。至尔军人性质，不为兵即为匪，若我既系一家，彼此勿相歧视。前大军既临贵境，想必望风而披靡也⑲，尔其稍安勿躁。为此特告各界周知。右谕通知。中华癸亥年　月　日（上盖建国自治军关防）

注：①本文载于1923年5月21日《申报》。据说是由法人裴尔培于5月16日从抱犊崮带出来。这一天，裴尔培设誓下山，把一份最后通牒递交给北洋政府。声明：此间军队若至本月22日前不撤退，即加害于被掳者。同时又捎出这份《告示》。

②建国自治军第一路军：孙氏集团部队番号。据刘子衡、张伯元二人了解，是孙中山先生给起的名。但也有人认为“自治”并非中山先生主张，因此是孙氏集团自己取的名。1922年清明节，孙美珠在金銮殿（金龙洞）起事，自任山东建国自治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孙美瑶为副司令。他们还把抱犊山区的三个系统的土匪武装组成五路联军：第二路军司令郭琪才，第三路军司令周天松，第四路军司令王继湘，第五路军司令刘清元。同年7月15日，孙美珠死难，孙美瑶继任总司令。

③溷淆：混乱、杂乱。

④印花：即缴完税的商品上所贴的标记，此处代指税款。厘金：水陆关卡收的通过税。大抵就货物原价抽几厘，故名厘金。

⑤纷至沓来：形容捐税名目繁多，重复摊派。

⑥乾没：吞没、侵吞。

⑦为仕而蜚缘：当了官而又趋炎附势。

⑧终南有径：成语“终南捷径”的活用。唐代卢藏用中了进士又隐居于终南山，到中宗时，又以高士之名做了大官，人称随驾隐士。有人讽刺他隐居终南山是谋求高官厚禄的捷径。

⑨为军而缙绅：古代官员把笏插在腰带上，所以称士大夫为缙绅。这里是讽刺军阀一面带兵，一面又攫取政府的要职。

⑩同仁：旧时称志同道合的友人为同仁。

⑪当轴上峰：主管上司。

⑫伈伈俔俔：伈，小心恐俱的样子。俔，船上用以测风之羽毛。比喻处处小心谨慎，看着上峰的眼色行事。

⑬盖有以驱之者耳：原来是有人在逼着我们走这条路啊。

⑭平等为主义，均户为目的：意思是人人平等，按户口均田。孙氏集团的主张与太平天国的政治纲领一致。早在民国七年，抱犊崮土匪中就流行这样的口号：“楼台殿阁该我钱，犋牛顷地管我饭，一牛一驴种庄田，穷哥们儿跟我玩。”

⑮熙熙皞皞：熙，温和欢乐；皞，宽舒自得。意思是：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

⑯尔其：尔，你；其：付词，相当于“可”。

⑰财虏丰饶：财产和奴婢很多。

⑱望风而披靡：看到风吹草动立即惊慌溃散。比喻

军队败逃。

四、建国自治军通告①

建国自治军为通告事：吾同仁等素具爱国之热忱，原不以抢架为本能。然值此无信用之政府，不正当之时代，焉得不铤而走险②，藉以扬眉吐气也。今军人等，欺我太甚，吾实有不得已于言者③。前数年，湖南招安吾同仁④，兄弟未尝不额手相庆。色然而喜曰：天生吾等以钢筋铁肋，今而后可以效忠于国家矣，名垂于竹帛矣⑤。不期张督敬尧一经坍台，立将我等尽行遣散。如栗凤梧等一时豪杰，郁郁而不平。衡情而论，谁肯甘心？不但此也。迨同仁等回籍安度⑥，又被一班人面兽心，衣冠败类，万恶绅耆，反造黑白，信口攻讦⑦，诬为故匪，有家不得归，到处无立足。我非木石，能不重入大海作蛟螭耶？由是集合同志，占领君山保主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⑩，真天成之根据地也。乃竟有一小旅军人，突如其来，攻我本崮。一则曰“招安投诚”，再则曰“交械受缚”，满口复杂⑪，大言恐吓，实令人忍无可忍。吾人非不愿招安，但恐再受其累，故于三月二十一日有特别快车劫洋人之举。是役也⑫，非为抢掠财物也，非欲惹出国际交涉也。盖以中国若许政府，若许军人，无诚意，无统绪⑬，诚不及外人之保其信耳。今已至此，别无可言，若无水落而出之办法，予给正式之条件，许我相宜之据点，决不放回西人。且吾地盘中，类皆父老兄弟⑭，倘政府果有真诚无伪之优待，俾

得大展其志⑮，定为地方上造大幸福，断不似现军人之鱼肉乡民，贪生怕死。不然，非特泰、兖、沂、曹永受其蹂躏，将见我四万万同胞无安枕之日矣⑯。吾同仁既不畏内，又不惧外，大丈夫处世，敢作敢当，进退自如，有何惭乎哉⑰？国存乎斯，国亡乎斯，吾国人戒之慎之可也⑱。为此特告周知。

注：①此文载于北京《晨报》5月24日。以5月20日以后，孙氏集团与北洋政府的谈判进入第二阶段。北洋政府一方面叫喊："非剿不能抚"，一方面又暗示滕峄士绅从中周旋。于是孙氏集团又发布这份《通告》，表明自己是被无信用的政府逼上梁山的，只要政府"许我相宜之据点"就愿意受抚。在谈判中孙氏集团提出鲁南、苏北为其活动的地盘。

②铤而走险：指无路可走而被迫采取冒险行动。

③不得已于言者：不得已才把话说出来的。

④湖南招安：民国七年，湖南督军张敬尧部派人到抱犊崮招安。栗凤梧、郭琪才等都在这时候投军。1920年张敬尧垮台，栗凤梧随着他躲进了天津租界；郭琪才一度投奔王占元，又被遣散而重操旧业。栗凤梧是孙美珠的好友。孙美通也当过张敬尧部下的稽查。所以孙氏集团部下多数是皖系军队的游兵散勇。下文说"兵匪一家"也是根据这些事实来说的。

⑤名垂于竹帛：名字在史册中。竹帛指古代用来写字的竹简和布，此处引申为史册。

⑥迨：到。安度：平安度日。

⑦反造黑白：颠倒黑白。信口攻讦：随意揭发别人

的私密。

⑧蛟螭：蛟龙。

⑨君山保主崮：抱犊崮又名君山。保主崮，双关语，既是抱犊崮的谐音，又是孙氏集团的根据地。孙美瑶自称君山王。

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人据守关门，千军万马攻不开。

⑪是役：这次战役。指劫车军事行动。

⑫复杂：指胡言乱语。

⑬统绪：统一纲纪。

⑭类皆父老兄弟：大都是父老兄弟象一家人。

⑮俾得：使得。

⑯无安枕之日：没有安心睡觉的日子。

⑰慊：嫌恨、不满足。

⑱国存乎斯，国亡乎斯：国家生存在于这，国家灭亡也在于这（指政府能否答应孙氏集团的要求）。

五、孙桂芝等复冯少山、孙筹成函①

接奉瑶札②，如亲眉宇③。日前敝代表趋谒台端④，诸蒙教益⑤，感谢之至。所云上海总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带有被服、食品等物掷赐来山⑥，足征高厚云裔⑦，无任忻佩⑧。专具寸笺⑨，用特奉复，敬请公安。孙桂芝　周天伦　刘清元　孙美瑶　褚思振　郭琪才同启

注：①此函见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

册）方伯椒《一九二三年的临城劫车案》。

冯少山、孙筹成是上海总商会代表，他们率领救护队员和红十字会医生、护士于5月27日到枣庄，29日给孙桂芝等6人写信，要求带医生、药品和救济物品入山。第二天，孙桂芝即复以此函

②瑶札：美玉般的来信。表示对来信尊重和赞扬。

③眉宇：眉额之间。

④趋谒台端：书信中的客气话。趋谒，前往进见；台端，对人的尊称，相当于“您”。

⑤诸蒙教益：许多事都蒙受您的教诲得到好处。

⑥掷赐：客气话。把物品很慷慨地赠送。

⑦足征高厚云裔：足以证明你们的高情厚爱，有如天上象征着祥瑞的彩云。

⑧忻佩：欣喜钦佩。

⑨专具短笺：专门准备好这封短信。

六、孙美瑶等致中国红十字会信①

红十字会执事先生大鉴：

启者，迩来节届炎夏②，天气酷热，山中中外票客暨吾同仁等因感时疫，病者甚多。贵会原以济世为心，活人为念③，务祈④台端大施慈悲，不辞劳瘁⑤，于一、二日内大驾入山，速施仁术⑥，扶危救难，则同仁等感戴无任矣⑦。余不多陈，鹄候光临，并请复安。

孙美瑶　周天松　郭琪才同启

四月二十二日

注：①此信载于《民国日报》1923年6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医生由于军方阻挠，至6月6日（古历四月二十二日）仍未能入山。而山中由于天气变热，蚊蝇乱飞，痢疾流行，故孙氏集团向中国红十字会写此信求援。

②迩来：近来。节届炎夏：气节到了炎热的夏天。

③济世为心，活人为念：把济助世人作为心愿，时刻想着救活病人。

④务祈：恳切之词。祈求您一定要……。

⑤不辞劳瘁：不怕劳累。

⑥仁术：仁慈的医术。

⑦感戴无任：不胜感恩戴德。

六、孙美瑶等致商会代表函①

湘浦、少山二位先生钧鉴：

启者，屡承贵会费神，惠赠物品，中心感激，图报无由②。前蒙函询中国老弱衰病之客票可否释回等语，披阅之下，感愧莫名。以同仁等临城之举，自知牵动全局。惟良心上之主张，实有不得已之故③。客票一层，对外侨尚存优待，况同胞乎？兹虔修寸函④，务祈台端枉驾入山⑤。面申谢忱⑥，并将中国客票若干奉上领出，藉符贵会救济之雅意。谅以客票为念，定当不惜跋涉。余不多陈，鹄侯玉趾早临⑦。此颂公祺⑧。

孙美瑶　周天松　郭琪才同启

四月二十二日

注：①本文见于《申报》1923年6月10日。孙氏集团写此信的目的：一是感谢上海总商会送给物品；二是

邀请北京总商会代表江湘浦和上海总商会代表冯少山入山领票。江、冯二人害怕孙氏集团向他们要赎金，没有去抱犊崮。

②惠赠：客气语，即赠送。

③图报无由：想要报答但又没有机会。

④虔修寸函：虔诚地写了这封短信。

⑤枉驾：委曲大驾。即降低您的身份。

⑥面申谢忱：当面申诉感谢的诚意。

⑦鹄侯：鹄，天鹅、颈长。伸长了脖子，眼望前方，恭侯。玉趾：贵重的脚，借代贵宾。

⑧公祺：祝辞，在公务中大吉大利。

七、孙桂芝等致陈调元函①

迳启者，接诵大札，备悉种切②。现同仁会议结果，一致赞成迅速办理。但头绪纷繁，未能完善。既云十一日进山，务望至期邀同安迪生先生、温佩珊先生、上海总商会代表冯少山、孙筹成先生、全国商会联合会江湘浦先生及滕峄绅商等入山办理一切。同仁鹄侯驾临。此上雪暄先生鉴③。孙桂芝　周天伦　周天松　孙美瑶　郭琪才同启

注：①此函见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册）。陈调元当时是徐州镇守使，是“临案”谈判中的官方代表。至5月底，谈判基本上已成定局，但由于孙氏集团内部分歧很大，多数老资格的首领鉴于往年三次招抚受骗的教训不愿受抚。在多数青年首领中，虽愿

意受招抚，但也因人多官位少，争吵不休，因而迟迟未能答复。这封信是在孙氏集团召开了联合会议，统一意见后，通知官方入山办理招抚手续。

②备悉种切：完全知道，分类磋切。意思是说，来信提出的各种问题都完全明白，并一一磋商。

③雪暄：陈调元字。把称呼放在信尾，类似通知的格式。

八、孙桂芝交安迪生的保证书①

孙桂芝函致安德森先生：

鄙人孙桂芝代表众家兄弟愿受招抚，编成国军。从此之后，永远忠心国家，决不做违犯及其它有损军人名誉之行为，并代表各兄弟郑重声明：对于安先生深信不疑，对于安先生②担保，永矢遵守。

中华民国十二年六月　日

孙桂芝印

证明人：江经沅　管象坤　刘毓桢　高廷廪　陈家斗　李柄章　孙福基　金方远　陈孝全　焦锡生　刘玉德

注：①6月12日，双方代表在下十里河村举行签字仪式，互换保证函件。这是孙桂芝交给官方的保证函件。而非协议书。签字作证的都是群众团体负责人和滕峄士绅，却没有一个官方代表。

②安迪生（又译为安德森），是北洋政府税务司美籍顾问。以个人名义担保政府和孙氏集团双方履行诺

言。这种文件，对于政府并没有法律效力。

九、孙美瑶等通告就抚释票情形的电文①

美瑶等世居岱南②，遭时不造③，屡经匪劫，无以为家，辗转流离，身陷匪窟。山林啸聚，夫岂本心④？迨至抱犊崮被围，同人悉将就死，万不得已，始有临案之举⑤。明知获罪非浅，然铤而走险，无非死里求生。今者，幸蒙我田督军、郑帮办开诚收抚，编为新军，再造之恩，沦肌浃髓⑥。查本案当议定之后，所有临案中西旅客，均已先后送出。惟是从前旧票之事，当时会由旅京山东同乡临案救济代表管剑侯君担任，慨许补助五万元⑦。业经向众宣布。有耳共闻，讵意延搁⑧？迄今管君竟不践约，而部下咸疑为美瑶等吞没，啧有烦言⑨。及经向管君面询，渠非但无以应，且因之避去。部下闻耗⑩，愤激异常。美瑶等抚驭多方，始克无事⑪。嗣经美瑶等公同集议：以既蒙收抚⑫，断无再行扣票之理，故将所有旧票共三十四人，于七日、八日一律送请郑帮办验收，分别送回原籍。仰蒙督军、帮办俯念本部兵伕无衣无食，苦况堪怜，特颁赐大洋四千元，以示矜恤⑬，宣示之下，欢声如雷。从此美瑶等感恩图报，为国效忠，蹈汤赴火，誓无反顾。区区诚悃⑭，敢乞我全国同胞鉴察焉。孙美瑶、郭琪才、周天松、王守义、高文成、刘清元、褚思振、王继湘、孙美松、孙义经、王文卿、程照寅、丁开法率全体官佐兵伕同叩⑮。

注：①这篇电文通告全国：孙氏集团已就编为新

军；所有中外、新老票客都已处理完毕，今后要“报效国家、誓无反顾”了。发电时间在7月9日至15日间。电文收编在陈无我的《临城劫车案纪实》中。

②岱南：泰山以南。

③不造：不造化。即不幸运。

④夫岂本心：岂是我本来的愿望。

⑤临案：临城劫车案的简称。

⑥沦肌浃髓：浸透肌肉，深入骨髓。比喻感受极深。

⑦旧票之事：指在劫车前绑架来的客票。会：遇到。担任：担待责任。

⑧讵意：岂料、怎会想到。

⑨啧有烦言：很多人议论纷纷，表示不满。啧，形容咂嘴的声音。

⑩闻耗：听到不幸的消息。

⑪抚驭：劝慰、训令。始克：才克制住。

⑫以：认为。

⑬矜恤：怜悯抚恤。当时田中玉曾有意给25 000元作赎金，以便早日了结此案，但由于北洋政府财库空虚，最后以抚恤金的名义，给了四千元。

⑭诚悃：诚恳。

⑮署名者为新编旅的主官，按官衔排列：旅长孙美瑶；团长周天松、郭琪才；营长王守义、高文成、刘清元、褚思振、王继湘、孙美松；参谋长孙洪图（孙汉经）；副官长程焕寅；警卫队长丁开发。王文卿官衔不详。孙桂芝、周天伦均告老还乡。

诱杀孙美瑶

万伯龙

枣庄中兴煤矿公司是枣庄地区的军政绅商的俱乐部，它是利用物质刺激联络军政暴力和绅董势力来镇压工人和农民的。因此不惜糜费，竭诚招待，终年客满，宴无虚夕；虽属偏僻山野，豪华不亚都市。孙美瑶自招安后也经常参加这个俱乐部。孙部是漫无纪律的，三五成群，时来枣庄闲游。是年（1923年）秋间，孙部与驻枣庄市内的第五师吴可璋团在街上发生了冲突。孙部被殴逃回后，孙美瑶闻之大怒，即率领他的手枪队六、七十人蜂拥而来。孙美瑶手执盒子枪沿街大骂，随来的人也都摩拳擦掌，剑拔弩张，宛如市井无赖打群架的样子。孙部把吴团团部包围，孙大嚷大叫地喊“有种的出来”。吴可璋听说部下与孙部发生冲突，预料他们跑回去一定不会干休，便严约部下不准出门，谁酿事端由谁负责。这时全市大惊，有如大祸将临。所有商家住户都吓得关门闭户，不敢出门。后经绅商出面劝解，孙部回去暂作罢休。

枣庄孙美瑶与吴可璋团冲突事件，已为兖州镇守使张培荣所悉，他匆匆赶来枣庄，下榻中兴公司，经绅商把孙吴冲突经过述说了一番，请他从中调解以维地方。他即用电话邀孙美瑶前来谈话。盖孙自招安后经人介绍

已拜在张的门下，因此张对孙脱略形迹，直以尊长自居。见面之后，张以不满的情绪说孙胡闹胡闹。孙就叙述部下被殴打情况和所受的屈辱，言下犹有余怒。张说："你现在已是将官了，对于团级人员这种态度，真成笑话了。以后你们怎么见面呢？还能在一起共事么？胡闹胡闹，太年青，太年青。"接着张说："现在我忙得很，苏鲁边境上很不安静，昨天就有三封急电叫我派队伍往剿，等我把队伍派出去，有了时间，我作东道备酒席给你们和解。要知道冤仇不可结，越结越深，这很能误大事。今天在座的各位绅董，都要前来作陪，我们不邀外客。有了时间订准日期我再专笺相邀，大家要来帮忙的。"绅董同声说："只要军门出头没有了不了的事，为了我们地方上的事，我们一定奉陪的。"孙也唯唯，此事暂为搁置，就一榻横陈，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漫谈了。孙美瑶讲他幼年手不扶地，能翻跟头，车轮子能打二三十个。张培荣极口称赞绝技绝技。孙又说最近得了一个好鹌鹑，个头小非常能咬。张说河南最讲究这个，他爱之成癖，现在没有工夫自己养了，叫他们养了几个，等着拿来咬咬，虽然不在输赢，也要赌点东西，才有意思。临走时又坚嘱孙美瑶在这几天里要严束所部，不要上街，以免再生事端。"只要我们没有意见了，他们不会生事的。"回头又对绅董们说转达他的意思给吴团长，"要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事千万不要报告督军，把事情弄大就不好办了"。言罢即登车回兖而去。任何人都不知他此行含有种种机谋也。

张培荣回兖后即派我团驻滕峄部队集中兵力，由团

长吴锡九率领前赴苏鲁交界郯城一带游击，令我率一营兵力扼守韩庄车站。这时枣庄附近我旅部队均抽调出发，任何人都知道已成空城了。没有几天，张培荣单身到枣庄来，一面假借中兴公司庖厨大备酒筵，一面发请柬、打知单以孙美瑶为首座，绅商名流作陪。预定吴可璋在另一院落的客厅，招待孙旅校级人员，由随从副官招待来宾的随从。头天张灯结采，大肆铺张，上下内外，非常忙碌，至夕方峻。公司内外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张镇守使假借杯酒为他们释前嫌的，不疑有他。至夜深人稀后，张召吴可璋于密室商妥：他在内院解决孙美瑶，吴在别院解决孙的校级人员，伏兵要暗藏兵刃，以便衣为佳，以避众人眼目；并说他已派专使往召吴锡九团星夜兼程回防，务于黎明之前到达郭尔集附近候命；兖州马登瀛团已登车待令，沿途各站已密令戒严。两人计议好了，就各自布置一切。次晨公司中更加忙碌，烹茶暖酒，布席安座。至9时左右，陪客们陆续都到了，张命以电话催请孙美瑶并嘱孙把他最近获得的好鹌鹑也带来。张于诸客未到之前，已于二门过堂屋中暗伏便衣二人，同时给其随从手枪一支，以防万一。他正在与绅董寒暄间，传呼“孙旅长到”，说声“请”。张培荣在前，众绅在后，将出客厅，降阶相迎时，二门内暗伏便衣二人随孙而上。这时随孙而来的武装随从都由副官们截邀，让入小客厅吃酒去了。一个便衣急步向前摸孙胸腰，孙说干什么？一言未了，另一个便衣手握白石灰一把向孙双目一拍，这一个便衣又把孙往下一按，那一个便衣顺手抽出刀来，手起刀落，孙就身首异处了。来宾

睹状大惊，莫知所措。副官们已将孙的随从解除武装，因拘一室不准乱动，惟外院吴可璋处毫无声息，张心疑派人往探。

原来吴可璋与张商妥计划后，回到团部忽然异想天开，等到张把孙斩杀后，即以不斩之恩，要结纳孙的校级人员推戴他为旅长。聚而歼之之议，根本未放在心上，因此也未作任何部署。第二天校级人员入席后，预计时间内院谅已把计划执行了，他就对众把当前情况和意图宣布了，他们闻之，正在惊慌失措的时侯，张培荣派的人已到了，张得知后，立刻飞令吴锡九团迅将郭尔集严密包围，断绝内外交通，外窜者格杀勿论，急电马海峤团增援郭尔集，勒令孙部缴械，并令所辖津浦沿站严密检查，凡属孙部官兵一律扣押。所幸来公司的孙部随从，均已缴械予以监视。这时公司内外交通断绝，张培荣晓谕孙部校级人员，说枣庄冲突事件罪在一人，业已伏法，与他们无涉；郭尔集方面已派重兵包围，他们可以选派代表前往告知所部遵令缴械给资遣送回籍，安居乐业，如敢抗命立斩不赦；并保证他们原级原薪归本镇差遣，何去何从，听其自决。校级人员均无异言，表示遵命，就立刻派出代表携带孙美瑶首级前往郭尔集传命。而郭尔集孙部忽见军队前来包围，就知有变；正在狐疑之间，代表来了，得知情况，又看到孙的首级，莫不惊慌失色，群龙无首，莫可为计，只有俯首听命，甘愿遵令缴械。代表复命后，又由各团营派了缴械负责人，即予收缴完竣。临案至此，根本结束，下边就是尾声了。

枣庄解决孙美瑶的那一天，我团沿站驻军戒严，检查来往旅客非常认真。万恶匪首刘守庭（馍馍刘）恰恰于此时到达临城车站，转赴枣庄，被我团查获了。该匪非常机警，看到军警比往日多，对他施行检查即偷问士兵说枣庄有变吗？我们置之不理，仍然检查他的网篮，乃至看到他的六爻卦筒一个，目兵揶揄他说："馍馍刘你的六爻卦今天不灵了吧？"盖他在匪中遇有疑难大事都由他一卜决之，人多目为小诸葛。他回答说："少说废话，你能够把我怎么样呢？"等到检查完了，排长说带着他。馍馍刘这才神色大变，知道不妙了。我们用电话报告后，令径解兖州镇守使署军法核办。该匪残忍成性，令人发指。前年他们攻打滕县山外民寨时，由于打死了一个土匪，他把寨打开，大肆烧杀后说："我这个兄弟跟我跑了这些年，还未结婚呢，就土（阵亡之意）了，我给他说个媳妇吧。"他在村中亲手抓来一个青年处女活活钉入棺中给埋了。至于纵匪奸淫和残杀的肉票，那就罄竹难书了。后经绅商群众要求张培荣解赴犯事地方予以斩决，人心大快。

孙部缴械后，所有士兵均给资遣散回家，官员听凭自愿归兖镇差遣，大部分都各奔前程了。

（节选自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十六册，略补时、地）

作者介绍：万伯龙，1923年任山东第六混成旅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美瑶临城劫车时，该营担任津浦铁路上临城、沙沟、韩庄三站的防务。

枣庄回族

文　光

回回民族，简称回族，俗称回民。枣庄镇和台儿庄镇是枣庄市境内回民的两大聚集地。解放初期，枣庄回民基本分布于枣庄中心街以东区域，即枣庄东半部。枣庄最东部，濒临东沙河的老枣庄街为原始聚居区。著名的清真古寺就设在这里。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枣庄回民虽渐趋散居，但基本未脱离市区。

一、枣庄回民的来源

回回民族，基本是元代初期由波斯等地的回回人迁徙而来。十三世纪初叶，蒙古军队大举西征，先后征服了中亚细亚一带信奉伊斯兰教的各国，并且征调这一带的人民，组成了“西域亲军”，用来征服国内其他民族。回回军即是其中有力的一支。从此以后，回回军有的就在全国各地居留下来，接受汉族文化，并且从事农业生产。由于蒙古军首先征服西北地区，所以回回军大部留在西北各省，这样，西北地区成了回回人的主要聚居区。此外，在华北、云南、河南、山东一带及靠近水陆交通要道的商埠也有聚居点。随着工商贸易的往来，回回人不断迁徙，虽然分布越来越分散，但始终保持着大

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在乡则自成村落，在城则自成区域。他们所到之地大都建清真寺，并围寺而居，以寺作为他们民族、宗教标志及社会活动的中心。

枣庄回族的来源，与全国全省回族的迁衍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迁入的确切年代，尚无史料记载可查，邑志无载，家族无谱，碑碣寥寥，文字无存。通过走访、座谈、调查，从搜集的资料中分析推断：枣庄地区回族聚居点的形成，不属于元明时代回回营屯田的繁衍，也不是大批的定点迁徙，而是分散而来，集中靠拢，逐渐形成的聚居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曾有人做过调查，仅枣庄村东一带回民墓地就有坟墓7300余座。其中有“金车”之墓，据墓碑记载，他的后辈已繁衍十八代孙，如每代以25年推算，已有450年之久，当为明代嘉靖年间。金姓后人传说，他们的先祖系济南小金庄人，一条扁担挑来枣庄，而今已成为枣庄回族中的一大家族。另外，尚有一些姓氏自称先祖来自河北、山西、泰安、济宁等地，如清真寺一清乾隆年间碑碣记载：“君锡赵乡老，原籍陕西宁夏半个城人也，因寻叔父至城北枣庄，遂以寄居”。另一碑记载：“兄弟二人祖籍济宁州，寄居峄县枣庄”。从上述情况来看，枣庄回族迁入的时间和聚居点的形成，当为明代晚期的嘉靖年间，笔者以为枣庄村落的形成始于此时。

枣庄回民分布的情况是：解放前，主要集中在老枣庄街，少部分聚居于金庄（今胜利商场一带）、三合庄（今三合街解放初期尚有一片空地，俗呼“金场”）、苏家园（今打靶场以南）等地。解放以后，部分回族矿

工随城市开拓发展陆续迁入北山职工家属宿舍。1977年以后，因老枣庄街地下采煤，地层塌陷，实行搬迁，分别新建了新风里、利民、振兴、龙头新村，尚有部分干部职工迁入厂矿宿舍及其他居民区。因清真寺在原址重建，故老枣庄街仍作为民族、宗教的活动中心。

居住在枣庄的回民，以金、刘、李、石、米等姓氏居多，后辈繁衍分支多系，是较大的几个家族。其次为法、苏、马、杨、文、白、赵、扈、于、郑、沙、丁、张、谷、王等姓，亦各有自己的多寡分支。当地还俗传："枣庄回民有五马六杨十三李，同姓不同宗"。1982年市中区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回族人口5302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回族人口为6395人。

枣庄地区回民除一部分在枣庄矿区边缘从事农业或下窑挖煤当矿工之外，多数从事商业或手工业。他们善于经商，但既无雄厚的资本，也无广阔的财源，仅止一般经营。清末民初时期，枣庄街有杂货店数家，如"同聚"（金姓）、"瑞丰"（金姓）、"万义"（刘姓）、"聚盛"（金姓），还有"景兴"（染坊、李姓）等。民国以后，"德源盛"茶庄兴起并延续至今。另外，还有十余家从事简易客栈（车马店）。从事饮食业者较多，以"万福楼"饭庄较有名气。其次是经营牛羊肉者。绝大多数是经营各种各样的面食，肩担手提，沿街叫卖，本小利薄。另一种较广泛的职业是皮匠（俗称"皮匠挑子"），以制作农畜所用的皮货，或以修补鞋赶集串乡，收入寥寥。总的来看，解放前，绝大多数回民则属于"穷回回"之列。

二、枣庄回民的习俗

生活在这里的回民，和全国各地的回族一样，在生活习俗方面大体相同。但在一些细枝末节方面，受地区环境的一些影响，有着一定的差距，存在着自身地区的特点：

语言：回回人初入中国时，是以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汉语共同使用的。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习惯了以汉语作为本族的共同语言，只保留了少量阿拉伯和波斯语汇。枣庄回民随同当地语言，日常生活中亦保持使用一些自己的语汇，如相互见面问候时说："安赛俩目而来苦目（吉祥、安好）"？回答："吾而来苦目赛俩目（彼此安好）"。称朋友为"多斯梯"，乞讨称"求乜贴"，表示感谢时说："赛阿布尼"，"福"称"乃岁布"、"祸"称"摆俩"，"尸体"叫"埋衣台"……

文字：通用汉文。但逢节庆则用红纸请阿訇以阿拉伯文书写"都瓦尼"贴在门楣之上，一来祈求吉祥，二来亦是回民家门的标志。再者，清真饭店或食品摊上，均有书写阿拉伯文的标志物。回民中的乞讨者，则以门楣之上的"都瓦尼"为记，否则，不去登门相求。

出生：婴儿出生数日后，请阿訇起回回名，即在汉名前面加上一个阿文名字，如"尤素夫·张祥"。但这仅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尔后正常使用的仍是汉名，并不使用回回名。

婚姻：从前，回民注重同族通婚，但不禁汉女嫁

回。现在婚姻法虽不限民族之间的相互通婚，但由于生活习惯不同，仍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再者，在同族通婚中则讲究同宗不婚，另外辈数不等一般也不结亲。解放前，回民的婚姻亦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之间互不接触，两家同意之后，先履行“通书”（又称“谢允”）再行“下启”（送嫁衣、定婚期），最后“嫁娶”三道程序。至时，请阿訇走坟、做油香、诵经、俗称“告先”，以示告慰先人之意。同时请阿訇用阿文书写“伊扎布”（即结婚证书），念“尼卡哈”（祝福经）。其后，宴请宾客及婚后的一些礼仪则大体上与当地汉俗相似。

丧葬：枣庄回民的葬俗和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一样盛行土葬。通行速葬不过三天，按伊斯兰教义为“亡人入土为安”。其送葬的过程是：将冲洗后的“埋衣台”（即尸体），用白布包裹，置于长方形的木制托板上，身下卷放三块长约丈半的半幅白布（称“托布”）。扣上形似方棺的木盖（称“坦伏”），移至围以蓝色图案轿衣的专用葬具上，以四杠、八人抬送至墓地。下葬时打开“坦伏”，用六人提起“托布”，将尸体徐徐放入墓穴，抽出托布，盖上顶木，即行封坟（有人误传为抽板投尸，尸体落地后仰面则笑，俯身则哭。纯属无稽之谈）。墓室的构造，均为南北向的长方形直坑。有的则用砖砌一周或用木料制成周围，盖顶用木或石板，但均不带底，尸体必须放在土面上，仰身直肢，头北足南面向西。封土后坟墓堆成长方形。另有一种传统的墓葬为“掏窑子”，即先挖一长方形直坑，深两

米，再沿底部一侧（男左女右）向里掏洞，置尸于内，用土坯封门，再填封土。一木一砖不用，可谓名符其实的“土葬”了。整个服丧期间，亲属均“带孝”，白布孝帽孝带，女顶“搭头”。以往还穿“孝衫”。长子领丧，女性不去坟地。送葬时，专请阿訇领做“则那孜”（葬礼），回族男女同胞自动到场，以示隆重，并体现团结互助。葬后七天，四十天，百天，周年为纪念日，至时请阿訇走坟诵经，做油香。整个丧俗大抵如此。

生活习俗：枣庄回民在服饰上与汉族差异不大，从前比较讲究，节日期间，大都着深色长衫，戴六角尖顶蓝色帽，现通行白色小帽；妇女顶黑纱盖头。在饮食方面，特有的食品是“油香”（用烫面油炸制成的食品），但平时不做，仅在节日或先人生死纪念日才用。平时食用反刍动物肉，如牛、羊、驼以及鸡、鸭、鹅等家禽，但必须经阿訇宰牲。禁忌食猪及驴、狗等肉；不食自死的动物，亦不食一切动物血。回民善饮清茶，晨起后首先饮茶然后用饭。日常注重清洁，面盆、脚盆、毛巾、脚布严格分开，不得乱用。春节期间和汉族一样欢度，但不贴对联，仅换一张新“都瓦尼”，不烧香，不叩头，不摆供。初一家人团聚，初二外出拜年，鞠躬或长揖问侯。节前，请阿訇到先人的坟前诵经，以示怀念。遇有节日、婚丧或诵经时，专燃芭兰香，祛除邪气，保持清香。

互助：在旧社会里，深受统治阶级压迫和歧视的回回民族，养成了团结互助的习惯。《明史》记载：“同类则相遇亲厚，视如至亲”。回民相互之间称“老

表”，对年长者称“乡老”。行至外地则会受到同族人的热情接待；落难时则会为受到筹款帮助。孤身死亡，则共同捐款埋葬。乞讨人走至各家均受到施舍，还可以栖身于清真寺的空房里。回民遇有丧事，男女同胞则自动前往吊唁并参加送葬。

三、枣庄回族与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一。在中国一般通称回教或清真教。它的基本信条是：信仰“安拉”为宇宙独一无二的“真主”，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是穆斯林全部信仰的核心。回族宗教学者把这个信条编为十六字的“清真言”，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真主使者”。

伊斯兰教在唐代传入中国，十三世纪初时大批回回人进入中国以后，伊斯兰教开始盛行。我国东部地区因回族人信奉伊斯兰教，故称回教，但不等于回教就是回族或回族就是回教，中国尚有维吾尔、塔吉克等九个民族亦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回族的形成和发展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经济、政治上的原因才是回族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信奉伊斯兰教的枣庄回民和全国各地穆斯林一样，在民族习俗方面，从出生、婚姻、服饰、饮食、起居直至死亡，无不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如孩子起回回名，结婚写“伊扎布”，带白帽、顶盖头，食反刍动物肉，走坟、诵经、速葬、土葬等，这些都是按照伊斯兰教义

和《古兰经》规定而沿袭下来成为民族习俗的。

伊斯兰教的主要宗教仪式有：

礼拜：每日五次礼拜，分为晨礼、晌礼、哺礼、昏礼、宵礼。能够坚持每日“五礼”的仅为驻寺教职人员以及少数乡老。

聚礼：每周星期五为“主麻”日，比平时“五礼”参加的人数较多，仪式有礼拜、诵经、宣讲教义等内容。

会礼：每年三大节日（开斋节、宰牲节、圣纪）为会礼的日子，穆斯林们沐浴净身前往清真寺参加会礼，节日气氛比较浓厚，仪式隆重。回民职工则享受放假一天，欢度节日。

斋月：每年有一个月的“戒斋”，故称“斋月”。斋月每三年更换一次月份，依次类推。戒斋期间，白天不进食，不喝水，黄昏和黎明前各进餐一次，晚餐为“开斋”，晨餐为“封斋”。斋月起于阴历九月初，见新月（月牙）为始，至十月初见新月为止，并在第二天为“开斋节”。

四、枣庄清真寺

枣庄清真寺，座西朝东，呈长方形。分前后两院，共有殿舍近60间。占地东西长约100余米，南北宽36米，总面积约3600平方米。但原地基并非如此。据寺内一块清代乾隆年间捐地碑记载：“宅基一位计地一十有二亩捐于清真寺”。多少年来，寺院周围空地被聚居的回民

建房造宅，现仅保留了寺院。

据有关资料介绍："中国清真寺采用的东西方向的轴线，而大门位于东端，平面在东西轴线上对称的各种建筑，与汉族建筑的布局方式并无差别"。枣庄清真寺的建筑特点亦是如此。1981年重建时，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面貌：大门为硬山式建筑，门楼高7米，朱漆双扇，门楣横匾曰"清真古寺"，门内南北两侧各有配房两间，与大门联成一排，一为葬具房，一为太平室。两进院。前院进深20米，南北宽约36米。新建北屋四间，为寺管会办公接待之用。院内东北隅有云柏一棵，高10余米，树围2米，树身高2米处结有一"瘿"。据说古柏结瘿须在四百年左右，可为此寺的历史见证。

二门原为硬山式门楼，稍小于大门，两侧各一洞门。现改建为单墙一道，中设洞门，两侧各一小门，洞门两侧各有一碑龛。

进入洞门，即是主院，南北两厢有对称硬山式建筑，曰："北讲堂"、"南讲堂"。各为正厅五间，出厦五间。这是议事、接待的场所，其内室为驻寺教职人员居处。北讲堂西部连接水房两间，专为淋浴净身之处。

大殿，是清真寺的主体建筑，是伊斯兰宗教仪式礼拜、诵经、聚礼、会礼的地方。因为圣地麦加在西方，所以中国的清真寺大殿一律座西朝东，以礼拜时面向正西鞠躬叩首。这座大殿，位于寺院的西端，殿基高2米，青条石砌成殿高8米。硬山起脊式建筑，占地南北17米，东西10.5米，总面积180平方米，进深三间，阔五间。殿内南北两侧各有一耳室。正西突殿脊部分似出平

塔的建筑为“望月楼”楼高10米。殿东部（正面）开三门，门前为四柱五间前廊，石级九阶，整个大殿建筑为二十九间。

枣庄清真寺的建筑布局受汉族建筑艺术的影响较大，已与西北地区以穹窿顶式建筑为主体的清真寺大不相同。不过在风格上仍保留阿拉伯与伊斯兰教的特点，所有的门窗均饰造为凸型，涂浅绿色。大殿内部沿墙顶部一周饰葡萄花纹图案，间以阿拉伯文。西墙正中上下凹进墙内突出墙后墙后的部分即是望月楼的下层，与大殿联结一体。这个突出部，是大殿的重要组成部份，称“米哈拉布”（意译为“祭坛”、“壁龛”），用以指示礼拜的朝向，无影无像，仅缀以菱形、圆形图案，内书经文。殿内西北角有一木雕小楼，仿歇山式，高1米许，置于木台上，架木梯，称“敏拜尔楼（意译为“坐位”、“讲座”），举行聚礼、会礼等仪式时，阿訇站在梯上，手拄经杖诵经。殿中地面铺席垫毯，用以礼拜。其他无任何陈设，殿内呈现庄严，肃穆的气氛。

清真寺内由阿訇担任教长（亦称掌教或师傅），主持教务活动，并有二掌教、三掌教相助，四掌教则专管宰牲。除上述驻寺教职人员外，还有“乡老”（当地回民中德高望重的老人）若干人参与管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和宗教政策得到迅速落实，成立了“枣庄清真寺管理委员会”，负责讨论处理民族、宗教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和日常工作。

“阿訇”一词，是波斯文的音译，原意为“教师”。在通用波斯语的穆斯林中，是对伊斯兰教学者或

教师的尊称。在中国是对伊斯兰宗教职业者的通称。取得“阿訇”学位者，须经十年左右攻读阿文和经文，经考核后方能毕业挂帐（即毕业典礼）。此后，以“阿訇”的资格接受一地的聘请，在清真寺主持教务，担任教长。一般情况下是一任三年，期满辞行，改聘他人。而现在对此制度不甚严格，大都因地因人制宜了。

枣庄清真寺远年历任教长（阿訇）情况已无记载可查，仅就民国以后各届顺次排列如下：

姓　名	籍　贯	就职时间
王永清	山东省宁阳县	1931年
王立祥	山东省宁阳县	1934年
陈怀儒	河南省陈州	1937年
王立祥	山东省宁阳县	1940年
米成瑞	山东省苍山县	1943年
石宪宝	山东省兖州	1946年4月
米元奎	山东省费县	1950年
刘化民	河北省孟村	1986年10月
杨宗亮	山东省定陶县	1989年(就任不久病故)
弭广训	山东省泰安	1989年3月
周廷太	山东省长清县	1990年1月

五、革命斗争时期的枣庄回民

清末民初时期，枣庄地区煤炭开采逐渐发展起来。居住在枣庄的贫苦回民，除经营小本生意外，一部分无出路者即投入煤矿挖煤做工，过着艰辛的劳工生活。

1926年，枣庄矿区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工运工作。回民矿工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教育下，阶级觉悟逐渐提高起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革命斗争的行列。在以后的各个革命斗争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33年，党领导的枣庄矿区五月大罢工，不少回民矿工参与了组织领导工作。其中如李长庚、王宝亮、王宝增、马文元、李殿臣、刘洪庆等人都是作为骨干力量，分担了部分组织宣传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打击了反动势力，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

中共徐州特委于1932年10月派郭子化同志来枣庄开展工作。他在回民聚居的老枣庄街西门外鸡市胡同口开设了“同春堂药店”，以此做为党的秘密工作机关。郭子化同志尊重回民的生活习俗，不吃猪肉，吃鸡也和回民一样到清真寺请阿訇宰牲。给回民看病亦不收钱。很快就取得了回民的尊重和信任。他的药店内，回民求医的、问事的、下棋的来往不断。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党的宣传工作，教育了广大回民群众。1935年他发展的第一批中共党员中，就有李微冬、王寿山、金宝允等回族青年。一年后，又发展了回民张鸿仪、王守义、李汝佩（女）、金刚（女）、白秀蓉（女）等。1936年冬，建立了一个新的支部，由李微冬任支书、金光庭、张鸿仪、汪国璋（汉族）任支委。后又建立了一个妇女支部，成员有李汝佩、金刚、白秀蓉等。由于党在回民群众中扎下了根，使广大回民群众的阶级觉悟迅

速提高。

1936年6月，中共枣庄矿区党委成立，李微冬同志任委员，负责统战、宣传工作。他以“枣庄医药合作社理事长”、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作掩护，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年底又成立了中共枣庄支部，李微冬任书记，张洪仪、金宝允任委员，都是回民。

1937年日寇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枣庄地区开展了抗日救亡工作。枣庄中心县委派李微冬同志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有白新才、李春和、刘金庭、刘金民、马继礼、李振哲、李守敬等一批回民青年入了队。同时，为做好抗日宣传工作，创办了“抗敌报”，还成立了抗日文艺宣传队，由张洪仪任队长。他们深入工矿、农村、街道，以文艺形式宣传演出、贴标语、散传单、搞募捐，宣传抗日，发动群众。以后，宣传队转入战地服务团工作，随团的回民党员有李汝佩、金刚、白秀蓉、杨辛、金宝允等。

1938年3月18日枣庄沦陷，李微冬同志组织了一支以回民为主体的自卫队带进北山区。以后，这支队伍转战鲁南地区，坚持游击作战，屡经改编或调动，有的同志升入野战部队，有的转入地方工作。在实际斗争中，不断成长起来。

1949年枣庄第一次解放。枣庄市民主政府在老枣庄街建立了枣庄镇民主政府。镇长刘斌、指导员李宗海、副镇长李振哲、妇联主任李玉，都是回族干部。是年春，为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枣庄建立了一支回民支队，大队长陈友吉，政委杨辛。这支回民

队伍以后转入了正规部队，投入了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同志经历了战争环境的考验和锻炼，又继续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辛勤工作。其中有些同志还担任了党和政府的中、高级职务。据所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有李微冬（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春和（自治区国防工办主任）、白新才（自治区工会主席）等；在北京，有李汝佩（北京市妇联副主任）、李宗海（文革前任国家民委办公厅主任）等；在上海，有刘斌（文革前任上海市民委主任）；在济南，有金宝珍（省政协副主席）；在抚顺，有白新泉（抚顺矿务局局长）。至于担任县、科级职务的，就更多了，不详述。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枣庄的回族儿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也有许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据所知，有张洪仪、谷同昌、米运田、刘金庭、刘福奎、王寿山、王守义、陈友吉、李宗祥等同志。

枣庄地区的回族群众，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应有的力量。

征稿启事

为加快我区文史资料发掘、征集、整理、编辑工作的进程，专此吁请广大政协委员、各方各界爱国人士提供有关枣庄地区史实的稿件，从而向社会奉献一笔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宝贵财富，藉以造福乡梓。

欢迎知情老人秉笔直书，也欢迎青年朋友为老人记录整理口述稿，还希望大家向我们提供史料新线索，开辟新领域。

现将有关撰稿事宜条陈如下：

一、征集内容

1、时限为：上起1898年戊戌变法，下迄1965年“文化革命”前。七十年沧桑，近百年兴衰起伏。

2、内容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材料。三教九流无所不包，陈迹旧踪皆成文章。

3、取材范围：人文活动为主，自然变异为辅；立足市中区史实，兼顾邻区、他乡史料。

二、稿件要求

1、存真求实。不溢美，不贬损；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史料经得住历史检验。

2、文史并茂。不拘观点，不限题材，不求完整，不定篇幅。文笔可活泼些。

3、条理清楚。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时间、地点、人物，尽量记述明白。

4、卷面整洁，书写清楚，避免字误。

5、文责自负。请注意查证、核实。以真实姓名示负责。

三、稿件处理

1、来稿一律作为历史资料收存，不退稿，请善自保留稿底。

2、凡适宜发表者，皆按规定致酬润笔；不适宜发表者，亦酌赠谢仪慰劳。

附《市中区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政协市中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九月

市中区文史资料征集提纲

政 治 军 事

1、有关太平天国、义和团、捻军在枣庄地区活动或产生影响的资料；

2、辛亥革命时期，枣庄各界所受影响资料（含同盟会在枣庄的活动）；

3、“五四”运动、“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及临城劫车案等重大历史事件对枣庄产生影响的资料；

4、奉军驻枣资料；

5、北伐军驻枣资料；

6、韩复榘来枣资料；

7、有关孙美瑶及“马子”组织与活动资料；

7、红枪会、联庄会组织活动资料；

8、日军侵占枣庄后，敌伪组织及其活动资料；

9、日本侵略军在枣庄地区血腥统治资料；

10、抗战初期，枣庄青年学生南下及参军参战的资料

11、抗战时期，枣庄各抗日组织、抗日团体、抗日武装的资料及枣庄回民支队、鲁南回民协会资料；

12、有关王继美的资料；

13、国共和谈第22执行小组在枣庄活动资料；

14、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织开辟统一战线的情况。

15、解放战争时期，枣庄处于“拉锯”状态时的资料；

16、枣庄地区支援淮海、渡江战役及参军参战资料；

17、枣庄“还乡团”组织及其活动；

18、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在枣庄的组织及活动资料；

19、有关崔、宋、梁、田、金、李、王等大家对枣庄政治、经济产生影响的资料；

20、枣庄工运、农运、学运及爱国人士资料；

21、枣庄地区工会史料及工商联史料；

22、枣庄地区政权建立及爱国人士参政议政资料；

23、枣庄地区土地改革、“镇反”、“肃反”、支援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的资料；

24、有关禁烟、禁赌、禁娼、取缔反动道会门资料；

25、军政要人来枣庄资料；

26、枣庄籍军政名人（含旅居海外的同胞）传略、轶事、回忆录。

财贸经济

1、有关中心街（中新街、洋街）的资料；

2、枣庄老字号产生、发展和变迁资料；

3、中兴煤矿公司与地方关系资料；

4、中兴煤矿公司包工柜资料；

5、枣庄私营煤窑资料；

6、日军侵枣时期的枣庄经济情况；

7、王继美盘踞中兴煤矿公司时的资料；

8、枣庄商会、公会资料；

9、建国前农村地主、富户在枣庄一带兴办、经营工商业的情况；

10、枣庄税征及集市管理资料；

11、枣庄邮政、交通资料；

12、枣庄烟、酒、糖（麦芽糖）、油、粉、米、冶炼（金、银、铜、铁、锡）等工厂、作坊资料；

13、枣庄煤焦产、运、销资料；

14、枣庄山果产、运、销资料；

15、枣庄陶、瓷、砖、瓦及建筑、建材发展变迁资料；

16、枣庄传统工艺、剪纸、扎纸、玩具（竹、木、泥、糖、面等）、烟花（爆竹、烟花）等资料；

17、枣庄名菜、名吃、名点资料；

18、枣庄的行业规、集市规、庙会规；

19、枣庄回、汉民饮食业发展变化资料；

20、枣庄解放初期金融、物价、商品流通方面的资料；

21、枣庄解放初期集市贸易、工商业恢复、工商管理及税收、税管的资料；

22、枣庄解放初期组织失业工人生产自救资料；

23、解放后农村变工队、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各阶段资料；

24、枣庄经济领域知名人士的传记、轶事、回忆录；

25、枣庄地区的能工巧匠。

文教艺体

1、枣庄老戏园子、大众娱乐场（东落子园）、中华舞台、新华舞台等演出场所兴衰及经营情况的资料；

2、艺术名家在枣献技资料；

3、有关书籍、报刊、文告印刷资料；

4、有关文盛书店的资料；

5、枣庄学士、名儒遗著、遗墨及德操介绍；

6、文物考证、名胜探源、地名史话；

7、劳动号子（如推磨车、打夯、抬大筐等）、民歌民谣、行话术语、讳语黑话；

8、乡农学校资料；

9、中兴小学、中兴中学资料；

10、市中区境内中小学资料（含峄阳中学）；

11、枣庄私塾教育和著名塾师的资料；

12、有关鞠仁医院的资料；

13、有关枣庄医、药、疾、疫资料；

14、枣庄庆裕栈资料；

15、枣庄医林人物医德、医术、医著的资料；

16、武术活动、武术流派、武术名师的资料；

17、儿童游艺活动资料；

18、民间文艺、民间艺人资料。

民族宗教

1、枣庄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资料；

2、枣庄天主教、基督教资料；

3、市中区境内近百年佛教、道教概况（包括僧、尼、道众活动及寺、庵、观的规模、兴衰）。

4、枣庄红万字会资料；

5、枣庄会道门资料。

社会风情

1、民间衣、食、住、行；生、丧、嫁、娶；年、节、寿、祀等风俗、习惯演变资料；

2、枣庄古建筑、古桥、古井、古墓的资料；

3、枣庄古树名木、奇花异草及园林资料；

4、有关枣庄街道规划、村落变迁的资料；

5、有关丐帮的资料；

6、有关赌场（宝局）、娼妓、毒品的资料；

7、有关枣庄人口迁移、进出、增减的资料；

8、自然灾害（水、旱、风、雪、寒、暑、霜、雹、雷、震、虫、病等）、妙景奇观、千古之谜；

9、社会趣闻；

10、其他真情实事。

后　　记

本辑文史资料七月脱稿，八月付梓，九月出版。算是向建国42周年献上的一份薄礼。

“世界需要热心肠”。在本书成书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市政协领导同志的关怀、帮助；得到了兄弟文史委的关心、鼓励；得到了区党史办、史志办大公无私地援助；得到了市政协文史委吴茂滨、赵文林、石朝峻等同志多次指教；得到了许多相识和不相识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在此，我们向情系我们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地感谢！但愿我们这个册子没有辜负大家的良苦用心和殷切期望。

编　　者

一九九一年国庆前夕

封面题字：金宝珍
编　　辑：靖玉楼
审　　稿：王永坤
封面篆刻：潘梦石
封面设计：石朝峻

枣出准印证（1991）030号
工本费：2.00元